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茅盾的一生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一、长房长曾孙

在苏州、杭州之间的嘉湖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水乡集镇。其中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乌镇，就是本书主人公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乡古镇，由乌镇和表镇合并而成。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县的北部，在京杭大运河的西侧，距县城十三公里。《乌青八景图记》说：“我乌青，左嘉禾而右苕，南武林而北姑苏，为浙之名地。”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的水系四通八达，河道纵横，舟船如梭。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上石桥、木桥如长虹飞跨，两岸房舍鳞次栉比，水街相依。每天清晨，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交易着这里盛产的上等稻米、蚕丝、晒烟、湖羊，买卖价廉物美的河蟹、甲鱼、黄鳝、银鱼……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用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它的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四面是两层的楼房，每层各间屋子只用板壁隔开，可以互相通行，如同骑马能够走一圈，当地人称这种楼房叫“走马楼”。

清朝末年，这幢并不宽敞的“走马楼”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沈家的祖先原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赚了点钱后，开了一片经营晒烟丝的烟店。此后，这家的主人沈焕跑到上海、汉口等地经商，又捐了一个侯补道的官职。于是沈家，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沈焕带着妻子王氏、女儿和小儿子在广西梧州，担任税关监督；

他的两个儿子，分管着沈家在乌镇开的两片商店，一片上泰兴昌纸店，另一片是京广百货店。负责纸店的大儿子沈恩培，是个秀才，他不愿经商，只知乐天逍遥，吹箫唱曲；

二儿子沈恩愿意经商，却又不善经营，百货店常常亏损。

沈家的长房长孙沈永锡，十六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厌恶八股文，订婚后来去跟岳父……乌镇名中医陈世泽学习，满师后成了个中医“郎中”。

仲夏的一天，在广西当官的沈焕接到乌镇拍来一封电报，拆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奔进内宅，向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做阿太了！”

原来这一年……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5月25日亥时，他的长房长曾孙即大文豪茅盾诞生了。

沈焕心想，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一字须是“水”旁。我家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如今长曾孙诞生，他可要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大展鸿图！于是，他为长曾孙取了个大名：德鸿。他又想起，今年春天来梧州的燕子特别多，这是吉祥之兆，就叫长曾孙的小名为：燕昌。

家里人接到沈焕来信，都觉得“德鸿”这个名字意思好，又响亮，从此大人小孩都唤他“德鸿”。

由于德鸿是长房长曾孙，大家都把他当宝贝，百般宠爱。好的食品，祖父母先给他吃；

好的衣裳，也先给他穿。当他睡着的时候，人人都屏声静气，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唯恐惊吓了他。几个小叔叔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他吃，将自己的玩具让给他玩。

他的祖母高氏是一户地主的女儿，办事都依照农村风俗习惯。孙媳妇陈爱珠怀孕后，她天天烧拜求观音送子；德鸿出生第三天，她亲自下厨，向亲朋端“三朝面”、分红蛋。

满月那天，她又张罗着为德鸿摆“满月酒”。

德鸿的外公、外婆，给小外孙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裳、鞋帽，还有摇篮、坐车。

特地请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以及银手镯、银脚镯，亲手给外孙戴上。

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平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天天顾自己上“访卢阁”品茶，打小麻将，或练习书法。然而他对长孙德鸿，却是例外地喜欢，经常抱到手上逗着玩，或到街上转悠，这家商店柜台前站站，那家商店客房里坐坐。听到人们说他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他便一脸是笑。

德鸿满周岁了。一天中午，一艘嘉兴航班的小火轮靠上乌镇码头。沈焕带着王氏、女儿、小儿子，卸任还乡，回到了乌镇。他一到家，不顾旅途劳累，就对家里人喊道：

“德鸿呢？快把他抱来，让我看看！”沈永锡急忙上楼，偕妻子抱了德鸿下来，向二位老人请安。小德鸿见了曾祖父、曾祖母，居然不怕陌生，伸出一双小手，按母亲的吩咐，脆声地喊道：“太公！……阿太！……”

沈焕和王氏把德鸿抱起来，宝贝、心肝地连声叫着。一家人都笑了。

德鸿的曾祖父晚年心情郁郁不欢，不愿和儿孙们谈话，而对长曾孙德鸿，一直很宠爱。

他对儿孙……包括德鸿的父亲，屡次不能中举感到失望、沮丧。心想，自己奋斗了一生，白手起家，创下了这份家业，而要使沈家成为真正的官宦之家，这愿望看来只能寄托在德鸿身上了。

“德鸿，快快长大吧！太公要靠你为沈家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你不能使太公失望！”

沈焕叮嘱着才两三岁的曾孙。小德鸿仰着脸，忽闪着眼睛。他此时怎能听懂曾祖父的话呢？

不久，德鸿的外祖父因病去世，母亲带他回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1900年，德鸿四岁了。他的曾祖父沈焕病逝于乌镇。而他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中医兼小商的家庭。父亲按沈家的排行，给他弟弟取名“德济”，就是日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

德鸿的父亲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成了一个拥护君主立宪，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维新派。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想进高等学堂、然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的美好计划全落空了。

他三十岁时患病，一年多以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这时，德鸿已进入与他家仅一墙之隔的立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竖在他父亲胸前让父亲看书时的专注神情，他想：

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

打开父亲的书来看。

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即使在病中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

有一天，德鸿正拿着书让父亲看。忽然听父亲说：“不看了，拿刀来！”德鸿知道，这“刀”是指他们房中那把长方形、半尺长的切瓜果的钢刀，便去拿了来，问道：“阿爸，你要刀做啥呀？”

“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父亲迟疑了一下，对他说。

德鸿听了有点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他还是把刀递给了父亲。

沈永锡朝刀看了一会儿，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拿走。德鸿问父亲还看不看书，他说看不看了，要德鸿去瞧瞧妈妈衣服洗完了没有。

德鸿走下楼，看见母亲已把衣裳洗完、晾好，便说：“阿爸想剪指甲。”母亲应道：

“哦，我去给他剪。”转身就上楼。

晚上，等他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德鸿，父亲叫他拿刀，是想自杀。德鸿吃惊地“啊”了一声。母亲说，经过劝说，父亲答应不自杀了。但是她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

“德鸿，你以后把刀藏藏好，剪刀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你阿爸了。”从这以后，德鸿担负起了监督父亲的任务。

他外婆得悉女婿想自杀，很着急，特地派人去邻镇南浔，请来镇西医院的一位日本女医生。诊断后，确定女婿患的是“骨痲”。

这是一种骨结核病，当时人们还不懂，在中国也没有特效药。陈爱珠忧虑地问丈夫：

“你知道什么叫骨痲？”沈永锡想了半天才说：“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痲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痲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看来我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德鸿看到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而外婆却哭了。父亲笑着说：“原来说是请东洋医生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之后，德鸿就再见不到父亲看书了，却见父母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过了两天，看见他父亲说着什么，母亲在笔录。他站在一旁，虽然能听得那些话，却不解有什么意义。只见母亲一边笔录，一边流泪，笔录完以后念了一遍。

“就这样吧。”父亲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我看，应当请公公来写。”

“你想得周到。”德鸿的父亲苦笑道，便对儿子说，“去请你爷爷。”

德鸿把祖父请父母的卧室里，听见父亲又说了一遍，让祖父录写下来。这时，他听懂了最后两句是：“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晚年他在回记录中写道：“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便要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

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立遗嘱后的一天，德鸿看到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他父亲把小说留给妻子，声、光、化、电等“新学”书籍遗给两个儿子，将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又指着一本书对德鸿说：

“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沈永锡指的“一大奇书”是谭嗣同的《仁学》。

他不再看自己喜欢的数理化书籍之后，就和妻子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叙述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

德鸿坐在一旁听着，大部分不懂。病中的父亲常常勉励他：“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鸿儿，你知道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吗？”德鸿摇摇头，父亲便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是多么希望他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啊！

沈永锡这个维新派知识分子，因骨结核病不治而于1906年病逝，终年三十四岁。

这年德鸿十岁，他的弟弟德济六岁，他们的寡母陈爱珠三十一岁。

二、知书达理好母亲

德鸿的母亲是当地著名中医陈世泽续弦夫人所生。陈老医生很喜欢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特地为她取名：爱珠。爱珠四岁时，她母亲的脑病仍不见好转。父亲想：女儿渐渐长大，总得有人教养。他想起了连襟王老秀才夫妻俩家道小康，无儿无女，若请他们代为教养女儿，可以放心。于是爱珠长住王家。姨夫姨母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她跟王老秀才学会了读书、写字、珠算，还念了不少古书；她向姨母学会了烹饪、缝纫，不但能缝制单衣夹裤，会翻丝棉衣袄，而且会缝制皮衣裳。

她十四岁那年，陈世泽来接她回去，想让她替自己管家。王老秀才知道他亲自教的这个十四岁女孩子知书达礼，能写会算，便说：“不是我夸爱珠，朝廷如开女科，我这个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不过，你要她管那么大家，她能不能管得了，我可没有把握。”

陈世泽也有点担心，女儿才十四岁，能挑得起管家这个重担子吗？谁知爱珠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整顿家务。不过一个多月，家里就变了个样：女仆和男厨师不再吵架了，学医的门生感到伙食改善了。连陈世泽也察觉出：家里仍是那么多人，却秩序井然，内外肃静，吵闹、调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脑病也居然好了。他对来访的姐姐和王老秀才说：“想不到爱珠比我还能干！”

爱珠十九岁与沈永锡结婚。陈世泽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她办喜事。当听说沈焕从广西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作结婚之用时，他又添上五百两银子，这样就与男家相当了。

他为爱珠置办了各种各样的嫁妆。虽比不上官僚、巨商嫁女的排场，但在乌青两镇也是够体面的。

她与沈永锡结婚后，丈夫问她过去读过什么书，她说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沈永锡见她对这些书还能解释，很是高兴。但他觉得这些书不切实用，便让妻子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前一本是简要的中国通史，陈爱珠顺利地读完了，而后一本是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她太生疏了，读起来困难很多，沈永锡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小德鸿五岁时，陈爱珠与丈夫商量，想叫儿子进沈家塾读书。丈夫不同意，说是家塾的老师是他父亲（沈恩培），教书不认真，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他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可是由谁来教儿子呢？

沈永锡这时一边行医，一边忙着实现他做学问的计划。他想到家里是德鸿祖母当家，妻子有闲空，就要妻子在他们卧室里教儿子读书。两人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新出版的《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

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适的历史读本，陈爱珠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

楼下，家塾里不时传出诵读《三字经》的声音：“人之初，性本善……”；楼上，陈爱珠和德鸿母子在教读《地理歌略》和《天文歌略》：“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崑，山足曰麓。”；“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大地椭圆，旋转如球，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小德鸿心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他后来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年轻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但是并不主张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书、写字。她经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本地传说，家庭人事。家里的仆人也常领着德鸿游玩乌青两镇的名胜古迹，或去看修真观对面戏台的演出，或去乌镇将军庙，看人们烧香许愿。

陈爱珠对丈夫爱好的数学不感兴趣，她的爱好是小说。在她当姑娘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代小说，做了媳妇反比替父管家时空闲，她又一本接一本地读起小说来。德鸿的父亲那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未入场前逛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特地为她买的《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几本是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欧文学名著。

她不仅自己爱读这些小说，而且还经常把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德鸿对于小说的兴趣。而沈永锡对此却不了解，他常常纳闷，对妻子说：“我们这个儿子，怎么于数学如此地不近？一点也不象我。”

1904年，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德鸿成了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校长是德鸿的表叔卢鉴泉。校门的两旁是原立志书院留下的一幅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里面嵌着“立志”二字。这给童年的德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这年德鸿八岁。他后来写道：“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仆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立志小学的课程有国文、修身、历史和数学。他对数学虽比过去“近”了一些，仍然没有兴趣。但他觉得进了小学是个“解放”，他说：小学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有一天，德鸿从家里堆放破烂什物有平屋里翻到了一箱子木版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不久，沈永锡和陈爱珠都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德鸿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陈爱珠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德鸿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德鸿的父亲去世经后，陈爱珠用恭楷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丈夫有遗像两侧：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陈爱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德鸿、德济两兄弟身上。她常对德鸿说：“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你弟弟将来怎么样，全在你给他做个什么榜样。”

她管教德鸿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有回家，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了。有一天，教算术的翁老师生病没有来上课，小德鸿急着回家。一个年龄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他，叫他去一起玩。德鸿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擦破了膝盖，手腕上还出了点血。他拉着小德鸿，去找德鸿的母亲告状。陈爱珠安慰了那个大同学一番，还给他几十个铜钱，让他医治手腕。最爱挑剔他人的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冷不热地对孙爱珠说：“他爹不在了，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真是！”陈爱珠一听，勃然大怒，把小德鸿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就要打下来。

过去她也打过他，不过是用裁衣服的竹尺打手心，而且只轻轻在打几下；现在竟然举起这硬木大戒尺来了。德鸿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

陈爱珠气愤在大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听着母亲的骂声，小德鸿吓坏了，一直跑出大门来到街上。这件事惊动了全家。他祖母叫他三叔去找，却找不到；他祖母更着急了，可是又不能埋怨他母亲。

小德鸿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烦恼地想：又不是我的错，姆妈为什么要打我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看到那个大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他来到沈家，对他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大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

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你家德鸿做得对呀！”听到沈老师这么说，陈爱珠开口道：“谢谢沈先生。”说完就转身回进房中。德鸿祖母听不懂沈老师说的那两句文言，看见媳妇说了声“谢谢”就返身回房，以为又要打德鸿了，就带着孙子到楼上去。陈爱珠背窗坐着。祖母让德鸿跪在母亲膝前。他哭着说：“妈妈，你打吧。”母亲一听，泪如雨下，只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爱子拉了起来。

过后，小德鸿问母亲：“妈，沈先生对你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候，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是说……”

“哦，你要拿大戒尺打我，我跑了出去，是对的？”

“你这孩子……”母亲笑了。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陈爱珠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受到良好教养，通晓文史，知书达理，卓识远见，性格刚强的中国妇女。她丧夫之后，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成才，又深明大义，支持他们远走高飞，献身革命事业。

沈德鸿曾为母亲写有一首《七律》：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黄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儿曹作陋儒。

三、作文名列前茅

1907年的春天，沈德鸿在立志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就进入植材高等小学求学。

这年他十一岁。

还是在读初小的时候，他看到高小的那些学生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子，走路目不斜视，吸引着满街行人的眼光，真是羡慕得很。如今他也成了“植材”的一个高小学生，在路上走时不觉挺起了胸膛。当时，“植材”的住校生和教师一同吃饭，伙食比较好。他母亲为了使他营养好一点，就每月替他交四元的膳宿费，让他住校读书。

“植材”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

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化学课时，从日本留不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作各种有趣的实验，使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籽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上孕育了。

德鸿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一天，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

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不是‘兵器’！啊——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老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对。沈德鸿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沈德鸿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德鸿心想：校长大概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这样说的。

当时教他们国文的先生还有三位，其中的张济川还兼教物理、化学。对于张济川先生布置的作文，德鸿最感兴趣。每逢写作文，他既紧扣题目，又独辟蹊径，文思敏捷，下笔成篇。

就是进入“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一次“童生会考”。这次植材小学同另一所高等小学的会考，由沈德鸿的表叔卢学博（鉴泉）主持。他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面对这个试题，沈德鸿潜心构思起来。他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母亲议论的国家大事，什么“明治维新”啦，“变法图强”啦，“自由”、“平等”啦，“振兴实业”啦……此时，他都记了起来。边想边写，一下子写了四百多字。结尾处，他写上了父亲生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卢学博读了这篇作文，大为赞赏，拿起朱笔，在结尾处加了许多密圈，批语写道：

“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还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小德鸿的祖父看，又在他祖母前大加赞扬。陈爱珠看过作文卷子后，笑着对儿子说：“德鸿，你这篇文章是拾人牙慧。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唉，你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当学徒了，我料想你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德鸿领悟地点点头，听妈妈接着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你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他如今逢人就夸你会考成绩好，真是用心良苦！”听了这番话，他心想：原来母亲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如表叔到处宣扬我的成绩，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父亲的遗嘱，把我培养成人啊！

打这以后，懂事的小德鸿更加用功了。在他的作文本上，国文老师屡次写下不同寻常的褒奖他的批语：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说理论还必须，两者兼到。”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伟，笔锋锐利，正有王郎拔剑斫地之慨！”

“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对他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老师也在批语中予以指出。如在他写的《富

弼使契丹论》后面就批道：“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而《张良贾谊合论》的批语是：“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

在张济川这位善知人又善知文的国文老师的奖励和指导下，少年沈德鸿的作文在全校名列前茅，月考、大考常有奖品带回家。有一次，奖到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他便送给了弟弟，让母亲讲给弟弟听。

一天上国文课，张济川老师抚着沈德鸿的背说：“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

好好地用功吧！”听了老师这种奖励的话，他学习更加奋勉，以未来的文豪自期，曾对同学沈志坚说：“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作家，于愿足矣！”

1909年，是沈德鸿在植材高等小学即将毕业的一年。那年他十三岁，已经胸怀大志，决心报国救民，常常在作文中运用历史观点和科学眼光评古论今。除写作史论之外，他还写下了多篇议论生动、鞭辟入里的时论，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学部定章》、《学堂卫生策》、《论陆静山蹈海事》等等。

沈德鸿还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年。面对萧瑟的秋风，飘零的黄叶，他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篇《悲秋》的抒情散文：“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雨之感其怀抱。伤矣哉！秋之为秋也。

……”

国文老师给他的眉批是：“语可动人”，总批为：“注意于悲，言多感慨。”

四、志在鸿鹄

1910年春节过后不久，沈德鸿告别母亲，同一个姓费的表叔乘航船到湖州中学求学。

他原想插进初中三年级，因为几何题目完全答错，只好插进二年级。但是就这样，他也跳过了初一年级。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教国文的先生姓杨名笏斋。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之比我在植材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

杨先生还从《庄子》里选了若干篇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在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走天桥”、“翻铁杠”，还要同学们扛上“能装九颗子弹”的真枪操练。沈德鸿身材矮小，走天桥时腿发软，翻铁杠

又攀不上，扛上枪走不隐，踢足球只六七尺，常常惹得其他同学发笑。体育老师见他如此，就例外地准他免学。

他这个体育场上的弱者，在学习其他功课上却是个佼佼者，尤以国文和英文成绩卓越，为同学们羡慕。他讲的那些小说故事，也使同学们着迷，不管大小同学，常爱围坐一起，听他讲述。

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沈德鸿这次南京之行，大开了眼界：不仅第一次看到和乘坐了火车，而且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建筑、人物，对“劝业会”展出的展品十分惊叹，真正感到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湖州中学沈谱琴校长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很有名望。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却从不到校。他购买真枪训练学生，用“远足”训练学生适应“急行军”，都有深意的。自然，沈德鸿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在晚年写道：“浙江出过许多人材。……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来说的。”

那天早晨，学生集合，听校长讲话。沈德鸿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沈谱琴。只见他陪着一位矮胖的老人来到肃立的学生们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讲话：“我沈某做校长多年，但对教育实在外行。今天，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他曾经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

嗨，到过这么多国家！德鸿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更认真地听沈校长介绍：“钱先生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革的方略……”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沈德鸿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钱老先生竟然不出题目，而是说：“你们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人，写一篇作文。”

沈德鸿过去养成了一种粘着题目作文的习惯，钱老先生这种教法，今天头一次遇到，因而一时感到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写起。过了一会，他忽然想起杨笏斋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他高兴起来了：我何不用“言于此而意寄于彼”的方法，也写一篇？

于是动笔。大意是：一队鸿鹄在天上高高地飞翔，嘲笑下边仰脸看的猎人。这象是一篇寓言，有五六百字。写完后，凶加上一个题目：《志地鸿鹄》。因他名德鸿，意在借鸿鹄自诉抱负。“我这篇作文不知写的怎样？钱老先生会满意吗？”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过去从未有过。不论是在立志小学做沈听蕉先生布置的史论，或者是在植材学校做张济川先生出的题目。但他仍然第一个把作文卷子交上去。

第二天作文卷子发下来，沈德鸿的卷子上加了很多红点、朱圈。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给他勾了出来，又在旁边写个正确的。在卷子后边写的批语只有一句“是将来能为文者”。

够了，这样的一句赞语足够了！沈德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一个星期日，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学生去他借住的“潜园”游玩。他拿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彩色风景画册，让同学们欣赏。还讲了他在国外见到、听到的一些趣事。少年沈德鸿心中的又一扇窗扉打开了。

还是在植材小学时，他在作文中就流露出远大志向。“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父亲留给他的警句。而他自己写的则是：“我党少年，宜刻自奋勉，”为使“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必须“挽时艰，振国威，”“如能力行新政，以图自强，将驾欧美之上，为全球之主人翁矣！”

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贴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

五、除名

德鸿在 1911 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

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

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

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瞞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崧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

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后，他看到同学打死的一只老鼠，起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他叫凯崧找来几张南货店糕点的草纸，把那只死老鼠包在里面，外面贴上一张红纸，象是一只礼品包。

他抓起毛笔，在“礼包”的封套上写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雏。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赫！’今子欲以之梁国而吓我邪？”

这是德鸿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庄子》中《秋水》里的句子。凯崧看了，拍手喊道：

“妙！妙！德鸿，这个脑筋只有你动得出。”

德鸿笑着抓起这个包着死老鼠的“礼包”，说道：“凯叔，走！我们给学监送礼去。”

两人悄悄地把这个“礼包”放到陈凤章的办公室里，看看没有人瞧见，就回到宿舍。

他们给学监送了这份特殊的“年礼”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乌镇度寒假了。两人哪里想得到，这下会闯了祸——被学校开除了。

陈爱珠听了儿子和凯崧的叙述，感到学监太专横，德鸿他们因为反对学监的专制而被除名，也情有可原。她看看两份同样的“除名通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看来学监对你们还算客气，居然给你们寄来了大考成绩单。”待凯崧走后，她望了望儿子说：

“德鸿，你今后到哪里去读书呢？是不是还回湖州？”

德鸿表示不想回湖州。陈爱珠安慰儿子说：“到何处去，一时不忙，只是年份上不能吃亏，你得考上四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陈爱珠决定让德鸿到杭州读书。而凯崧由决定到湖州中学去。

直到两年后，这一对叔侄与同窗好友才在北京会面。

六、学作对联

1912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沈德鸿乘坐的“乌杭班”客轮抵达杭州卖鱼桥码头。他提着一只小皮箱，夹着一个铺盖卷，登上岸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拉他到了位于葵巷的安定中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成了这所四年级的正式学生。

他是一个月前来杭参加插班考试而被录取的。当时他住在一家与他这“泰兴昌纸店”有业务来往的纸行里，曾听纸行老板说过，创办安定中学的是一个姓胡的大商人，住宅有花园，花园里有四座楼，每座楼住一个姨太太。他办这安定中学是要洗一洗被人说成铜臭的耻辱。

其实，创办安定中学的大实业家胡趾祥，并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而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有远见的富商兼学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上下力图复兴，多以科学足以救国，大兴办学之风。”胡趾祥的好友胡适、邵伯炯、陈叔通，都力劝他创办学校。

《杭州文史资料》载：“胡趾祥即手示二子焕、彬，拨八千元为开办费，六万元储息为学堂经常费，并请陈叔通来杭筹建。”他的治学精神是：“学唯诚意正心四字，教育经义治学两斋。”为了办好学校，与公立中学竞争，凡是杭州的好教员，他都千方百计聘请来。如当时被称为浙江才子的张相（献之）举人俞康侯就被聘请担任国文教员，其他的数理化和史地教员，也多为知名学者和外国留学生。这些教员熏陶、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与德鸿先后在安定中学毕业或肄业的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尹民，及范文澜、钱学森、潘洁兹、蔡振华、华君武、冯亦代等人。

新的校园，新的师长，新的同学，这里的一切都使沈德鸿感到新鲜。杭州人说话差不多每句话都带着个“儿”，也是他闻所未闻的。教员上课没有通用的固定课本，每个教员爱教什么就教什么，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学生上课的兴趣很浓厚。

德鸿上的第一堂国文课，是张相（献之）教的。他对同学们说：“我要教你们作诗、填词。但是，学人选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我要先教你们作对子。什么是对子？”

你们知道？……”

对子，德鸿当然知道，这就是对联嘛。虽然他还不会作对联，却接触过不少对联。

他的祖父沈砚耕擅长书法，常用楷书为乌镇的商店、人家书写对联。他常站在一旁观看。

他舅父陈粟香也是一个喜欢作对联的人。前年暑假，他跟母亲到外婆

家“歇夏”，曾听陈粟香舅父和母亲谈话。舅父说：“北面一箭之远，前年失火，烧掉了十多间市房，其中有我的两间。今年我家在这废墟上新造了两间。附近人家就议论纷纷，说是我既来带头，市面必将振兴。可是谁不知道，‘乌镇北栅头，有天没日头’，北栅头多有是小偷、私贩、盐枭，如何有把握振兴市面呢？上梁的日子，我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梁上。上联是：

岂冀市将兴，忙里偷闲，免白地荒芜而已。”德鸿母亲问：“那下联呢？”
“下联是：

诚知机难测，暗中摸索，看苍天变换何如？”德鸿母亲笑道：“你这是实话。对联作得好，白地对苍天尤其妙。”至于母亲写在父亲遗像两旁的那副对联，他更是历历在目。

德鸿竖起耳朵聆听张献之讲解对联的特点和写作方法：撰写对联，看来虽似小道，却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学问见识和文字功夫，例如区分平仄，要懂音韵；别词类和句子结构，要懂文法；遣辞造句，须善修辞；用典使事，须熟文史……这使得他懂得作对子是诗词的真功夫，不是什么雕虫小技。

张献之在课堂当场示范，详细地讲解平仄如何直协调，词类怎样选择，哪里是描写，何处是议论。并且，常常写了上联，叫学生们做下联。做后由他当场批改。

又有一天，德鸿听张献之为他们讲长联的写作：“说到长联，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恐怕是最长的了。”

这是德鸿不知道的。于是专注地盯着黑板，只见张先生一字一句地把全联默写了出来。

他数了一下，两联共有一百八十字。

张献之要每个学生就西湖风光也来做一对长联。

沈德鸿过去写史论、时论和游记都颇好，却从未作过对联。然而作对联的兴头被张先生鼓得高高的，便就年前游西湖所见的风光景色，模仿黑板上的大观楼长联写了起来。

他先写了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心想不好，这是前人的诗句，应自出心裁地写。又写道：“万顷湖平似玉境静无尘照葛岭苏堤凭栏看云影波光照我全身入画”，可是下联如何对呢？他怎么凑也凑不好，不是平仄失调，就是词语失对，甚至结构不相应。这一来，他才知道“求长不难，难在一气呵成，天衣无缝。”

四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一人到西湖游玩。这时的西湖已是桃花飞红，翠柳飘絮，晴光拂眼，游人如织。他却无心赏看，而是徜徉在一处处楼台馆阁所挂的对联之间。

他来到一副对联前，只见上写：“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他品味着，觉得昨天上课时张先生的分析确是入木三分：“这副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此乃这副对联的弱点。”

走过西泠桥，便是苏小小墓。沈德鸿知道，苏小小是南齐时的一个侠妓。在她的坟墓的小石亭上，刻满了各种对联。于是在本子上抄录着。忽然听到一个人唤他的名字，扭头一看，是同班同学胡哲谋。

“张先生讲的哪副对联在哪里，你找到了吗？”胡哲谋问。

“噢，在这里，你看。”德鸿指给他看。

这副对联是：“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张献之对这一对联极为称许，他在课堂上解释道：“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是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人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重已极。”德鸿看看眼前石柱上这副未曾署名的对联，更感到张先生分析得透辟。胡哲谋对他说：“张先生指出的此联，的确是这些称赞苏小小联语中的佳作。”

他俩又结伴同去岳王庙、灵隐寺，抄录了许多楹联。待到日暮时离开湖滨返校，他的小本子已记得满满的。

沈德鸿后来写道：“张先生经常或以前人或以自己所作诗词示范，偶尔也让我们试作，他则修改。但我们那时主要还是练习作诗词的基本功：作对子。张先生即以此代其他学校必有的作文课。”

1913年夏天，沈德鸿成为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第八届毕业生之一，以三年半时间修完五年的中学课程，提前毕业了。

对于西湖风光，他一直未能制作一副长联，直到1979年8月才为《西湖揽胜》画册填了一首《沁园春》：

西子湖边，保叔塔尖，暮霭迷蒙。
看雷峰夕照，斜晖去尽；三潭印月，夜色方浓。
出海朝霞，苏堤春晓，叠嶂层次染渐红。
群芳圃，又紫藤引蝶，玫瑰招峰。
人间万事匆匆，邪与正往来如转蓬。
喜青山有幸，长埋忠骨；白铁无辜，仍铸奸凶。
一代女雄，成仁就义，谈笑从容气贯虹。
千秋业，党英明领导，赢得大同。

七、北大深造

“德鸿，你来看！”陈爱珠指着《申报》上的一条广告对儿子说。

那是《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的学校有北京大学预科、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医学专门学校，其中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史地、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和图书。

德鸿看完这则招生广告，听母亲说，外婆给她的一千两银子，自他父亲逝世后存在乌镇的钱庄里，到现在连本带息已有七千元。他和弟弟两人平均分，各得一半，每人三千五百元。这样，她还可以供德鸿再读三年大学。北京大学预科的毕业年限正好三年，所以她想让德鸿报考这所大学。又对儿子说：“你卢叔在北京的财政部供职，你到北大预科求学，可以得到他的照顾。再说，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早两年，他们的毕业生都钦赐翰林呢。进这所大学，准能得到深造！德鸿，你考这所学校，行不？”

“妈，你想得周到，我就考北京大学预科吧。”德鸿答道。

7月下旬，他来到上海，借住在二叔祖家里。然后到设在江苏教育总会

内的报名处去报名。

这时，他才知道北大预科第一类是文、法、商三科，第二类是理、工、农三科。虽然考试科目相同，但是愿入大学预科第一类者得于理论、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

他想，自己数学不行，不是学理工科的料，还是读文科为好，于是选报了第一类。

8月11日，沈德鸿一大早来到虹口唐山路的澄衷学校，按时进入试场应考。除了数学，其它几门课他都考得很顺利，尤其是国文和英文。

返回乌镇，他将自己选报第一类和考试的情况禀告了母亲。他后来写道：“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了。但她也默认了，大概她那时也觉得学工业未必有饭吃……，还有一层，父亲的遗嘱上预言十年之内中国大乱，后将为列强瓜分，所以不学‘西艺’，恐无以糊口；可是父亲死后不到十年，中国就起了革命，而‘瓜分’一事，也似乎未必竟有，所以我的母亲也就不很拘拘于那张遗嘱了。”

陈爱珠这位知书识礼、通情达理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的，她听了儿子的禀告，只说了一句：“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出了北大预科录取的新生名单。然而他和母亲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沈德鸣”。他母亲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想必弄错了。不久，录取通知终于寄来，他被录取了。

9月初，德鸿从上海搭乘海轮北上。抵天津后，再坐火车到北京崇文门车站。他的表叔卢学溥派了儿子卢桂芳，带着佣人接他，表兄表弟一见如故。卢桂芳虽比他小几岁，却很能干。在陪德鸿到预科新生宿舍所在的译学馆安顿下来之后，他告诉德鸿，自己在读中学，还没毕业。德鸿问了他，才知道卢表叔担任的是公债司司长，每天都忙得很。

这天晚上，他到卢表叔家吃晚饭。卢学溥见了德鸿，笑着说：“几年不见，德鸿长得一表人才了！”又对桂芳说，“那年你表兄十二岁，他祖母和二姑母主张他到纸店做学徒，我想，这不是要把‘料改成马褂’吗？就去对他祖父母和他母亲说，才使他能继续求学。”

德鸿，你母亲为了你能读书，可真是操够了心呵！”他嘱咐德鸿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他，缺什么就到他家里拿。饭后喝茶时，卢学溥对桂芳提起德鸿童生会考曾获第一名的往事。

德鸿说，那全是卢表叔的鼓励。卢学溥夸他说，他那篇《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的作文确实写得好。“我还记得给你写了一段批语，却忘记了，你还记得吗？”

德鸿见问，答道：“您写的是，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这一说，卢学溥也记起来了，“对么，我是针对你写的那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说的。德鸿，桂芳，你们不仅要记住这句话，还要以这句话立身行事。”

几天后，大学的新生活开始了。

沈德鸿看到了许多外国教授，教外国文学和第二外语 法语的都是外国人。中国教授大多是有名的学者，如教国文的沈尹默，教文字学的沈兼士，教中国历史的陈汉章等。

德鸿喜爱读的依然是小说。大学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小说，任凭

他随意借阅。

他曾写道：“……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以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那时在北京大学尽看自己喜欢的书……”

然而他并没有放松各门功课的学习，对于沈尹默的古代文论课，更是学得津津有味。

沈尹默学贯中西，精于诗文。他教国文，没有讲义，对学生们说：“我只指示你们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在你们自己。”

这种讲授方法，同学中有很多人一时不适应，而沈德鸿并不感到很陌生。还是在安定中学读书时，张献之教国文就不用讲义，另一个姓俞的国文教员也不用讲义。

然而，他发现沈尹默的教法，又跟张献之和俞先生有所不同。沈尹默更多的是教他们治学之道和研究的方法。

在课堂上，沈尹默教学生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韩非子》中的《显要篇》。德鸿竖耳听他说：“要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以及他们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你们课外要精读这些子书。至于《列子》，是一部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这样的课，是他在中学时未曾听过的。以往教师讲的都是知识，他只要记住、理解就行了。而现在，德鸿的面前却闪着一个个诱人的问号，召唤他去研究、解释，去伪存真，去芜存精。这是多么有趣呵！

由于得到沈尹默的指点，沈德鸿下功夫精读了《典论·论文》和《文赋》，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知几的《史通》。

对于外国文学，他的兴趣也很浓厚。两个外籍教授，分别教他们读司各特的《艾凡赫》与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教《艾凡赫》的外国教授，试着用他刚学的北京话讲解，反而弄得学生莫名其妙。沈德鸿便在一张纸条上用英文写道：“请您还是用英语给我们解释。”递上去后，外国教授读了，微笑着点点头，改用英语上课。这样，同学们倒容易懂他的讲解，师生双方都感到了轻松、愉快。

第二学期，一位年轻的美国教授来到德鸿所在的班级上课。他刚从美国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很懂得教学方法。德鸿在看望卢学博时说，“这位美国教授最受我们欢迎啦。”

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来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

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教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而是出了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

在植材小学读书时，沈德鸿学的就是英国人纳司非尔特编的英文文法读本，从小奠定了英文的基础。中学阶段，他的英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如今得到这位善于教学的美籍教授的指导，他英语的读说听写能力又大为提高。

同班的徐佐，是浙江富阳人，和沈德鸿是大同乡、好朋友。他的英文程度较差，每逢写英文作文，总是悄悄地对沈德鸿说：“老乡，多多拜托！”

沈德鸿向他眨眨眼，低声回了一句：“放心，‘捉刀’有我！”他先代徐佐写好一篇，然后作自己的。往往别人写完一篇的时候，他已作好两篇英文

作文。

但是他出手虽快，却常常有小错误。每次作文发下来，便看到美籍教授替他一一作了修改。

每年暑假，德鸿总是南下还乡看望母亲；而每逢寒假，他都遵照母亲嘱咐留在学校，通读了向卢学博借来的“二十四史”。

1916年3月，当青年沈德鸿即将结束三年预科学习之际，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早先预备的大量广东焰火，本来打算在袁世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来庆祝的，如今只好在社稷坛放掉。

沈德鸿和同学们听说后，在夜里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奔往社稷坛观看燃放焰火。他看到一串串、一簇簇的焰火飞上夜空，闪闪烁烁的美丽火花，组成了“天下太平”四个大字。

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本来还有一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民心不可违呵！”沈德鸿想。

6月，当他正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他说：“死得好！早该死了。”

7月，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了。这年他二十岁。

八、“商务”第一天

1916年7月27日清晨，一艘小客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靠岸。沈德鸿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走到街上，吃了一点早点，便问了问路，匆匆向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走去。

他一路想着心事：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张元济总经理？无一面之识，他肯见吗？不怕，我有他们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写给他的介绍信。虽然我也不认识孙伯恒，不过我知道此人，他常找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卢表叔。听卢表叔说，这位孙伯恒巴结他，是有求于他，想要他同意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公债券。他想起母亲上个月底对他说的话：“德鸿，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你祖父给卢表叔写信了；我也写了信，叫你卢表叔不要给你在官场和银行找职业。他可能一时没办法，你可要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呵！”谁知不到十天，卢表叔就来了信：“……接信后，速去上海见张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母亲说：“你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钱我分成两份，你和弟弟每人一千元。你的一份这些年用得差不多了，我没有办法供你再读下去。”

这下好了，商务印书馆里的书很多，听说他们有个涵芬楼，藏有许多善本、珍本书，你可以好好利用，一边做事一边深造。”德鸿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会努力的！”

沈德鸿照着旁人的指点，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他向营业部的一个售货员打听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这个售货员只把嘴一呶：“三楼。”他又问了另一个人，才知道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的一个楼梯上去。谢过那人，他转到营业部后面，刚到楼梯边，就有一个人拦住他问：“干什么？”

“请见张总经理。”

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看沈德鸿一身穷学生的打扮，冷冷地说：

“你在这里等吧。”

沈德鸿心中来了火，也冷冷地扔给他一句话：“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

一听“孙伯恒”三个字，那人立刻面改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

沈德鸿不回答，从口袋里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

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

沈德鸿在心里说了一句：“势利小人！”随即慢慢地向三楼走去。拐弯处，他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来是等候传呼然后才可上楼的。

他不禁想道：“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是什么样？”走了三楼，他觉得这里比一楼、二楼矮多了。地方也小，显然很不相称。一间办公室门前摆着张方桌，坐在桌后的一个职员见了他，说道：“过来，先登记。什么姓名？”

“沈德鸿。有人介绍我来见张经理。”

“也得登记。”那职员一本正经地说。

沈德鸿一声不响，又从衣袋拿出那个大信封来。职员接过去一看，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

“我马上去传达。”那职员满面笑容地对他说，推开门走进去不久带着一个人出来，低声对那人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沈德鸿说：“请进。”沈德鸿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沈德鸿走进室内，看见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前放着一张大写字台，旁边坐着一个中年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心想：他就是张元济了。

张元济指着一把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

沈德鸿坐下。张元济问他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他简短扼要地回答了；张元济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工作好吗？”沈德鸿答：“好的。”张元济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沈德鸿表示不认识宝山路。这时张元济拿起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说：“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对，沈德鸿，他今天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找你，请同他面谈。”挂上电话，张元济对他说：“你听得了吧？刚才我同英文部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沈德鸿说了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张元济随手取一张小纸片记下，念了一遍，又对他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完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沈德鸿对他鞠躬，转身走出这间总经理办公室。

回到旅馆，他把简单的行李理好。在等候去编译所时，他回想张元济的办公室是那样的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的书报。初次见面，商务印书馆张经理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等了一会，通宝来，帮他行李装上一辆相当漂亮的小轿车后，就对司机说：“走！”

沈德鸿还是第一次坐小轿车，他以为是出租汽车。通宝说：“这是总经理的车子。”

出租汽车哪里去找？如果坐黄包车，起码得一个小时，那就误了事了。是总经理派汽车接我到河南路，又叫原车送我们到编译所。”沈德鸿有点惊讶地说：“啊！你是编译所的茶房！”通宝点点头，告诉他：“我是南浔人，南浔离乌镇一十八里，我们也算同乡。”

你到编译所做事，不管有什么要帮忙的，找我就行。”沈德鸿听他口气不小，猜不透他是什么来头。他这时还不知道，通宝是编译所茶房的头头，也是编译所茶房的元老，所里的茶房清一色的南浔人，都是他引进去的。

到了宝山路，通宝把他的行李卸在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里，就带他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这位邝博士是华侨，原籍广东，在外国大学毕业后得的博士，大约四十多岁。他不大会说广东话，说英语却顺口。见到沈德鸿，就用英语谈话。他说：“欢迎你到我们英文部做事。我跟总经理商量，安排你在我们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工作是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我们英文部现在有七个人，大家来认识认识。”

邝博士招呼着同事们，一一向沈德鸿介绍：“英杰文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周由廛、平海澜，改卷员黄访书，办事员胡雄才。

二周是兄弟，他俩和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三人和沈德鸿握手时说：“我们是乡。”听到通宝和这三位同事的浙江乡音，一股暖流涌上沈德鸿的心头，仿佛异乡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对邝博士和大家说：“我刚来所里做事，一切都不懂，请诸位今后多多指教。”

他的第一天的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英文函授学校”学生的课卷。

下了班，和他年岁相近的胡雄才到宿舍看他，对他说自己还是练习生，每月薪水只有十八元。沈德鸿的薪水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一级最低的工资。以后每过一两年，可以加五元。

“你与总经理是不是亲戚？”胡雄才盘问沈德鸿。

“不是。”

“不是？我才不信哩。你说不是亲戚，可是自有编译以来，从没有听说一个最低一级的小编辑，是坐了总编辑的专用车、由茶房头脑伴送来的。”

沈德鸿也不和他多辩论。因为他觉得胡雄才的推论是合理的。胡雄才还悄悄告诉他：

“我们编译所里，有好多人每月薪水一百元，但是他们长年不编也不译，只是每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跟一些拿着高薪又不干事的人咬耳朵说话。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有特别的后台，特殊的背景，他们跟老板关系密切。你可不要得罪他们啊！”

送走胡雄才，沈德鸿躺在床上，觉得浑身很疲倦，但胡雄才说的编译所内幕情况，使他久久不能入睡。他想，母亲写了极诚恳的信，请卢表叔不要把自己弄到官场！今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

九、入文学之门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

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

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

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十、革新《小说月报》

沈雁冰在加入上海共产党小组不久，商务印书馆当局决定适应“五四”以来的新潮流，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由于在这之前，他已为《小说月报》半革新的几期撰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论》等文章，实际主持了该刊“小说新潮”栏的编辑事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就约他谈话，在座的还有陈慎侯。

“王莼农已辞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这一年来，你帮助这两个杂志革新，写了不少好文章。我们想请你担任这两个杂志的主编，不知沈先生可有意见？”

高梦旦说。

沈雁冰略思索一下说：“承蒙馆方看得起我，但我只能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妇女杂志》不能兼顾。”

高梦旦还想劝学雁冰兼任。高级编审、他的智囊陈慎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他便不再提这件事了。又问：“沈先生，你全部改革《小说月报》，有哪些具体办法？”

“让我先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现在还说不上。”

“好的。你就立刻去办吧。”高梦旦最后说。

沈雁冰向王莼农了解后，发现存稿全是“礼拜六”派的，林琴南译的小说稿也有十几万字。就向高梦旦提出：一，现在稿子都不能用；二，全部改用五号字（原为四号字）；

三，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高梦旦与陈慎侯商量后，全部接受他提出的意见，但提醒他：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四十天内结束，一月号才能准时出版。

沈雁冰立即着手组稿。他不担心论文和翻译的稿件，只担心创作的。心想，北京有鲁迅，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真是好作品！可是，我同他素不相识；还有周作人，他写的文章也是极好的，但也未交往过；忽然他想起了王剑三（王统照），这个人的《湖中夜月》，是我给他发在《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十号上，何不写信给他，让他帮我联络一下呢？他当即寄出一封快信，告诉王剑三：《小说月报》即将完全革新，由他主编，请尽快写稿并约熟人稿子。

几天后，他竟收到了郑振铎给他的信。当时，他们两人还未见过面，互不认识。郑振铎说他是王剑超大型的好朋友，看了来信，大家都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叫“文学研究会”，发起了是周作人等，邀请沈雁冰参加。

这封信，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在这年最后一期的《小说月报》上，他拟写了《本月刊特别启事》五则，第一则说：“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化已过其建设的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已至，亦愿本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一分之天职。自明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也当不同。”

第五则启事则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讲先生之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

1921年1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沈雁冰在他执笔的《改革宣言》中写道：“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介绍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一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之资料。”但是，“就国内文学界的情形言这，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所以“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这个宣言，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界高高地举起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旗帜！

第一号刊出了周作人、沈雁冰的论文和评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的六篇创作，耿济之、孙伏园、王统照等人的译文，以及郑振铎的“书报评介”和沈雁冰自己写的“海外文坛消息”。

《时事新闻》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读了这第一号，写信热情赞扬，并提出了一些希望。

沈雁冰写信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还在萌芽时代。我们以现在的精神继续做去，眼光注在将来，不做小买卖，或者七年、八年之后有点影响出来。”并且说：“我敢代表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

这，就是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的沈雁冰的抱负：让中国的新文学走向世界！

《小说月报》革新后，销数直线上升：5000 7000 10000，……商务印书馆各地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商务印书馆的顽固派老板长期来憎恨新思想、新文学，此时竟在金钱驱使下屈服了。

十一、反击“礼拜六派”

沈雁冰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支持下，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办得生气勃勃，吸引了社会各界读者，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鸳鸯蝴蝶派文人不甘心失掉《小说月报》这个地盘，他们或撰文发难，或暗中诽谤，扭成一股势力向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沈雁冰个人发起了攻击，企图夺回《小说月报》的编辑大权。

这样的攻击，是沈雁冰意料中的。不过，他心里仍很苦恼。1921年9月21日，他给周作人写信，叙述了自己的心情：“《小说月报》出了八期，

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1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搅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后来，沈雁冰又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因为编译所长高梦旦不同意，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1921年夏，高梦旦因自己不懂外文，主持编译所事务感到力不从心，征得张元济同意，到北京去请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胡适于7月来到上海，但他说要先了解一下编译所情况，再作决定。第二开，他在编译所会客室轮流“召见”所内的高级编辑和刊物主编谈话。

沈雁冰也被“召见”。他从来没见过胡适，但他早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在北京大学的教授中，胡适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不胡适让他坐下后，他只回答胡适的询问，不想多谈。他观察胡适，只觉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心想：“这倒象征了胡适的为人。”胡适经过一番了解，不愿担任编译所所长，就推荐王云五来。他说：“王云五既有学问，也有办事才能，比我强得多。”据茅盾分析，胡适自己不干而推荐王云五，“他一方面既可以仍然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名教授，门墙桃李，此中大可物色党羽，而另一方面则可以遥控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王云五的幕后操纵者。胡适深知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什么学问，是他可以操纵的。”商务当局的保守派对王云五很中意，沈雁冰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编辑则看不起他。

1922年7月，沈雁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批判“礼拜六派”。当时一些专写爱情小说的作家，他们在小说中常用“三十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滥调。因此人们称这派作家为“鸳鸯蝴蝶派”。又因为这派作家发表作品的最老的刊物是《礼拜六》，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礼拜六派”。《小说月报》在革新之前发表的小说，都是“礼拜六派”的作品。茅盾当了主编之后，把原来已经决定刊用的多篇“礼拜六派”的小说稿封存入库，招致了“礼拜六派”文人的百般攻击。

茅盾撰写这篇评论，批评“礼拜六派”写得最多的恋爱小说或家庭小说思想，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各色各样的翻版而已。茅盾的文章义正词严，击中了“礼拜六派”的要害，因之他们对他“恨之更甚”。“礼拜六派”就对商务当局施加压力，商务当局中的保守派就让王云五去威胁沈雁冰。王云五自己不出面，派了一个姓李的秘书来，架子十足地说：“沈先生，王所长近日风闻《礼拜六》将提出诉讼，要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所长希望你在《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的道歉。不知尊意如何？”

“什么，要我们道歉？绝对办不到！王所长应该知道，是‘礼拜六派’先骂《小说月报》和我个人，足足有一年之久，我才从文艺思想的角度批评了‘礼拜六派’，如果说要打官司，倒是我们早就应该控告‘礼拜六派’；况且文艺思想问题，北洋军阀还不敢来干涉，‘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敢做北洋军阀不敢做的事情！”沈雁冰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

对方一时语塞。

沈雁冰又说：“哼！我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包括商务当局的态度，用公开信的形式，登在《新青年》以及上海、北京四大副刊上，唤起全国的舆论，看看‘礼拜六派’还敢不敢打官司！”

姓李的心里清楚，沈雁冰说的“四大副刊”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要是他真的这么行事，那可招架不住，便恐慌地连声说：“沈先生，事情且不可闹大，不可闹大。”

说完就急忙打开门，灰溜溜地走了。

王云五不肯罢休，派人检查《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沈雁冰发觉了这事，怒冲冲地去向王云五提出抗议：“当初我接编《小说月报》时，曾有条件：馆方不得干涉我的编辑方针。现在你们既然背约，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馆方取消内部检查，二是我辞职。”

“沈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嘛。”王云五说。

“没什么好商量的！”沈雁冰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王云五的办公室。

王云五与商务当局研究后，答应沈雁冰辞去《小说月报》的主编，但是坚决挽留他仍在编译所当编辑，并说明：做什么事，由他自己提出，馆方一定尊重他的意见，而且决不用别的编辑事务打扰他。《小说月报》的主编由郑振铎接替，从1923年1月号起。第十三卷十二号仍由沈雁冰编完。商务当局选择郑振铎，是国为“郑振铎亦文学研究会人，商务借此对外表示《小说月报》虽换了主编，宗旨不变。”

沈雁冰后来曾写道：“当时我实在不想再在商务编译所工作，而且我猜想商务之所以坚决挽留我，是怕我离了商务另办一个杂志。”

他的情况，被陈独秀知道了，就劝他说：“雁冰，你现在若离开商务，中央就得另找联络员，但是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看你还是留在商务编译所吧。”

沈雁冰想，既然党的事业需要，那我就暂时留下，以后再说。他又向王云五提出：“在我仍任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除任何一篇。否则，我仍将在上海与北京的四大报纸副刊上，用公开信揭发商务当局的背信弃义，和你们反对新文学的顽固态度！”王云五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同意。

沈雁冰为此撰写了短评《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伤口么？》，特意署名“雁冰”，刊登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一号的社评栏内。这篇评论是掷向“礼拜六派”的又一把锐利的匕首。沈雁冰在文章中说他不同意有些人把“礼拜六派”看作是“旧文化旧文艺”的代表，并且引了北京《晨报》副刊上子严写的《杂感》，猛烈抨击“礼拜六派”一流“只是现代的恶趣味

污毁一切的玩世纵欲的人生观”，“礼拜六派的文人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这样下去，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去了。”他大声疾呼：“我们为要防止中国人都变为‘狷猴之不肖子’，有反抗‘礼拜六派’运动之必要；至于为文学前途计，倒还在其次，因为他们的运动在本质上不能够损及新文学发达的分毫。”在同一期的社评栏内，还发表了沈雁冰写的另一篇短评：《反动？》。他指出，“礼拜六派”的通俗刊物泛滥，这不是“反动”，而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发泄”。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治标不如治本，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常常替可爱的青年指出‘通俗刊物’

里的误谬思想与浅薄技能，一方面亦要从根本努力，引青年走上人生的正路。”

写了这两篇评论之后，沈雁冰感到反击“礼拜六派”的痛快。他在晚年写道：“同一期的《小说月报》接连两篇社评都正面抨击‘礼拜六派’，可以说是我在离职前对王云五及商务当权者中间的顽固派一份最后的‘礼物’。”

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也都发表文章，对“礼拜六派”进行了连珠炮似的反击。

连成仿吾也在《创造季刊》上写了一篇《歧路》，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在沈雁冰和其他新文学战士的反击下，“礼拜六派”虽未彻底垮台，也噤若寒蝉了。

这场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影响深广。作家黄源说：“茅盾同志 1921 年主编《小说月报》，他一手把原是鸳鸯蝴蝶式的《小说月报》，改革为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着重翻译的，是注意于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学月刊。……这真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茅盾同志继《新青年》之后，给予其致命的打击，使鸳鸯蝴蝶派从此一蹶不振。当时象我这样的文学青年，从此都摆脱它的影响，开始接受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教育。”

一五、领导罢工

“五卅”运动发生后，沈雁冰心得不可开交。他和韩觉民、杨贤江等三十余人发起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讲演团奔赴各校讲演，又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负责编辑《公理日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他还肩负着领导职工罢工的重任。

6 月 21 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草草吃过早点，匆匆向虬江路广舞台走去。他想，商务印书馆的罢工，势在必行。我和杨贤江是馆里党组织的负责人，担子不轻。虽然发行、印刷、编译三所和总务处的党员同志不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是要周密考虑，谨慎从事。

商务印书包工会成立大会在 8 时正开始了。几千名职员、工人，在热烈的气氛中选出了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二十三名执行委员。

会后，沈雁冰去参加临时党团会议。徐梅坤对他说：“我们党决心发动这次罢工，是要重振 5 月 30 日以来因受压迫面趋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党中央派我和你们一起工作，具体领导馆内的这次罢工……”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们正要裁减一批职工，引起了职工们的强烈不满。

8 月 19 日，共产党员廖陈云（陈云）、章郁庵先在发行所串通低薪职工秘密集会，布置罢工。

这事不知怎么被老板侦知了，抢先在 8 月 21 日贴出布告：“……本年内因种种影响，本馆所受损失甚大。现当秋季开学，正是各书店营业旺盛之

时，请职工勤勉从公，公司同人应同舟共济，休戚相关……”

“商务”当局还允诺给发行所职工加薪一成。

职工并不为这种“空头支票”所动。临时党团商量后，就由廖陈云、章郁庵等人 and 一百六十多名职工代表在当晚开会讨论，决议罢工。廖陈云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

第天，罢工开始了！印刷所、总务处也响应。要求声援，采取一致行动的信件，向商务印书馆设在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个分馆的职工飞去。

沈雁冰和其他共产党员站在罢工斗争的前列。他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磋商、研究、联络、组织。

23日下午，沈雁冰和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组织了四千多名罢工的职工，云集东方图书馆俱乐部门前广场上，由廖陈云主持大会。大会决定向“商务”当局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职工之权”，“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

会后第二天，编译全体职工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大联合罢工实现了！

由“三所一处”罢工职工推选出的十三位代表，组成了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沈雁冰作为临时党团的主要成员，兼任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他为了集中精力领导罢工，搁下了编写《文学小辞典》的工作，从繁忙的编译业务中脱出身来。

徐梅坤经常和他研究罢工的策略和措施。

商务印书馆当时对外宣称“文明机关”，馆方常以馆内职工“待遇优厚”、“劳资间感情融洽”而自诩。当罢工风潮骤起，沈雁冰拟写的《罢工联合宣言》揭露了馆方对职工的种种不合理待遇，在报上一公布，各界舆论大为震惊，记者纷纷前来采访。

沈雁冰找到徐梅坤，两人研究后向罢工中央执委会进言，为了防止报纸报道失实面影响公众舆论，避免对罢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对各报采访作出限制。于是，罢工中央执委会决定，拒绝各报记者直接采访。凡各报需要消息，一律由罢工中央执委会发布。

这项工作落到了沈雁冰的肩上。他担任了罢工中央执委会的新闻发言人，专门负责对外撰写稿件和发布罢工消息，对内则参与讨论、研究和起草、修改《工会章程》等文件、文告和宣传品。

24日晚上，孔德止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丈夫还在灯下写着什么，问道：“你怎么还不睡，明天写不行吗？”

“不行，明天上午要用。”他答了一句，又继续挥动毛笔。

这是一份《复工条件》，共有九条十八项。包括：“公司应无条件正式公布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男女一律”，“减短每日工作时间”，“优给恤金及退俸金”，“每年红利平均分派”，“改良待遇”，“职工等不得无故辞退”，“商务俱乐部应恢复同人名义，永远移交同人负责办理”，“关于此次罢工人员不得借端辞退，罢工期内工资照发”等条。

他用娟秀工整的小楷，在“商务印书馆工会用笺”上书写着。一共书写了十一张。

看看表，已是25日凌晨二时。

上午，罢工中央执委会经过复议，一致同意他起草的这份《复工条件》。

在盖上“商务印书馆工会之章”后，沈雁冰和王景云、章郁庵等十三个代表带着这份文件，参加了下午与“商务”馆方代表的谈判。

在总务处会客室里，他看到资方的代表是：张元济、商梦旦、王云五等六人。

资方代表态度强硬：“先开工，后谈判。”

沈雁冰等劳方代表针锋相对：“不行！谈判从无此例。”

第一次谈判没能结果。

第二次谈判于26日进行。沈雁冰把《复工条件》逐条向资方代表提出，要求同意。

资方代表正想讨价还价之时，忽然听到会议室外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一个凶煞似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闯了进来。

“本营长奉淞沪镇守使之命，前来给你们调解。你们双方各坐一边，给我坐好！”那军官高踞上座命令道。

他拿起罢工委员会的《复工条件》和资方表示能接受的答复条件，草草看了一下，大声说：

“你们工人不是要加工钱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嘛。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那不成。联帅（孙传芳）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我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

他这番话，双方都不赞成，可是却无一人作声。

“啦！”那营长突然拍案而起，威胁道：

“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

他说着就往外走。此时，王云五突然快步向前，拉住他，扑的跪在地下误用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劳您派兵来。”

那营长不置可否，扬长而去。

王云五返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

会议无法开下去，双方只得散去。郑振铎对沈雁冰说：

“这事真怪！莫非那个营长是公司勾结来演这出武戏的？”

“从王云五他们那种惊惧之色来看，决非造作，不象是勾结来的。”

当天下午，两百多职工自动集会，沈雁冰代表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上午发生的情况，并对大家说：“公司对上午发生的事情迄无表示，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很难接近。”

然而过了一夜，“商务”的资方突然让步了。在会议室里，双方代表经过一整天的“讨价还价”，晚上九时达成协议。由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沈雁冰走回家已是半夜。母亲和妻子还没睡，在等他。看他那兴冲冲的样子，也德止问：

“谈判有进展了？”

“已经达成协议啦！我们提出的复工条件，公司大部分答应了。”

“德鸿，半夜啦，快休息吧。看你这些天累得脸都瘦了。”

“妈，您先睡吧！明天要开大会，我还得准备一个。”他又对妻子说：“你也睡吧，德止。”

翌日上午，沈雁冰代表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

报告了谈判经过，解释了协议内容。他说：

“我们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力、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等等，这些在协议中都有比较有利的规定。这次复工，双方都作了让步。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只能如此结束。此后，我们工友们应努力扩大工会势力，设立宣传机构，经常对全体职工进行定期宣传。唯有如此，方能保障此次罢工胜利的成果。……”

全场职工热烈欢呼：“拥护工会！”“拥护复工条件！”“劳工万岁！”

一七、总主笔日夜战斗

沈雁冰返回上海后，即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上海《国民日报》。经他多方努力，已有眉目，终因法租界工部局不批准而告吹。

这时，他已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务，专门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局长，工作是负责翻印《政治周报》，向北方和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寄发中宣部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它文件。

夏末秋初，北伐军捷报频传，11月10日克服武汉三镇；11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中共中央计划请沈钧儒到杭州组织浙江省政府，并内定沈雁冰担任省府秘书长。

后来形势突变，夏超被孙传芳的军队赶出浙江，沈钧儒组织省政府一事已不可能。此时武汉急需干部，党中央于是改派沈雁冰前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

临离开上海前，他把许多文学书籍寄存到一个朋友家里，拍着书对朋友说：“也许以后我用不到了，也许再也没有我来用它们了。此时谁也不知道。”这时，他胸中激荡着一股投笔从戎、甘愿为革命献身的豪情。

12月底，沈雁冰和妻子把一对小儿女交给母亲，毅然抛雏别母，乘船奔向大革命的中心——武汉。

1927年的元旦，他俩是在轮船上度过的。年初，他们下了轮船，住进“军校”已安排好的房子——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第二天，沈雁冰前往“军校”报到，孔德止去妇女部报到，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和斗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是邓演达，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

2月上旬，“军校”发布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令为：

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于是，沈雁冰穿上新发的国民革命军灰布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设在两湖书院内的“军校”本部，跳到作为讲台的桌子上，向围在周围的学员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还给女生队讲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

“军校”分军事科、政治科、军事和政治并重。他准备好了一课，就轮流到军事科、政治科的各队去讲授。没有现成的教材，除了用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时编的社会科学讲义，他还要自己编写讲义。

不久，由原来的七所大学合并组成的武昌中山大学开学，沈雁冰应聘

担任了讲师。

他还介绍了郭绍虞等人讲该校教书。

这位青年共产党人在担任“军校”政治教官、“中大”讲师的同时，还兼任了总政治出版宣传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又要经常出度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召开的常会。在热烈的革命气氛中，他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着。他妻子也很忙，两人常常深夜回到家里才见面，因为家里才见面，因为疲累，夫妻交谈了几句，便倒头睡着了。

那时，蒋介石图谋公开叛变革命。他攻下南昌后，看到武汉已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就在南昌设立了行营，不久又提出要暂时建都南昌，反对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企图把国民政府置于他的肘腋之下。为了制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军事独裁，在武汉的共产党左派开始了对蒋介石的反击：一是拒绝建都南昌，二是发动恢复党权运动，宣传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沈雁冰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从报上读到：3月7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推翻了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议案，撤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务，也免去了张静江、陈果夫等右派的职务，左派取得了胜利。

一时间，武汉三镇欢声雷动。

沈雁冰冷静地想，蒋介石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那里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他的制裁呢？

4月初，中共中央鉴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动了沈雁冰的工作，派他到《汉口民国日报》社，接替高语罕担任总主笔。

这张《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其实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董必武是该报经理，毛泽民为发行人。

沈雁冰既调到报社，便把家搬到歆生路德安里一号，住在编辑部楼上的一间厢房内。

他的妻子也由妇女部调到农政部工作。

报纸应该怎样来办呢？他想，我过去主编过《小说月报》，去年在广州时，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编过几期《政治周报》，但是主编大型日报，这却是第一回呀？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还在上海，武汉的宣传工作由瞿秋白兼管。他便去找瞿秋白请示编辑方针、宣传内容。

“雁冰，你当总主笔还是很合适的。”瞿秋白说，“当前，我们的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很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

“你看蒋介石会怎样？”沈雁冰问。

“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他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宁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瞿秋白显得忧虑地说。

4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南京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侯绍裘、萧楚女等人在这次大屠杀中道德倒下了。

消息传到报社，沈雁冰悲愤地说：“果然不出秋白所料！”

上海、南京、广州发生的惨案，激起了共产党人和许多国民党左派的极大愤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武汉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怒潮……。这些消息，经过沈雁冰签发后，都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出了。

他每天把编辑们编好的稿件加以选择、审定，加上标题，确定版面，然后再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但要闻版的消息常常需要等待，几乎每天都要等到夜间一两点钟，他才能把稿件发完。又因为报社印刷厂工人少，排字技术差，他差不多每天要到排字房去指导如何排版。因而经常彻夜不眠。

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后，他们的报纸刊载了“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个宣言除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外，提出“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的，国民革命应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强调了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必要。

《汉口民国日报》天天收到各地反动势力、顽固派骚动的消息，以及农民协会反击的消息。他让编辑们据实报道，并为这些消息加了一个总标题：《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有一天，陈独秀把沈雁冰找去，对他说：“你们的报纸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

现在外面都在造共产党的谣，说什么‘共产共妻’，你们报上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文章。”

“我们民国日报没有记者，所有消息都昌工会、农协和省政府供给的，这些消息我都看过，说的都是实际情形，无非是揭露土豪劣绅，没有‘共产共妻’的消息呀！”

“那是他们造谣，但是现在这种消息登多了，国民党里有人就害怕，说革命到自己头上了。”陈独秀又说：“我们有的同志乱讲话，说孙夫人廖夫人也有封建思想。”

“你这些消息是听谁讲的？”沈雁冰问。

“国民党上层分子。”

“我劝你不要听信这些谣言，总书记同志！”沈雁冰恳切地劝道。

“我提醒你注意少登些工农运动的消息！”陈独秀又说。

回到报社，他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了董必武，又问：“你看怎么办？”

“不要理他，我们照样登。”董必武果断地答道。

此后，《汉口民国日报》继续报道和刊登工农运动的消息和文章。这时沈雁冰刚过而立之年，政治上已很老练。有一次，他收到吴奚如转来的一篇通讯，报道南京政府和黄埔系内部的情况动态，附信要求能在报上发表。他当即回信，指出这篇通讯具有相当的机密性，不宜在报上公开发表，只能打印出来，供国共两党领导部门传阅。

“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等地反动派大肆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湖南各团体请愿团到达武汉，报告长沙事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沈雁冰知道国民党中央宣部直属的《中央日报》不登这一消息，便决断地说：“我们来登！”他不顾阻挠，连续两天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湖南请愿团的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和《长沙事变经过情况》。并发表他自己撰写的社论，大力声援湖南请愿团。

进入 6 月以后，《汉口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反动派屠杀工农的消息，揭露白色恐怖活动的猖獗。他综合各消息加上标题：《宜都县党员之浩劫》、《锺祥避难同志为锺祥惨案呼援》、《一个悲壮的呼声》、《罗田惨案请愿团之呼吁》、《死难农友的最后希望》……

沈雁冰后来说：“这些小县城发生的动乱和惨剧，那里同志们不幸遭遇，以及我在社论中讲到的反动派的阴谋，‘苦肉计’，残忍等等，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写《动摇》时，就取材于这些事件。”

天、他和妻子好不容易碰在一起休息了。孙伏园却来找他，商量组织文学团体“上游社”的事。孔德去开门时，孙伏园叫她“沈太太”。

“你叫我什么？”孔德瞪圆双目问道。

“哦，哦，孔同志！”孙伏园连忙改口。

她听了，才放孙伏园进屋内。

作家宋云彬曾是《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他后来写道：“雁冰的太太孔德女士，是富有男子气概的……。她在汉口时，最忌人家称她沈太太，她认为女子应有其独立的人格，称其为某太太，实在是不敬。雁冰呢，身材短小而极喜修饰，尤其对于头发，每天必洒生发水，香喷喷的。所以孙伏园就常开玩笑，称德为‘孔先生’，而称雁冰为‘孔太太’。”

这时，孔德已怀孕八九个月。沈雁冰见她行动不便，另上形势紧张，在武汉很不安全，就在六月底托人照顾，将她送回上海。

夏日炎炎，酷暑将临。汪精卫步步进逼，加速宁汉合流，密电谋公开叛变革命。

而陈独秀却节节退让，拱手让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革命形势在日趋恶化。

7 月初，沈大有作为冰整日整夜工作在报社。他新闻记者分析着收到的消息，食不辩味，睡不解衣，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

一八、上下庐山

“长沙事件”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加速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被断送的形势越来越严重了。

6 月底，沈雁冰把快分娩的妻子送上开往上海的英国轮船，让妻子带走了他们的绝大部分行李，只留下了他的夏衣，准备应付突然的事变。

7 月 8 日，“电视机汉”合流反共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他写完最后一篇计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就给予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当天就与原任《汉口国民日报》发行人的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

他和宋云彬、于树德三人搬到前花楼法租界一家大商号的栈房里隐蔽起来。两天后，汪精卫托人转给他一封信，希望他继续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他看完信，鼻子里“哼”了一声，就随手扔到一边。

7 月 23 日，沈雁冰接到党的命令，要他去九江找某个人接头，并交给

他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让他带去交给党组织。

他和宋云彬及另一个姓宋的，乘日本轮船“襄阳丸”抵达九江后，找了个旅馆住下，然后一个人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

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对上接头的暗语之后，店老板伶内陆走进屋里。他见屋里坐着两个人，原来是董必武和谭平山。董必武对他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

“那我怎么去呢？”沈雁冰着急地问。

“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成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这里。”

他取出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交给予董必武。董必武没有接，对他说：“你带到南昌去交给予那里的党组织。”他不敢多耽搁，转身出来就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不卖票。他只好走出车站，心想：这下怎么去南昌呢？

忽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咕他的名字。转头一看，是几个同船来的熟人，也是要去南昌的。

他们说，可以先上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他们还告诉他，昨天恽代英从牯岭翻山过去了，郭沫若也上了牯岭，要去南昌。

听他们这么一说，沈雁冰决定上庐山。回到旅馆，原来准备换船回上海的宋云彬他们，听说他要去庐山，也要跟着他上庐山游玩。他不便说明自己去庐山的目的，只好同意。

第二天上了庐山，住进庐山大旅社。在牯岭大街上，他无意中遇见了夏曦，就向他询问下山的路途。夏曦说：“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

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所以他上午又匆匆下山回九江了。”

“怎，怎么会这样呢？”沈雁冰带点口吃地说，“哪，哪我怎样去南昌？老夏，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夏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他，说：“我明天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好回到旅馆。晚上闲着没事，想起孙伏园约他给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摊开纸纸写起来。写着，写着，想到排行第二的妻子曾说过他的话，就顺笔接着写下去：

“孔三姑说我是理性的人，是的，过去的事，即使是欢乐的纪念，也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是最不懂怀旧的。但是一个人当闲却的时候，在幻灭的时候，在孤身寂寞的时候，不由然而然的总想记他的好友，他的爱妻，他的儿女，还有他所想见而未见的人……”这是篇通讯，由于其中写宋云彬的几件事，他加题目是《云少爷和草帽》后来发表在1927年7月29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

那天晚上，他到半准备才上床。他是很爱清洁的，临睡前，把干净的被褥抖了又抖。

哪知他这一夜无法安枕。

第二天早饭后，他匆匆去找夏曦，见夏曦正在整理行装。夏曦对他说：“形势变化很快。

从牯岭下山去南昌，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

我也马上要走。”

沈雁冰绝望了，只好准备回去。刚走到旅馆门口，遇到宋云彬他们从里面出来，拉着他说：“走，走，游山去！”他想，反正要回去了，何不趁此游鉴一番呢。他们游览到傍晚才尽兴返回旅馆。

这天半夜，沈雁冰突然患了急性肠胃炎，一夜腹七八次。第二天就病得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那时山上没有医生，又买不到好的止泻药，他只能靠吃八卦丹止泻。过了五六天，他才能起床稍微走动，没有事干，他就让人买了本英文字典，翻译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他们的儿子》（英文版）。

宋云彬和另一个姓宋的，游过庐山后就向沈雁冰告辞，下山回上海去了。

8月初的一天，沈雁冰见到旅馆擦房在交头接耳，象是议论什么事情。一打听，茶房说南昌出事了。他原来不知道南昌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党要他去南昌干什么。现在听说南昌出事了，于是慢步走出旅馆想进一步打听消息。才走到大街上，他就碰到了熟人范志超。这位女共产党员在武汉时是海外的干部，跟茅盾的妻子孔德止是好朋友。此时见到沈雁冰，惊奇地问：“怎么，你还在这里？”

沈雁冰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她。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你的旅馆去说吧。”

他俩到旅馆后，范志超说：“你不了解外边情况吧？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我们把朱培德国的捕鱼兵缴了械！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具体情况怎样，我也不清楚。”

他顿时恍然大悟：党要我去南昌是让我去参加南昌起义的。然而，我却因病滞留在山上了！

范志超说：“这几天汪精卫、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许多人要来开会。张发奎、黄琪翔是昨晚上的山，他们之中认你的人很多，你千万不要出门走动；他们开完会就会走的。有什么消息，我来告诉你。我住在庐山管理局局长家里，在庐山没有任务，过些天就要回上海。”

过了两天，范志超来看沈雁冰。他见到他已经译完工了《他们的儿子》，赞叹道：“这么局面就译完了？真是神速！”

他对她说：“志超，我也要回上海，你想法替我买一张船票行吗？”

“行！我去找石局长，让他去买船票。”范志超满口答应。

“最好能预先买好，一下山就上船，不在九江停留。”他又说。

“这好办。你我就一路走吧，我也好有个伴。”她答道。

8月中旬，沈雁冰和范志超乘轿下山，直接上了轮船。这也是一艘日本轮船。他们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舱。他感到有点别扭：两人不是夫妻啊！

范志超看到他局促不安的神态，笑着解释说：“这里不是起点，很难买到两个女客同一间房的船票。与其和陌生的男客在一起，还不如和你同一间。”

在船上他俩不敢走动，怕碰到熟人，就在房舱里闲谈。沈雁冰知道范志超的丈夫朱孝恂已经去世。她和汉口市妇子部长黄慕兰，都是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活动能力很可，而且长得漂亮得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有名。一些单身男子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他还听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在热烈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是个塌鼻子，瞿秋白曾对他说：“在你没有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范志超。”瞿景白把这番话写在信

上寄给她；她在信上批道：“女人要求男人的并不是鼻子。”把信退还瞿景白。瞿景白就高兴地到处给人看。于是就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追问范志超：“女人要求于男人的到底是什么呢？”她在宿舍里被纠缠得受不了，常常在夜间跑到对面沈雁冰夫妇的宿舍里避难。

在船上，沈雁冰问范志超：“你跟瞿景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没有丝毫关系。”范志超说，“我活了这么大，没有爱过任何人。我嫁给朱孝恂，那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工作需要。你知道，朱孝恂比我大十多岁。我中学时跟一个同学好过，可惜他早死了。”

范志超打开手提箱，拿出一迭情书给他看。这些情书都是黄琪翔写给她的。黄琪翔是张发奎手下的一个军长，年轻，能打仗，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国民党将领。

沈雁冰接过这些情书翻看着。他想不到黄琪翔能写如此缠绵悱恻的情，就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黄琪翔呢？”

“带兵的人是捉弄摸不透的，今天他能这样写信，明天也许抛开你就走了。我有点怕他。”

范志超答道。

在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弥漫着浓厚的浪漫气氛。透过瞿景白追求范志超，以及范志超对瞿景白、黄琪翔的态度，沈雁冰对“时代女性”的认识又丰富和深入了一层。

次日下午，船到镇江。沈雁冰考虑在上海码头容易碰到认识自己的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范志超，她也赞成。于是沈雁冰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给了范志超。

船一到镇江，他就登上了码头。

镇江码头上，军警在搜查旅客。一个当兵的过来搜查，发现了沈雁冰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又见他没行李，就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他心想，这张抬头支票不经过商店担保，也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急中生智，低声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吧。”

那个兵迟疑了一下，便把支票塞进口袋里，放他走了。

沈雁冰在镇江上了火车，正要进车厢，却看到已制造蒋介石的吴开先等人在里面，立即收回脚，站在车门旁。车一到无锡，就跳下车，在无锡找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乘夜车回到上海家里。

他把失掉那张支票的事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先向银行“挂失”，然后由共产党员蔡绍敦开设的绍敦电器公司担保，取出了那两千元。

一九、笔名“茅盾”的由来

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按黑名单，搜捕共产党员。

沈雁冰于1927年8月下旬潜回上海。他回到东横到滨路景云里的家里，只见母亲和一双小儿女。母亲告诉他，孔德止因为小产，住在日本人办的福

民医院里。于是他前往看望。

“德鸿，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你，我对他们说，你到日本去了。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呢？”孔德止问。他没有马上回答。心想：和我同住在这条弄堂的，有许多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于是他对妻子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

他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他想：找职业显然不可能，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两天后，妻子回到家中，只是仍有低烧，还需卧床调养。

他就在妻子的病榻旁摆上一张小桌，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看书、写作。

还是去年在上海时，沈雁冰就听说，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梅电龙追求唐棣华，简直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

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当时，沈雁冰就觉得“这件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

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一个小会。会开完后，适逢大雨，他撑起雨伞正想走，忽然听人说：

“雨这么大，叫人怎么回去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唐棣华，见她没有带伞，就说：

“来吧，我送你回家。”两人合一把伞，雨点打在伞上腾腾地响。他偷眼看了看紧挨在身旁还泛着兴奋的红光，越发显得美丽动人。顿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仿佛是电影的片断。他听不到雨打纸伞的声音了，忘记了还有个同伴。

后来他写道：当时，“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中，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就是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写下了第一个小说大纲。

后来，沈雁冰去到武汉，忙于编辑《汉口民国日报》，就把这个小说大纲忘记了。

然而，他在上海时见到的一些时代女性又在武汉见到了，她们的性格更加显露。当大革命失败时，他又见到许多人出乖露丑，发狂颓废，悲观消沉。

在武汉开往九江的“襄阳丸”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主人的用意大概是遮挡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沈雁冰发现这是他在上海和武汉都见过的黄慕兰和范志超。于是他一年前写下的那个小说大纲，突然又浮上了他的脑海。但因为任务在身，他仍然未能动笔。

现在，沈雁冰坐在妻子床边，翻出原来写的那个小说提纲，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又作了多处修改，然后动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

从9月初开始，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他打算给接替郑振铎编《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看一看。可是署什么名字呢？当然不能署沈雁冰。原来用的笔名“玄珠”、“郎损”等，在武汉写文章骂过

蒋介石，也不能用了。

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于是，一种讽刺别人孔嘲笑文人积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而，写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他把《幻灭》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叶圣陶，叶圣陶连夜读完，第二天，他看到沈雁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我准备把你这部大作登在九月号上，今天就发稿。”沈雁冰说：“我还没有写完呢。”

“这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九月号再有十天应酬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

沈雁冰只好表示同意。叶圣陶又说：“你这署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草头，《百家姓》里有，姓‘茅’的也很多，不会引起注意。”

“好吧，就照你说的，把‘矛盾’改成‘茅盾’吧。这一来，我这个姓沈的，以后又要姓茅啦。”沈雁冰说着笑出声来。

1927年9月号《小说月报》出版了，茅盾的《幻灭》立即引起了众多读者和作家、评论家的注意。人们纷纷猜测“茅盾”是谁。诗人徐志摩写信给叶圣陶询问。叶圣陶回信说：

“作者不愿以真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徐志摩想，从作品内容之丰富和文笔的老练看来，这个“茅盾”一定不会是新作者。有一天，他去看戏，在戏院里碰到宋云彬，高兴地向对方说：“圣陶不肯告诉我，我已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

“对！对！是沈雁冰。过去有些人以为雁冰只能翻译、写评论，不能创作，这下他们的口可要关上了。”

这以后，茅盾写完《幻灭》，又接着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二十、鲁迅秘密来访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 1921 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 1921 年 1 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 1921 年 4 月至 12 月间，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 48 次。

早在 1921 年 8 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923 年 10 月，他又写了《读 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

当鲁迅的《阿 Q 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地指出：《阿 Q 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 呐喊》中，他说“阿 Q 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 年 10 月 12 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

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 9 月 27 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 10 月 3 日午后。

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是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

二一、亡命日本

茅盾写完《追求》，已是1928年6月底。有一天，陈望道来看他。闲谈中，发现他久困斗室，精神上很苦闷，身体也不好，就说：“雁冰，天气

这么热，你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不真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

茅盾觉得这话有道理，而且他也知道，去日本很方便。（当时，中国人去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他说：“我怕不懂日语，到那边有困难。”

“这没关系，我的女友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陈望道又说，“秦德君现在化名徐舫，在我家已住了几天，她也要到日本去。”

“哦，那我路上就有伴了。”

秦德君是四川人，1922年在党办的平民女校高级班读书，茅盾教过她英文。他还记得，秦德君那时平民女校工作部部长，恽代英称她是“黄毛丫头部长”。

第天，茅盾去见了秦德君。她拿出二十五日元，托他买船票。

7月初，他叫了出租汽车，去陈望道家接秦德君。秦德君看到他换了一身灰色西装，黄色鞋擦得亮亮的，剃去了八字胡，显得很精神。就笑着招呼：“沈……”茅盾止住她，悄悄说：“记住，我现在的名字是方保宗。”

“我的化名是徐舫。”她也低声茅盾说。

来到码头，他们乘上了开往神户的一条日本小商轮。经过三昼夜漂泊，船抵神户。

宪兵挨个检查旅客。

他们两人站得很近，行李也靠在一起。日本宪兵把他俩当成了夫妻。秦德君心想：“我们都是亡命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多说呢。”茅盾和秦德君又乘上从神户驶往东京的火车。开车不久，一个穿西装的人过来同茅盾攀谈。见他不懂日语，就改说英语，询问他的姓名。

茅盾把预先印好的“方保宗”的名片给他看。他又问茅盾在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游玩哪些地方。茅盾懒得同他周旋，只简单地回答“是”或“不”。而他却表示得十分亲热。

车抵东京。吴庶五带茅盾住进“本乡馆”，把秦德君安排在“中华女生寄宿舍”。

吴庶五和秦德君刚走不久，在火车上和茅盾攀谈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来了。仍用英语，表示愿意帮忙。茅盾觉得这人奇怪、可疑：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时有一个穿和服的人走进房间，用中国话和茅盾打招呼。他一看，原来是熟人，武汉时期《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启修。未等茅盾开口，他用日语向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人笑笑，恭敬地向茅盾说了声“打拢”，便走了。

“这个古怪的日本人干什么的？”茅盾问。

“他是特高科的便衣。”陈启修答道。

茅盾知道，日本警视厅特高科是搞情报工作的，便说：“他们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的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人员怎么不找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你怎么认识他？”茅盾问。

“哈哈，我来时，他就来拜访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猜他是特高科的便衣，一语点破，他也只好承认了。”陈启修大笑道，又说，“我是辞掉《中央日报》总编辑之后，直接到日本的。”

茅盾把自己的情形也对他简略地说了一下。他邀茅盾到他房间里去坐坐。茅盾拉上门，就跟他过去。陈启修的房间里堆着许多日文书籍，也有中国杂志。他拿出一本书送给茅盾，书名是《酱色的心》，作者陈豹隐。

茅盾猜想这是他新和笔名。翻开一看，是短篇站说集，第一篇即名《酱色的心》。

这使他大为惊异，想不到这位法科教授也来写小说了。他指着书说：“这《酱色的心》是……”

陈启修说：“不瞒你说，‘酱色的心’是比喻我在武汉时期，共产党说我是顾孟余的走狗，是投降了国民党，这样，我的心就是黑的；但地国民党方面，仍把我看成忠实的共产党，我的心是红的。唉，你看，我介于红黑之间，岂不成了酱色？”接着又说：“蒋介石仍看我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对我下毒手，到那时，顾孟余一定还要打我这条落水狗，所以我还是到日本来做亡命客。”

茅盾问：“豹隐二字，何所取义？君子豹变，何不取豹变呢？”

“我是豹变以后就隐居了，所以用豹隐。”

茅盾心想，这言外之意岂不是说，他不做共产党员了，当然更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所以要隐居吗？当他拿了《酱色的心》要走时，陈启修又说：“你不懂日本话，如果有事要我帮忙，请不要见外，尽管来找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茅盾坐在灯下读《酱色的心》。可是陈启修刚才的话还在耳边响，心想，这个陈启修跟武汉时期所见的，似乎有点变了。现在他坦然地自称为“酱色的人”，这不仅是自我解嘲，也含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藐视呵！

7月上旬，他盘腿坐在铺席上，完成了东渡日本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自杀》。写环小组与一个革命男性恋爱并发生了关系，在他离她前去作战后，她孤寂、怅惘，不被人理解，无法解脱厄运，最后自杀。

这是一篇与他的第一个短篇《创造》很不相同的小说。茅盾说，“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青年们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他写道：“象娴娴那样的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地属于多数。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他在异国陌生的环境和孤寂的心情下，创作了《一个女性》、《色盲》、《昙》、《泥泞》、《诗与散文》、《陀螺》等短篇小说。

后来分别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宿莽》之中。

从7月上旬到11月底，茅盾在东京一边写作，一边向陈启修学习日语。学会了问路、买东西等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语句。

12月初，住在京都的杨贤江夫妇给茅盾回信，劝他到京都去，说那里的生活费用比东京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市蔚蓝色，环境幽静，尚有余屋可以代他租下。于是茅盾决定前往京都。与他同行的有秦德君。异国寂寞的生活，使他们相互接近，又相互爱恋，又同居了。

在开往京都的火车上，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前来和茅盾攀谈。原来是初抵日本时那个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茅盾想，难道为了我，他也转移到京

都么？后来才知道，这人是为了将他“护送”到京都，移交给京都的另一个便衣。

来到京都高原町之后，他先住在杨贤江家里。不久，便和秦群搬进一排独门独户的“赁家住宅”，与高尔柏、高尔松兄弟夫妇为邻。他俩住的是四号门牌三间。这里距贤江的家仅一箭之遥。屋前有个小池，池边种了一排队樱花树。透过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山并不高，并排五六个山峰，“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象钻石装成的宝冕。”

1929年的春天来了。茅盾门前小池旁的那排樱花树，缀满了淡红色的蓓蕾，先开的一株已经浓艳得似一片绯红的云霞。茅盾想，在樱花成片开放的地方赏樱花，一定是异常的赏心悦目。于是在一个明朗的晴天，他与秦德群、杨贤江夫妇、高氏兄弟夫妇一行，乘车前往岗岚山，尽兴观赏了樱花。

从岚山回来，茅盾继续埋头创作长篇小说《从牯岭到东京》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太阳社和创造社一些激进作家的围攻。他们宣称“这一次的战斗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与不长进的所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者的战斗！”这使茅盾十分苦闷。

他曾说，“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此时，他对《幻灭》、《动摇》、《追求》进行了反思，发现自己作品中是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决心振作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写出新的作品。前些时，他从秦德君那里听到了革命女性胡兰畦的身世，感到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便融合以往的见闻，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他初次用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十八岁爱上了在川军团部当文书的姨表兄。但是她父亲作主把她嫁给了苏货铺的老板、姑表兄柳遇春。这使她感到无比的苦恼。在“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她冲出了柳遇春的“牢笼”。她来到泸州师范当教员。但是这里的“新派”人物却使她感到厌恶。后来，她借着一个机会，来到上海，投入革命斗争，最后，在“五卅”的暴风雨中，梅女士终于以勇敢的战士姿态，出现在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茅盾很喜爱他笔下的梅女士。他说，梅女士在“生活的学校”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发展而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以为这是我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发展，而且是合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

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稿，他只用了四个月时间。

在将前四章原稿寄给《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时，茅盾附上一封信。他写道：“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他又告诉郑振铎：“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以后他始终未能创作出来。

日本四岛的寒冬再次降临了。1930年2月1日，他为《虹》写下了一

个短短的《跋》：

“右十章乃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所作。当时颇不自量棉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八月中因移居搁笔，而后人事倥偬，遂不能复读。忽忽今已逾半载矣。

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或者屋后山上再现虹之彩影时，将续成此稿。”

在亡命日本的一年零十个月中，茅盾在寂寞清苦的生活中辛勤笔耕，结出了累累硕果。

计有：长篇小说《虹》1部，短篇小说7篇，散文《叩门》等12篇，文学评论和学术论著《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中国神话研究ABC》、《西洋文学通论》、《关于高尔基》等14篇，总共一百多万字。

1930年4月，樱花又烂漫开放，招引游客。茅盾却已无心观赏，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于是和秦德君搭海轮回国。到上海不久，他们两人就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二二、智斗尾巴

1930年4月5日，茅盾从日本偷偷回到上海。几天前，他听冯雪峰说，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左翼作家联盟”。有一天，杨贤江来对他说：

“有人想和你谈谈，你是不是愿意？”“他是谁呢？”“冯乃超。”茅盾知道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角色，日本留学生，但未曾见过面。于是告诉杨贤江：“那么就请你代我约他在家里见面谈谈吧。”

第天，茅盾和冯乃超见了面。原来冯乃超是代表“左联”来邀请茅盾参加“左联”的。

他拿出一份“左联”的纲领给茅盾看，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仔细看完纲领及所附的行动纲领，说“很好”。冯乃超问他是否愿意加入？“照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

茅盾直率地说。“纲领是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冯乃超诚恳地说。茅盾也就不再推让。他又叫冯乃超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于是，在1930年4月下旬茅盾成为“左联”成员。

他加入“左联”以后不久，就发现“左联”的实际行动和“左联”的纲领并不一致。

对于“左联”组织的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他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都没有去参加。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他这种行动很不满意。冯雪峰听到后，就替茅盾解释：“茅盾年纪大，身体弱，不必要求他参加这些活动吧。”

后来，茅盾也听说了。心想：我身体弹头倒是事实，年纪大只能是个借口，我不过三十多岁，大什么啊！参加个游行，夜间去街上贴贴标语，我

也能够办到。唉，我不参加这些活动，是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又是党组织规定的。他此时已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不便出面反对。

他参加“左联”后，还发现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心中很纳闷。问了冯雪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多数人不同意。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他还告诉茅盾，他已向叶圣陶做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茅盾表示他不赞成“左联”这种“关门”的做法。冯雪峰说，鲁迅也反对这种做法，可是一些人偏要坚持这样做。听了这话，茅盾恍然大悟：哦，为什么我从日本回来那天由叶圣陶陪伴去看望鲁迅时，鲁迅对“左联”的事一字不提，原来是这个缘故。

关于“左联”的这种情况，茅盾曾与鲁迅谈到。鲁迅大概出于对党的尊重，对茅盾只是笑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第二年5月下旬的一王码，冯雪峰找到茅盾，要他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他对冯雪峰说：“雪峰，‘左联’有那么多机构，我能力弱，恐怕不能胜任。”雪峰考虑后说：

“试试罢，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

后来，瞿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茅盾与鲁迅、冯雪峰一起商量，创办了由丁玲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北斗》。这是“左联”为了壮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所作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后，茅盾再也不能“自由主义”了。他的活动、会议都多了起来。由于经常出入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9月的一天下午，茅盾在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完“左联”执委会。出来时，他和冯雪峰边走边谈。

“叮当，叮当” 列电车到站了。两人坐上了前面的头等车。车内乘客很少，他俩坐在一起。电车驶过了一两站，茅盾突然发觉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三等车厢内，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汉子在盯着他俩看。他惊疑地想：“啊，他是在注意我呢，还是在注意雪峰？”

为了核实，茅盾就换到对面的空座上。果然，那人也换了个位置，仍盯着他看。

“雪峰，你过来。”待冯雪峰坐到他身边后，茅盾又说：“那个家伙盯上了我们，得想办法甩开他！到了南京路我就下车，那人如果跟着我下车，你就没有事了。”

南京路到了，茅盾迅速跳直电车，在路上逛商店。他回头看看，那个家伙果然紧盯在后面。这种情况，虽然他还是第一次遇上，但却毫不惊慌。几年来的“地下”生活，他已练就了与国民党特务“斗法”的许多本领。加入“左联”后，尤其是担任行政书记以来，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还是在四月里，他正和鲁迅、冯雪峰筹备出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发生了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暗杀的事件，就使他思想上有了准备，时刻提防特务的盯梢或逮捕。他自认自己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仍然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工作着、斗争着。哪怕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血牺牲，也是甘心情愿的。然而敌人休想轻易地逮捕我！

茅盾发现：这特务盯梢有一个规律，就是茅盾进入单门面的商店，他留在门口等候；茅盾进入大百货公司，他则尾随着在商店里游荡。茅盾顿时

心生一计，直奔常去的交通银行。因为这家银行除了大门，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侧门。

茅盾进了银行大门，来到取款处，装着要取款，顺便回头望了一眼，见那个家伙也跟了进来。但他看到茅盾注意他，转了一圈又走了出去。

“鬼东西，你在大门口恭候着爷爷吧！”茅盾在心中骂了一句，然后急忙抽身从侧门奔出，跳上一辆黄包车，喊道：“快拉！”

越过几条马路，他回头扑克清后面确实无人跟踪，才在一个电车站下了黄包车，付了钱。

这时，一辆电车正好驶来，他马是跳动了上去。过了几站，又换了一次车，才安全回到家里。

第天，冯雪峰来看他。听了茅盾的“历险”经过，不禁哈哈大笑，说：“这叫做：文弱秀才被狗咬，急中生智甩尾巴。好，好！妙，妙！”停了一下，他对茅盾说：“雁冰，那个中学，以后不能再用作开会的地点了。”

茅盾同意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冯雪峰来邀茅盾一起去看望鲁迅。才跨进门，鲁迅就笑着迎上来说：“哈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天有大闸蟹，你们就留下吃蟹吧！等一会儿三弟也要来。”

在等候周建人的时候，冯雪峰向鲁迅谈起了茅盾甩“尾巴”的事。鲁迅听了茅盾说：

“你这位‘方保宗’真不简单。今天，我正好用大闸蟹为你老弟压惊。”

在谈话中，茅盾告诉鲁迅，他已向冯雪峰请了长假，想写长篇小说《夕阳》。

鲁迅说：“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写了。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还是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既然雪峰已经同意了请你长假，那你就快点写吧。”

二三、罗美老弟

秋风萧瑟，黄叶凋零。茅盾参加“左联”已有四五个月了。有一天，他和妻子孔德止晚饭后谈天，两人想起8月间，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曾对他们说：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也要回国了。还说：张琴秋生了一个女孩。

“我和弟弟已有好多年不见了，真想他呵！”茅盾说。“我们那个侄女一定很可爱。

不知她象泽民还是象琴秋？”孔德止问。

“等他们回到上海，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嘛。”

“中秋节快到了，如果中秋时能跟老二一家团聚，该有多好。”

“他们会赶上过中秋吧？”

茅盾回想起弟弟读了《幻灭》后给他写的那封信。那是沈泽民到了莫斯科之后，写给他的第二封信。信里说，读了《幻灭》，知道了“你自己的经历”，“你并且曾经到过庐山。这些生活无疑的使你在技术上成熟；我想得

见你在作小说时，笔下已经非常的自由，觉得许多实际经验供给你丰富的材料，使你左右逢源。”“文学作品的读者在中国的文化条件下只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忠实地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我以前感觉到单翻译的无味，现在你果然一变而专注于创作，这我认为是非常好非常需要的一种改变。”

当时，一些挂着“革命批评家”牌子的人攻击《幻灭》“意识不是无产阶级的，依旧是小资产阶级的”，说什么“茅盾所表现的倾向当然是消极的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甚至在茅盾被迫流亡日本后，中断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在这样困难和思想苦闷之际，弟弟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首都莫斯科给他寄来的这些话，对于亡命异邦的他，是何等巨大的鼓舞呵！

沈泽民原名沈德济，早年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的成绩名列前茅，英语也很好，曾和哥哥合译科普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在1918年的《学生杂志》上边裁。他也很喜爱文学，从茅盾自己出钱并主编的桐乡《新乡人》杂志第二期（1919年10月1日出版）上，可以看到他写的两篇小说：《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

比他哥哥茅盾创作小说还要早八年呢。茅盾主持革新《小说月报》，也得到了这位弟弟的很大支持。在这封谈论《幻灭》的信中，沈泽民对《幻灭》的人物、题材、主题，都有中肯的评价。茅盾深感弟弟是他的知音。

沈泽民的这封信，在1929年3月3日的《文学周报》刊出时，题目叫《关于幻灭

茅盾收到的一封信》，署名：“罗美”。这是他在苏联时用的假名。

茅盾知道，沈泽民是大革命前一年随同刘少奇等去苏联的，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赤色）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张琴秋则是1925年秋派往苏联学习的。

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后，沈泽民就留在苏联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考上了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两年时间里，他每晚学习都到深夜，加上莫斯科的供应差，后来得了肺病。

然而他不了解的是，这年——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了纠正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是属于最先回国的。他身上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重要指示，共产国际因此决定他单身绕道法国，再乘邮船回上海，这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共产国际通知中共说，他回国用的假护照上填的姓名是李明扬，乘的是法国某邮船，抵达上海后将住在新世界旅馆。

中共中央专门接待沈泽民的几个交通员，天天看报上外国轮船进出上海港的报导。

一天，报纸预告法国那艘邮船将于明日上午到达。于是第二日上午十一时，一位交通员来到新世界旅馆，看帐房间挂的旅客名牌上，没有“李明扬”，不禁大吃一惊。他以为是别的交通员先接去了。可是回去一问，并没有人去过。这个交通员再次来到新世界旅馆，找一个熟识的茶房探询，才知道这天上午九时，确有一个叫李明扬的来住旅馆，但是半小时后就离开了。这样，就证明化名李明扬的沈泽民确已抵达上海。然而他为什么又匆匆搬走呢？到哪里去了呢？

交通员来到茅盾家，将这些情况对茅盾说了后，问是否来过。茅盾告

诉他没有来过。

于是他们又到沈泽民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朋友探听，也无消息。这使中共中央负责人十分焦急，打算在报上登寻人广告。他派人先到茅盾家询问沈泽民有无外间人不知道的小名。

茅盾告诉来人，泽民并无小名，母亲一向叫他“阿二”。

经过商量，他们共同拟定了一条启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只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

这一条启事在上海各报上登出后，过了十天，茅盾仍不见沈泽民来，他对中共中央派来的人说：“看来，我们登的启事内容太普遍，即使泽民看到了，以为阿大、阿二怎样怎样，未必一定是指他。”

商量后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登第二次启事。茅盾向来人提出，可以用沈泽民在莫斯科用的假名“罗美”。来人则说落款可用秦邦宪的假名“博古”。于是又在上海各报上登寻人启事：

罗美老弟，有事相商，即来某某处。博古。

然而仍然象石沉大海。茅盾只好写信拜托陈望道、邵力子，请他们探询南京政府最近有没有秘密捕人。结果也是没有。

“泽民到底去哪里了？”茅盾焦急地问孔德止。

“琴秋呢，有没有回来？眼前中秋节要到了。”孔德止也焦急得很。

一个月后，孔德止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杨之华。她说：“你们看，谁来了？”

“啊！泽民！泽民，是你啊！”茅盾夫妇一起惊喜地喊道。

“之华，你怎么找到泽民的？”孔德止问。

“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在那家工厂外面徘徊，走近一看，竟是泽民！”杨之华答。

“泽民，我们找得你好苦啊！”茅盾说。

“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穿着一身工人服装的沈泽民幽默地说。

孔德止赶快端来了洗脸水，让弟弟洗脸，又拿来茅盾的衣裳叫他先换上。茅盾削了只大苹果，递给弟弟。然后，听他叙述“失踪”的经过：

那天他下了法国邮船，按照事先联系住进新世界旅馆。可是还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人来找他，而且称他“师长”。两人相见，才知是误认。他估计还会有人称他“师长”，要他栽培等等，决定立刻搬走。在虹口一个广东人家，是为语言不通，彼此可以少说话。

他还得预防说梦话露了真相。因为他自称是乡下来的农民，不识字，自然不看报。

茅盾两次登报找他，哪会想到他边报也不看呢。他也曾到出版左派书籍的书店去，希望遇到熟人，谁知第一次去，他就瞥见了托派王独清，从此他就不敢再去书店了。为什么不找郑振铎等人呢？茅盾不知道，“四·一二”以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只知道国内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也认为郑振铎等人都靠不住了。最后，他打算进工厂做工，心想在工人中间一定可以找到党。他买好了工人服装，天天穿上到一些工厂门外找机会进工厂，却不料遇见了杨之华。这样，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后来，茅盾和沈泽民了解到，确实有一个李明扬师长，原来是李烈钧

的部下。现在这个李明扬师长，是有职无兵，蒋介石每月只给他一点维持费。

沈泽忆回到上海不久，张琴秋把女儿玛娅送进国际儿童院，与另一位女同志结伴，经满洲里，也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泽民一起到茅盾家探望，未见到母亲。茅盾告诉弟弟和弟媳：他 1930 年春回到上海后，下半年母亲就迁回乌镇定居，但每年必来上海过冬。

并说他每年至少要回家乡一次，或者接母亲来上海，或者送老人家回乌镇。茅盾还说，得到他要回上海的消息后，本想写信报告母亲，因一时找不到他，只好暂时瞒着母亲。

过几天，自己就要回乌镇去接母亲。

当沈泽民和张琴秋第二次来探望兄嫂时，茅盾已把老母从乌镇接到上海过冬。母子见面，陈爱珠一只手拉着二儿子泽民，一只手拉着二媳妇琴秋，喜泪盈眶，乐得合不上嘴。只是听说孙女玛娅留在苏联了，她不能见到，脸上现出了不快。儿子、媳妇赶快劝慰，大孙女亚男和孙儿阿桑偎到她身旁，老人才又开颜欢笑。

这以后，沈泽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张琴秋仍从事女工运动。

1931 年 4 月底，沈泽民穿着西装革履，张琴秋是旗袍烫发，来向母亲兄嫂辞行，说他们要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沈泽民告诉兄嫂，党中央在 1 月间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现在的负责人是王明。目前党在白区的活动十分困难，而苏区的土地革命却蓬勃发展，地区日益扩大。因此，3 月间党中央决定迁到苏区去，一部分人到中央苏区，另一部分人到鄂豫皖苏区，其中有张国焘等人。他们在“五一”之后就动身。

“到了那里就到了自由的天地，在自己的地区工作，将是何等的快活！我和琴秋可以十天干一番啦！”

沈泽民夫妇的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对到苏区去流露出由衷的欢喜。

陈爱珠看着二儿子、儿媳的穿着打扮，不放心地问大儿子茅盾：“德鸿，你看阿二、琴秋穿这种衣裳去那里，敌人一看就会怀疑吧？”

还未等哥哥开口，沈泽民就笑着说：“妈，您放心！这套行头是我们在上海的化装，去苏区要另换行头的。”

那天，老母、茅盾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互诉亲情，互道珍重。他们哪里想得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1933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茅盾接到鲁迅派女佣人送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日午后二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这个白俄咖啡馆在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附近，比较幽静，中国人光顾的不多，鲁迅和茅盾等三两个人要商量什么，而对方又不便领到家中来的，常选在那里会面。

第天，茅盾准时来到咖啡馆，见鲁迅已在等待，就问是谁来了。鲁迅说是成仿吾。

他听了感到愕然。心想：这个成仿吾，我和鲁迅虽同他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只听说他到苏区去了。他怎么会来找我？鲁迅听了他的问话，说：“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两人正谈时，郑伯奇领着成仿吾来了。四个人互相作了介绍，一边喝

咖啡，一边谈了起来。

成仿吾说，他从鄂豫皖苏区来，是到上海来治病的。他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说可以，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于是记下了成仿吾的地址。

成仿吾接着对茅盾说：“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这不可能！”茅盾脱口叫道。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他的工作又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就复发了。

加上在那里得了严重的疟疾，在缺医少药又无营养的条件下，就支持不住了。”成仿吾说。

茅盾又问：“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

成仿吾答：“11月20日，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他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

他们黯然坐在那里。待了一会儿，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身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

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

“令弟今年三十几了？”鲁迅问。

“虚岁三十三，比我小四岁。”茅盾答。

“啊，太年青了！”鲁迅惋惜地说。

后来，茅盾从杨之华处了解到沈泽民病故的详细经过。沈泽民和张琴秋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沈泽民先是任中共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后来又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张琴秋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很出色。蒋介石在1933年6月，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被割裂和侵占，红军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主力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作战。这时，沈泽民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在频繁的战斗中，每天吃饭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医疗了。而且苏区与红四军方面军、与党中央都失掉了联系，为了重新建立与中央的指示，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找中央。11月初，他已吐血不已，仍坚持向中央写报告。

就在写完报告后的几天，他吐血不止，与世长辞了。

“你弟弟临终前，对战友们说：‘同志们，要以万死的决心，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唉，他是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啊！”杨之华还告诉茅盾：“泽民给党中央写的报告，是用药水抄写在一件衬衫上，由成仿吾穿上带出来交给秋白的。秋白走时，已带是泽民的报告，呈送给中央。”

想起自己是弟弟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弟弟却在革命斗争中病故了，茅盾的悲痛犹如万箭钻心，眼泪禁不住潸潸而下。

二四、创作《子夜》

从1930年秋天起，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同时发作，医生嘱咐

他：“少用眼多休息。”他闲着没事，便经常到表叔卢学博的公馆去。

卢学博卸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后，来到上海作“海上寓公”，任中国银行监察、交通银行董事长、浙江实业银行常务理事。

在卢公馆，茅盾见到了许多同乡故旧。这些卢公馆的常客，有银行家，有开工厂的，有政客，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投机的，还有军界中人。

茅盾说：“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而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要打听政局的消息，卢公包是个能有所获的地方。也是在卢公馆，我曾听说，做公债投机的人曾以三十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三十里（这成为后来我写《子夜》的材料之一）。”

秋天，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津浦铁路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到上海。

前来卢公馆的那些人都在互相打听政局、战况，交换经济情报和各种信息。茅盾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对于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天天听到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人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

他还经常从党内的朋友处得到苏区的消息：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更使用权他心情振奋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一度攻占了长沙。

他后来说：“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他写这部小说也是一个促进。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把他吸引住了。当读到严灵峰、任曙等的文章时，他十分气愤：“托派真是太狂妄也太幼稚了！竟然胡说什么中国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还胡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文章，主张什么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经在“夹缝中求处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他也觉得不仅糊涂，而且完全错误。

茅盾意识到自己将写的这部小说，意义是很重大的。他说，“我写这部小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从《幻灭》到《虹》，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青年女性。这次，他要写大资产阶级，要写大银行家、大工业家了。

茅盾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第一部叫《棉纱》，第二部为《证券》，第三部是《标金》。

然而，他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怎么办呢？他一时没有考虑好。

11月，他转而写中篇小说《路》。可是才写了一半，眼病又第二次发作，而且更加严重：

右眼角膜溃烂成小孔，左眼瞳孔一半为厚翳遮掩。他心里有点发慌，

问刘以祥医生：

“能治好吗？”刘医生说：“右眼好治，可注射血清，左眼比较难以对付。”又说，“你不能再看书写字，总之不能再用眼”。经过刘医生的精心治疗，半个月后，他右眼复原，三个月后，左眼去翳也消除了。

在这三个月里，茅盾的眼睛不能多用，大脑的思维活动却活跃得很。他暂时抛开《路》，又回到“城市 农村三部曲”上来，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他又重新构思写出了《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

在眼睛康复以后，他续写完了《路》，就根据提纲写完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分章大纲”。

他写的《提纲》，我们可以从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读到。而“分章大纲”，他在《回忆录》中说：“都丢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大纲”的一部分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已经发现，刊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研究》第一辑。这几章“大纲”，是如此详细，简直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缩本！

然而，当他提笔要根据“分章大纲”写成小说时，“感到规模还是太大，非有一二年时间的详细调查，有些描写便无从下手。”而他却“无法储备一二年的生活费以便从事详细的调查。”而且，“关于军事行动的描写，即使作了调查也未必能写好。”因为他没有在部队中工作（即使是政治工作）的经验。于是他“就有再次缩小计划的考虑，彻底收起那勃勃雄心。”

他仍在积极地进行创作的准备。先是访问了从前在卢公馆遇到的那些同乡、亲戚、故旧，他了解到许多新的情况，尤其是日本丝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丝竞争，使得中国各地的丝厂纷纷倒闭。仅 1930 年，上海的丝厂就由原来的一百家变成七十家，镇江、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厂，也十之八九倒闭。这使他改变了原来主要写纱厂的计划，决定以丝厂作为基点。他又从同乡故旧的口中知道，1929 年中国各省火柴厂宣告破产的，达三十八家之多。这又坚定了他以写“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和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原定计划。”

为了写好丝厂和火柴厂的民族资本家，他再一次去丝厂、火柴厂参观。他写道：“我是第一次写企业家，该把这些企业家写成怎样的性格，是颇费踌躇的。小说中人物描写的经验，我算是有一点。这就是把最熟悉的真人们的性格经过综合、分析，而且求得最近似的典型性格。吴荪甫的性格就是这样创造的；吴的果断，有魄力，有时十分冷静，有时暴跳如雷，对手下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部分取之于我对卢表叔的观察，部分取之于别人的同乡之从事于工业者。周促伟的性格在书中算是另一种典型，我同样是综合数人而创造的。”

因为小说中要写到公债投机，他找了个朋友带进入华商证券交易所实地观察。这个朋友叫章郁庵，他们曾一起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现在章郁庵是交易所的一个经纪人。他向茅盾说明了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以及什么是“空头”（卖出公债者），什么是“多头”（买进公债者）。

走进交易所的大门，茅盾看到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很象大戏院的池子，而池子则象是一个蜂房。章郁庵让他看池子后方上面，那里站着一些袖子卷到肩胛边的拍板人，这些人后面的电光记数牌上跳动着红光闪闪的阿拉伯数字。他心想：“啊，这就是会叫许多人笑也会叫许多人哭的‘拍板台’！……”

那些提心吊胆望着它的人们，还有更多的没有来亲眼看着自己‘命运’升沉的人们，他们住在上海各处，在中国各处，然而这里台上的红色电光的一跳，会决定了他们的破产或者发财。”

他看这边，有两个人咬着耳朵密谈；瞧那边，又有两个人压低了嗓子争论什么。靠柱子边上的一张椅子上有一个人弓着背抱了头，似乎在转念头：跳黄浦呢，吞生鸦片烟呢？

有时，茅盾还在交易所观察到，一些无稽的谣言竟会激起债券涨落的大风波。他感到，“人们是在谣言中幻想，在谣言中兴奋，或者吓出了灵魂。没有比这些人更敏感的人了。”

1931年春天，他因为担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这部小说的写作又拖延了下来。

夏季酷热异常，茅盾住在三楼，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先写出新的分章大纲，把精力专注在“左联”的工作上。

10月，他觉得写作长篇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便辞去“左联”的行政书记，专心写作起长篇来。

当全书脱稿时，茅盾在“后记”中写道：“《子夜》十九章，始作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其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变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卒成书，未遑细细推敲。”

这部长篇刚写好前面几章，《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找到他，打算从1932年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茅盾为此曾拟了三个题目：夕阳、燎原、野火。最后决定叫《夕阳》。

这是取息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暗喻蒋介石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表面上是全盛时代，实际上已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二八”上海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军侵略的炮火烧毁，他交去的那部分《夕阳》稿子也被焚毁。幸好那是孔德止抄的副本，他亲手写的原稿还保存着。

全书写完后，他经过再三斟酌，决定将书名改为《子夜》。他想：“夕阳”概括着旧中国社会的日薄西山，一派混浊、暗淡，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而“子夜”不仅包含着旧中国黑暗的一面，同时也象征着既已半夜，快天亮了，黑暗过去，黎明就要来临了。

“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从《夕阳》到《子夜》，这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子夜》在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想到鲁迅多次问过写作《子夜》的进展情况。现在《子夜》终于出版了，应该尽早给他送上一册。

第二天2月4日，茅盾拿了《子夜》，和孔德止一起，带了儿子，去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家中拜访。

鲁迅接过茅盾的新作，翻开扉页一看，是空白的，就向茅盾郑重提出：“雁冰，你怎么不签上大名呢？来来，这书你得签名，好让我留念。”他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上毛笔。

“这一本是给你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茅盾说。

“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仍坚持让他签名。

于是，茅盾在《子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上：“鲁迅先生指正”，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鲁迅日记》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

过了几天，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变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注意。“左联”内的党组织对《子夜》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朱明、朱自清、吴组缃、赵家璧、侍桁等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的吴宓也撰文说他“最激赏此书”，认为《子夜》“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小说的技巧“可云妙绝”。

从2月至4日的三个月内，《子夜》重版了四次；初版印数为三千本，每次重印各为五千本，均销售一空。陈望道对茅盾说：“你这本《子夜》的发卖真是空前啊！连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你在这本书里描写到了她们。”

茅盾的表妹（即卢鉴泉的女儿）宝小姐也破例读了《子夜》。有一天，她竟问茅盾：

“表哥，你写的吴少奶奶，是拿我做模特儿吗？”

对于她的误会，茅盾只好笑而不答。

二五、痛失诤友秋白

茅盾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他把自己撰写的《导言》和原稿交给赵家璧时，已是1935年3月上旬。

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茅盾去向鲁迅告别。

“哦，你们明天就搬走吗？”鲁迅问。

“是的，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茅盾答。

“这样，我们商量事情就不方便了。”

“因为住得远了，往后不是紧要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茅盾告诉鲁迅，他到大陆新村已有两年，知道他住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自从国民党当局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后，他卖文的收入减少许多，加上乌镇老家的房屋要翻修，每月六十元的房租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妻子为这件事唠叨过多次，要换个房租便宜的地方。信义村的房子是二楼二底，每月房租四十元。那里既有租界的安全，又有租界所没有的隐蔽和宁静。

从谈话中茅盾发觉鲁迅心情不好，于是起身告辞。鲁迅却拉住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秋白被捕了。”

“啊，怎么会呢？”茅盾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这消息可靠吗？”

鲁迅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化名给我寄来的信，你看。”

茅盾接过信，凑近灯光，看到瞿秋白给鲁迅写道：“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子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我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说：“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又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中共组织被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要找这样一片店，又能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个铺子。”

“就怕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是要靠党的方面来想办法。”

茅盾和鲁迅两人木然对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从鲁迅家里出来，茅盾匆忙回到家中，关严房门，把瞿秋白被铺的消息告诉了孔德止。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茅盾说：“你别哭，让人听见了不好。我们要尽力协助鲁迅、协助党营救秋白！”

那还是 1921 年瞿秋白在苏联旅行期间，把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书稿寄回国内，由他的好友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茅盾看到了两部原稿，觉得他的文章极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幅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是一个博学、思路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

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 1923 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 1927 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 年 5 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

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是没有出路的。

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做共产党员，他仍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他又说，他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茅盾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两人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谈了很久。

秋白走后，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总以为他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

哪里想到他会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还辗转反侧，难以安睡。他对孔德止说：“明天，我再去和鲁迅先生谈谈，一定要设法营救瞿秋白！”

这以后的几天，茅盾经常去见鲁迅，也去慰问了杨之华。他知道党组织和鲁迅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在鲁迅打算筹资开的铺子尚无头绪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牺牲后，茅盾去找杨之华、鲁迅；商谈出版瞿秋白遗作的事情。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不过瞿秋白的遗作究竟怎样编印，我还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来印。”

茅盾赞同鲁迅的意见。又过了几天，他和鲁迅、郑振铎又详细商量的筹款印刷秋白遗作的各项问题。他捐款一百元。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印刷

精美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终于在 1936 年 10 月初出版了。出版单位署名为“诸夏怀霜社”，寓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最初议定编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个人，我仅仅是个‘促进派’，振铎由于《译文》停刊事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而主动避开了，只有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这两卷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疴不起的一年！”

二六、和史沫特莱的友谊

茅盾用“方保宗”的化名，在静安寺东面一条街道里租到了一幢房子。

新搬家后的一天上午，他正准备拿出纸、笔写作，忽听有人叩门。原来是徐志摩，他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一个外国女记者来看他。

“这位女士是 A·史沫特莱，”徐志摩向茅盾介绍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驻北平记者。她要我介绍认识你，并且希望你送给她一本你的大作《蚀》。”

“茅盾先生，认识你我很荣幸。”史沫特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茅盾热情地说，转身去取出一本《蚀》，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史沫特莱，“请你指教。”

史沫特莱翻开《蚀》，瞧着扉页上茅盾的照片，笑着说：“Like a young lady（象一个年青的小姐）。”

这是茅盾和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时间为 1930 年夏季。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友谊也愈益深厚。茅盾还了解到，史沫特莱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也是这位女士创办的。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茅盾和鲁迅以后，就介绍他们给这两家刊物写稿。

史沫特莱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是精通英语和德语，而茅盾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语，一个懂德语。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交谈。茅盾的英语则说得流利。

这样，当史沫特莱有事需要和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往往是三人聚合地一起，由茅盾充作翻译。

起先，他们三人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以后就经常合作，为西欧、美国的一些杂志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史沫特莱后来写道：“茅盾和我常常在某个角落会晤，然后，仔细的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入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附近的菜馆中点菜来一同进餐，一谈便是好几个钟头。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都认为：能把帮助并且支持给与那些为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和牺牲的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1935 年 12 月的一天，茅盾看到夫人起早买回一大篮子鸡、鱼、肉、蛋和蔬菜，就对她说：

“今天史沫特莱要来，又要你忙了。”

“忙倒没啥，只有你的洋朋友不再说你瘦多了，也高兴吃，我就开心了。”妻子说着走进了厨房。

这使茅盾想起今年初夏，史沫特莱拜访他时两人交谈时的情景：

“啊，茅先生，你比过去要瘦，这不好。我看你的营养不良，要注意增加营养呵！”

“瘦一点没关系，我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只是眼睛近视，没有办法复原。”

“你平时锻炼身体吗？”

“没有时间呀。再说，我也不能太公开露面，要引起麻烦的。”

“对，对。不过，我看你们中国的革命作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身体锻炼，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你的见解很对。可是……”

“哦，我知道，”她打断茅盾的话，“在你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改变革命作家的生活状况，还不具备条件。”

接着，她又一次问茅盾：“茅，你的《蚀》和《子夜》是很好的作品，是否已经有人把它们翻译成英文？”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法告诉你。”茅盾说：“我想，目前是没有人翻译它们的。因为，翻译长篇小说，要作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在我国内，敢于涉足的人是极少的；在国外，翻译家又对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现状十分隔膜。”

“不，你的小说应该介绍欧洲、美国、德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我来找人把你的《子夜》译成英文！”史沫特莱热情地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茅盾说。

“你放心，我一定要去做的。”她很坚决地表示。

这天当史沫特莱一走进茅盾的家，就笑着告诉他：“哈罗，茅，已经有人把《子夜》译成英文了！”

“真的？那太好了。”茅盾喜悦地说。

“我已经读过了译文。现在，我要请你为这个英译本写一篇自传，并且作一篇自序。”

她坐下后向茅盾提出。

茅盾想了想，答道：“小传我可以写一篇，并且打算用第三者的口气写。因为，外国的读者更欣赏客观的介绍，而不喜欢作者自己去说三道四。”

“噢，是这样，是这样。”史沫特莱听了连连点头。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建议序由你来写。”

“我可以写序，”她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又说，“不过，我需要一些材料一份中国读者对作者评价的综合材料，你能不能提供？”

茅盾为难地摊开了双手，说：

“这个我也不好办，对我的评论有各式各样，即使是战友，对我尚且褒贬不一，由我来归纳这些意见就太难了。”

史沫特莱从椅中站起身，在室内慢慢走了一圈，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对茅盾说：

“有了，我请鲁迅先生写！”

茅盾听了一愣，想了一想说：“这当然好，史是大先生从来不写这类文章，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除非你亲自向他提出来。”

“当然，我要亲自向他请求，我这就来写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史沫特

莱爽快地说。

茅盾心想，料不到她会这么直爽，怎么办呢？现在我又不便再推托，毕竟她是为了给《子夜》的英译本写序呀。

史沫特莱摊开信纸就给鲁迅写信，她说明了原委，希望鲁迅能帮助她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一，作者的地位；二，作者的作风和形式；三，影响 对于青年作家的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作者的态度。

吃饭时间到了。看到茅盾夫人摆到桌上的丰盛菜肴，史沫特莱高兴地拍着手说道：

“太美了！这么多菜，你夫人待你真好！”

“史沫特莱，我夫人是专门做来招待你的。请你多吃一些！”茅盾笑着邀她加入席。

过了两天，茅盾把史沫特莱的信面交鲁迅，并向鲁迅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鲁迅让茅盾把信翻译给他听，一面在纸上记下了史沫特莱的要求。然后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史沫特莱的信，微笑着说：“让我来考虑考虑。你也知道，我平时是不注意这方面材料的。”

茅盾回家之后，就动手写自传。原稿纸上现出了一行行清秀的字迹：

“茅盾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 1896 年 7 月生的。浙江人。

他的祖先，本为农民；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始在乡镇上为小商人；‘太平天国’的战争蔓延到江、浙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带着家小避难到了上海，不久又到了汉口，就在汉口经商。后来又捐了官，到广东、广西去做了几年官，从此就变做半官半商的家庭。从他的祖父以来，就是‘读书人’了。……”

在《自传》写了一半的时候，鲁迅来信告诉他，史沫特莱要的材料，他已托胡风代笔了。

于是茅盾继续埋头写《自传》。对《蚀》的创作是这样写的：“……从‘三部曲’看来，那时茅盾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显然失去了正确的理解；他感到悲观，他消极了。

同时他的病也一天一天重起来，他常常连连几夜不能睡眠……“对于《子夜》，他写道：“《子夜》是茅盾所写的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他起意要写这部小说还在 1930 年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来以后。1934 年 2 月，南京政府查禁了二百多种左倾书籍，这《子夜》也在内。但后来因为各书店的抗议，南京政府重行‘审查’，命令书店将《子夜》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全行删去，始准继续发售。所以在中国的《子夜》是不全本。”

这里说的“《子夜》是不全本”，是指被国民党命令删去第四、第十五章后的开明版《子夜》。然而在 1934 年下半年，茅盾却收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用道林纸精印的全本《子夜》。送这本书的那人告诉茅盾，出版这个全本《子夜》的救国出版社，是巴黎的一批进步华侨办的，他们还出版了一种《救国时报》的报纸，也是宣传革命的。这使茅盾深为感动，他写道：“想来是为了反衬国民党反动派禁书之义而出此。由此也可证明，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

在国内，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的《子夜》。

《自传》刚完稿，鲁迅也把“材料”寄来了。茅盾展读鲁迅的信：

明甫先生：

找人抢替的材料，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 S 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

专此布达，并颂春禧树 顿首二月二夜

于是他把鲁迅寄来的“材料”连同他写的《自传》，用挂号信寄给了史沫特莱。

旧历年来到了，大红的春联和喜庆的爆竹使人们的心头舒畅了一些。茅盾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他到鲁迅家中拜过年之后，鲁迅送他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停下脚步，对他说：“明甫，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了。”

“哦，这可是个大喜讯！”茅盾兴奋地应道。

“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接着说。

“好呀！我赞成。”

两人继续往楼下走。鲁迅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

茅盾点头赞同，又问道：“可是电报怎么发出去呢？”

“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这时他俩已走到楼下，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下去。

后来，茅盾因为忙其他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这件事。

在茅盾与鲁迅的单独接触中，他感到鲁迅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怀有崇敬的感情。只不过这些话鲁迅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讲，在通信和日记中，他是不谈或故意不记的。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建议得到了两人的赞同，鲁迅以他和茅盾的名义拟了电报，交给了她。她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又由莫斯科发到陕北，几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告诉茅盾：“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是在我离开延安前几天才收到的。”

直到后来，茅盾才看到这份由史沫特莱建议并代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二十五年后，史沫特莱为美国反动统治者所迫害，病逝于伦敦的医院里。茅盾听到噩耗，茫然若失。1950年5月14日，他撰写的《悼念 A·史沫特莱女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文中，他满怀深情地抒写道：

“……一个人或者一个朋友的死，或使人悲痛，或使人愤慨，或使人惋惜，或使人惘惘然若将无以解除积年之负疚，……”

“在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A·史沫特莱是在中国，而且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全世界还被反动派的谎言所迷蒙的时候，她是把‘红色中国’的真相第一次告诉了世界人民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位朋友。……”

“我们悲痛，愤慨，哀悼我们失去了一位热情的朋友，民主的战士和进步的作家。

愿您灵魂永远安息，A·史沫特莱！”

二七、儿子去游行

茅盾把家搬到信义村不久，就送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进了曹家渡的时代小学。女儿入该校附设的初中班，儿子读小学六年级。

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工人子弟，他们入学都比较晚年岁也比沈霞和沈霜大一些。

这些工人子弟读完小学就不再升学，因为已经到了可以当学徒的岁数，而且想升中学也由于学费太贵，读不起而作罢。

时代小学的校长脑筋一动，想出了附设初中班的办法，收取学费从低，这既满足了一些工人子弟升学的渴望，他又多了一笔收入。

初中班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班主任是刘老师，他因兼教六年级的国文，沈霜也就成了他的一个学生。

天，沈霜放晚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说：“爸，今天刘老师把我找去，问我《子夜》是不是你写的？”

孔德止在一旁听到，不待茅盾回答，忙问：“什么？刘老师哪会晓得的？”

茅盾让儿子放下书包，坐在凳子上慢慢地说。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沈霜平时喜欢看小说，他去年已读过《七侠五义》，这几个月里又读了巴金的《雾》、《雨》、《电》。一天，初中班的一个学生发现他正在看小说，两人就交谈起来。后来，他看见那个中学生正在看《子夜》，于是用带点骄傲的口吻说：

“这本书是我爸爸写的！”那个中学生吃惊地望着他，不相信地说：“你别瞎说，这小说是茅盾写的，你知道茅盾是谁？”“茅盾就是我爸爸。”沈霜答道。“哦，是你爸爸！”

那他真了不起！刘老师经常夸他的书写得好哩！”“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你不信，我和你去见刘先生。”

在刘老师的单人宿舍里，刘老师指着《子夜》问他：“这本书是你父亲写的吗？”沈霜点了点头。“你父亲不是教书的吗？”刘老师想起学生登记册上，他父亲的职业一项填的是“教员”，便又问他。沈霜并不知道他父亲隐姓埋名和所填职业的情况，他有点慌了，但仍坚持说：“我爸爸是写字的。”……

孔德止听儿子这么说，着急得很：“哎呀，小祖宗，这下可坏事了！谁叫人乱说一通的？”

德鸿，快给他换学校吧！”

茅盾并不紧张，沉着地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既然刘老师自己和他和学生在读《子夜》，可见都是正派人。”

“照你这么说，不是没事情啦？”妻子说。

“不是，”茅盾叮嘱儿子：“你明天早上到学校去找刘先生，就说是弄错了，是自己瞎说的。”

“这……这我怎么说……”

看到儿子面有难色，茅盾坚持道：“就照我讲的说，自己弄错、瞎说的。”第二天，沈霜拉了那位大同学去“更正”。刘老师一听就听出他是在说谎，

但并没有追问下去，反而对他说：“沈霜，你爱看小说，我这里有，你空时可来取去看。”

后来，茅盾了解到刘老师思想倾向进步，引导中学生读的书籍有不少是左翼作家的作品。

然而他还是警告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话要小心。

1936年的“五卅”纪念日来到了。上午11点，茅盾还在伏案写作。忽然房门开了，儿子走进来对他说：“爸，下午我要到市商会去。”

“噢，到市商会去”他猛然记起妻子昨天说，儿子近来常常和同学们出去，有时走到文庙公园，来回足有二十里路，他年纪这么小，要走伤身体的。于是转身问儿子，“到市商会去干什么？”

“开会。”儿子回答，脸上浮出按捺不住的笑影。

茅盾盯着儿子的脸想，今天是5月30日，难道儿子也要去参加“运动”？

“三个人同去，都是同班的。”儿子猜想父亲有不让他去的意思，又加了一句。

茅盾了解儿子，平时关于他自己的事，是不肯对父母多说的。他也不主张对儿子的事多加干涉。这时只是问：“认识路么？”

“认识。同去的人认识。”

茅盾关照儿子来去路上都坐“巴士”。他取了两张角票，下楼去给儿子。妻子正在烫衣服，看到他来了，就说：“阿桑要到市商会去参加群众大会。你已经允许他了么？他先同你说，他知道你不会拦阻他。我想不让他去，有危险，可是他说爸爸已经答应了。”

茅盾说：“大概没有危险。”

“倘使被捕了，你怎么说？”妈妈问儿子。

“我说，轧闹猛的。”

“暖嗨，你看，”她对茅盾说，“他们连‘口供’都对过了。有组织的，他们准备有冲突呢。”

“是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市商会开大会？”茅盾问儿子。

妻子代儿子说明，学校里并没有正式叫他们去，可是鼓励他们去。谁要是去了，不算缺课。教员也有去的。她对丈夫说：“依我看，还是不要让阿桑去的好；他太小了。”

“妈，你别噜苏了，快点给我炒蛋炒饭罢。12点我要和他们会齐的。”儿子催促她。

茅盾和妻子坐在旁边看儿子吃蛋炒饭。妻子叮嘱儿子：“开过会倘使去游行，阿桑，你还是不要去罢。”茅盾也说：“游行可以不去。你的肺病刚好，多走要伤身体的。况且，要是半路里被冲散了呢？你又不认识路，怎么回来呢？”

儿子大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认识路，我会问，会叫车子！车钱呢？”

茅盾把两张角票放在儿子手里，送他走出门外。他妻子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儿子走出弄堂口。

回到客堂里，妻子抱怨茅盾不该先允许儿子去开会。她说：“我原先打算和他同去，倘使要游行了，就带他回来；可是后来一想，我去不免会碰到许多认识的人，再说阿桑也不肯跟我回来的。”

“自然，”茅盾笑着说，“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

“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就凭一股血气，胆又大，你应该教教他。”

“怎么教？教什么呢？难道对他说，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么？他太小了，不能理解的。”

下午6点钟，阿桑没有回来。8点钟，阿桑还是没有回来。于是茅盾和妻子都着急起来了。

这时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带来参加当天集会得到的一些传单。两人听说下午没有出事情，才把心头的石头放下。但是妈妈担心儿子迷了路，三番五次地走到弄堂口去张望。

直到夜晚9点15分，阿桑才跑跳着奔进家门。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红绿绿的传单，象是捧着宝贝似的交给父母亲。

茅盾和妻子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游行的？快讲给妈妈听听。”母亲拉着儿子的手问道。

“我们到了五卅公墓，后来到北火车站，有兵拦住不让过去，队伍就散了。”

“脚走痛了吧？”

“一点也不痛。”阿桑说着又摸出一张印着红色的小纸说：“这是口号，喊得真高兴呀！”

茅盾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来，虽然自己和妻子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政治问题，可是孩子们不但知道共产党好，蒋介石政府坏，而且还会唱《国际歌》，家庭环境对他们还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子今天去参加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他还会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我们老一代曾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冲向街头了！好啊！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接力赛。靠着这种接力赛，中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

二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挥，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学》是个纯文艺刊物，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涉及政治。”

“好的，我就这样对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来个‘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傅东华说着也笑了。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傅东华：《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后才能排印；版权页上编辑者不能署“文学社”，要署上主编人姓名。

怎么办？《文学》编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从第二卷起，主编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暂不露面。

《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的新年号稿子送到了印刷厂，坐在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官，利用审查办法滥施威风。他见到巴金的长篇小说《雪》，抽了下来；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也抽了下来。巴金为新年试笔一栏写了一篇短文，检查官下令：“巴金”不行，改成“比金”！他又指着《文坛何处去》这个特辑中的文章说：“张天翼、郑伯奇的这八篇文章，都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统统不能要！”

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谢冰心为新年试笔栏写的文章，还有茅盾用“惕若”和“蒲牢”两个笔名写的两篇文章，却逃过了检查官的板斧。

当傅东华把被检查的结果告诉茅盾之后，茅盾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写的《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这篇评论，居然蒙过了检查官的眼睛，大概是因为：一，他一时还不知道‘惕若’是谁；二，他大概以为书报评述而况又是贵族式的清华园出刊的周刊，是不会有问题的，读也没读一启蒙就轻轻放过去了。检查官老爷的本领主要是辨认作者的姓名，凡犯忌的名字，不管文章内容如何，一律抽去。他哪里会知道‘蒲牢’是鄙人呢？其实，这位检查官老爷对文学是一窍不通的。你看”。茅盾让傅东华看冰心的文稿。

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面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中的山川人物。

傅东华看后问茅盾：“你是说这文章的寓意”“对！”茅盾接口说，“检查官看不起懂其中的象征意义。”

“冰心就这样过关了。”傅东华做了个手势说。

“这叫做过关手术。他们不是骂左翼文学是‘妖魔’吗？我们就来它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茅盾说，眼镜片后闪着狡黠的光。

“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查官的大抽大砍，毕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过去，他们编的《文学》从不脱期，而这次的二卷一期却脱期半个多月。茅盾和傅东华两人实在不甘心，就拟了一则启事，在这一期上刊出：

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种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

茅盾对傅东华说：“明眼人一看我们这则启事，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1月22日，郑振铎从北平来到上海。他听茅盾说，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目前施展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茅盾又分析道，“不过，他们这样乱抽乱砍，也使我们忙于应付，而多数作者是等着稿酬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是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避开这个爷头，化被动为主动。”郑振铎说完思忖起来。

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茅盾估计，这四期专号中，有三期是国民党检查官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的作品。

三人作了分工，由于郑振铎远在北平，联系不方便，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给他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它三期专号仍由茅、傅共同负责。

过了一天，茅盾和郑振铎一同去拜访鲁迅。他们向鲁迅谈了《文学》打算连出四期专号的想法，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

但是他说：“《文学》能继续出下去吗？我有点怀疑。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

果然如鲁迅所料，《文学》第二期送审的稿子，又被检查官抽掉一半。他们只好从存稿中再挑一些丝毫不“违碍”字句的去顶替，或者换上新的笔名。茅盾的短篇小说《赛会》，用了“吉卜西”的笔名，而得到通过。

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御用小报在“文坛消息”中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行停刊。

茅盾立即起草并在《文学》上刊登辟谣启事，声明“文坛消息”“全与事实不符”，“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由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尚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绵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

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

二九、劝说鲁迅出国治病

清早起身后，茅盾匆匆吃完妻子为他准备的油条、泡饭，就出门向鲁迅家里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思忖：怎么劝说大先生呢？

昨天，史沫特莱开车接他去外白渡桥旁的苏联总领事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十八周年的一个小型鸡尾酒会。他看到了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许广平、郑振铎……等熟悉的朋友。

在酒会快结束时，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你看他脸上缺乏血色，很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我还听说他常有低烧，容易疲劳。朋友们都希望鲁迅能够离开上海到外地去疗养一下。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请他全家都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停顿了一下，象是征询茅盾的看法，见到茅盾未说话，又接着说：“转地疗养的事，我也和他说过，但他不愿意，希望你再同他谈谈，劝一劝他，好不好？”茅盾表示愿意尽力。

来到鲁迅家，他才把话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她做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茅盾问。“一旦到了苏联，就与国内隔绝了。我又不懂俄文，真要变成聋子和瞎子了。”鲁迅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茅盾说。“我所谓聋子瞎子还不是指生活方面，是指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国内的报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见到。”

鲁迅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交给苏联方面，请他们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茅盾进一步劝说，让鲁迅放心。

鲁迅听他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说：“凡事想象是容易，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感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匕首一击，如若事隔一人多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说：“不会成为明日黄

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

鲁迅听他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茅盾灵机一动，换个话题，对他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倒有时间办了。”

这话似乎有点打动了鲁迅，他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我们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哦，”鲁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的。”

茅盾回到家，立即给史沫特莱写了封短信，告诉她：大先生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他又到鲁迅家去。不等他开口，鲁迅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

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苏联的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还会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们说的，我要继续住在上海，在中国战斗下去！”鲁迅望着茅盾，眼光沉着而坚定。

茅盾心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不过还是向他说道：“可是你的健康状况，大家都很关心呵！”

鲁迅回答道：“朋友们的好意，我明白。我自己，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茅盾觉得他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多嘴了。第二天，他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三十、维护文艺界的团结

自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 1935 年春上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茅盾与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也失去了。他搬到了信义村，知道他新住址的只有鲁迅、郑振铎等几个人。

1936 年元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来找茅盾，说夏衍托他转告，有要事须面谈，请茅盾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他问。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说。

茅盾就让他约定夏衍第二天上午在郑振铎家里见面，因为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址是公开的，在他家会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第天，他们如约会晤，郑振铎也在场。夏衍告诉他：“自从上海党组织

遭到破坏后，‘左联’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我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也包括原来的‘礼拜六派’的人物。

不过，这件事要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

“哦，请你继续谈下去。”茅盾说。

“另一件事，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但是，鲁迅先生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先生。”夏衍问鲁迅：“你对这些变动有什么意见？”

在这以前，茅盾已在鲁迅家中看到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知道萧三建议“取消‘左联’，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从萧三写信的口气，茅盾感到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个人作不了这个主，而是传达了党方面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听史沫特莱说起，共产国际在战略上有了重大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态度。这时，他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先生谈了再说吧。”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鲁迅先生。”茅盾说。

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再会面。

翌日上午，茅盾去看鲁迅。他预料这次谈话不会顺利，因为他知道鲁迅对萧三的信采取看一看的态度。鲁迅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示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曾对茅盾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又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此时，鲁迅铿锵的话语似又在他耳边响起：“‘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不是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吗？”

这次见到鲁迅之后，他转达了夏衍的意见。

鲁迅给茅盾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燃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放‘左联’，我看没有必要。”

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统了去。”

茅盾听到鲁迅的回答如此简明，心想，看来他已考虑成熟，不必多说了。第三天，他来到郑振铎家中，把鲁迅的意见告诉了夏衍。

“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夏衍解

释。

“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他，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见鲁迅，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当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敏感地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既然鲁迅这么说，我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个传话人，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这样的教训我已尝过几次了，可不能重蹈覆辙。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他辞别鲁迅，就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没再与夏衍见面。

后来，鲁迅因周扬等人背着 he 解散“左联”，大为愤怒。

茅盾在二月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的形势，说道：“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象‘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

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面对鲁迅的这封信，茅盾摇了摇头，心里说：想不到他对新组织会是这样的反感啊！

茅盾与鲁迅不同，他答应周扬参加并作为这个新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起草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接受冯雪峰的建议，在“吕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也签了名。

事后的一天，茅盾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骂他是“脚踏两头船”，不禁愤怒地自语起来：“骂吧，让你们骂吧，我不怕！”

“雁冰，怎么了？谁骂你了？”他妻子孔德止闻声不安地问。

“雪峰对我说，大先生不愿意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必再勉强；他们要另外组织文学团体，也就让他们组织罢。他要我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想他这话不错，双方对立，有什么好处？就照他的建设做了。想不到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如今居然形之于笔墨，对我进行攻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茅盾激忿地说。

“只要做得对，怕什么人家说三道四！你尽管去做，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你的。”妻子安慰他说。

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随手翻开了六卷三号的《文学》，读起自己写的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有什么个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放大了眼光，敞开了胸怀，坚定了意志，手牵着手，一齐向前走罢！”

他想，目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显然难以调和，但是我和鲁迅、周扬两方面关系都比较好，我要珍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尽力调节双方的关系。唉，说客道做，

作家难做，然而不正是因为难做，才需要我去做什么？自然，我不能做折中的调和主义者，我还要继续写文章，阐明我对“两个口号”的观点和态度！

夜深了，窗帷半掩，人声静寂，茅盾又坐到映出绿光的灯罩下，挥笔写作起来……

三一、月曜会

鲁迅逝世已近一个月了，茅盾却觉得恍如眼前，心头的郁闷依然无法排遣。

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求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已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 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听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鲁迅》呢。”冯雪峰站起身说，“你说鲁迅先生好象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写得好！你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术的论述，也很精辟。你准备给那家报刊发表？”

“这是为《文学》七卷六号写的，王统照等着发排呢。”茅盾答，又从那包书中取出一本，签上名说，“《创作的准备》出来了，请你批评。”

“这种介绍创作经验的小册子青年人很需要。你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冯雪峰看了一遍书的目录后说。

“雪峰，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茅盾将一杯热茶递给客人。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冯雪峰笑笑说，“鲁迅先生去世后，上海的文坛较前冷落了。我见到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他们谈起话来都不大有劲，心情沮丧，这与当前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我们要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你说得对。是应该为青年作家们组织一些活动，使他们加强联系，交流感情，激励斗志。”茅盾表示赞同。

冯雪峰征询他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主意！雁冰，我的事情多，也不大好公开出面，这事就委托你了。你可以再找几个同志商量商量。”

冯雪峰起身告辞，在门口他紧握着茅盾的双手，眼里流露出充分信任的神色。茅盾也点了点头，说道：“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晚上，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来拜访他。茅盾向他们谈了想搞个青年作家聚餐会的想法。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可我觉得自己跟青年人一样，爱和青年朋友谈天，青年朋友思维敏锐，见解新颖。如果大家能一星期或两星期聚餐一次，谈谈文艺思潮和新发表作品，该有多好？”

艾芜、吴景崧齐声称好。第二天，他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

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

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

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撒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

冯雪峰表示赞同。

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叫“月曜会”。

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他对茅盾说：“你想邀请谁参加，就邀请谁。”

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了。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撒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

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

点的一道道菜肴送上来了，一个个话匣子也哗哗地打开了。茅盾指着王统照向大家说：

“在座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老王当然不算青年作家了。我拉他参加，一则是因为他是《文学》的主编大人，能对青年朋友来稿中存在的毛病提出一些意见，二则他与你们熟悉起来，也为《文学》的稿源开辟一个基地。”

“对，对！我是来交朋友的。雁冰拉我来吃菜，我来向大家拉稿。今后，请大家给我们《文学》多多支持啊！”王统照说。

有人关心地问茅盾，他是不是常失眠？茅盾说，他有了治失眠的“单方”，不大失眠了。

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单方”是什么。他说，这个“单方”就是地临睡之前读几页有趣而轻松的书。他举例：“譬如，昨晚我睡不着，就打开灯，读勃兰兑斯写的《安徒生论》。

我觉得勃兰兑斯的评论文章也和安徒生的童话一样轻松而有趣。他说，写童话不要用曲折的叙述，什么都得从嘴巴里新新鲜鲜当场出彩。哦，说是‘讲出来’还嫌不够，应当是咪咪吗吗、帝帝打打，或者是呜嘟嘟象号筒。他举例说，安徒生常常是这们开头的：

‘三个小兵在大路上开正步走……一二！一、二！’或者‘那么……张开嘴巴的喇叭在吹，大底达大打！有一个小孩在里头！’……我读者读着，就在安徒生的鼓声中进入了梦乡，呼……呼……”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月曜会”上，茅盾讲的并不多，总中听别人讲话。每当人们议论

到文坛现象和文艺思潮时，他总是注意倾听。他听到一些青年作家反映，他们写出了作品苦于无处发表。

就想出了出“丛刊”的主意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

《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茅盾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以及其它评论文章。陈白尘后来写道：“1937年春，张天翼同志通知我去参加由茅盾同志主持的‘月曜会’的聚餐，这更使我兴奋不已了。”

此前虽然见过几次茅公，都是在公共场合，未能亲聆教诲。‘月曜会’……连茅公不过十来人。……那天，他身御浅灰长衫，足登便鞋，周身上下朴素整洁，在这十里洋场上，却似一尘不染，温文儒雅，飘然而至，真是文如其人！

“没有任何形式，谁也无拘无束，我们都围他而坐，随便倾谈。忽而国内国际形势，忽而抗日统一战线前途，忽而文坛掌故和新收获，忽而又落到创作问题上。茅公有问必答，自然地形成了中心。他那较重的浙江桐乡和轻微的口气，并不妨碍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我们这一群，当年的青年，真是如坐春风啊！……”

“这个‘月曜会’，在茅公一生事业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朵浪花而已。他自己都可能忘记了。但正是这类一朵朵浪花聚集起来，便可以看出，在整个三十年代里，他为中国文坛培育了一代新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导师，想不过分吧？”

三二、炮火的洗礼

1937年8月13日清晨，茅盾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报告：因为战事，“银行停业两天”。

接着又说：“国民政府已于昨日封锁长江和南黄浦……”

近半个月来，他已在手记上写下了这样一些战况：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陷。

8月7日，日本大使川越抵上海；自长江止游撤下之日本海军军舰与陆战队亦已集中沪上。

8月10日，日本一面施放外交途径解决的烟幕，一面急遽向上海增兵，吴淞口外敌舰相望。

8月11日，京沪、沪杭两线我大军向上海推进。

8月12日，我大军继续沿京沪、沪杭两线推进，两线仅各开客车一班。

昨天，茅盾去和冯雪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商量战争发生后办杂志的事情。他妻子去设法搬运寄放在开明书店总厂的两千本书籍。待他傍晚回到家里，却不见书籍搬来。

妻子说，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家里的细软更要紧，就把两皮箱细软运到了租界的二叔家里。在睡梦中，茅盾还跟妻子争吵，说要把那两千本中西书籍搬运出来。

今天，他要亲自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运出那些书，哪怕运出一部分也好。

当他换上衣服要出门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了闸北已经开火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地跑上街头，穿过已垒起沙包、有卫兵守卫的苏州河桥，向开明书店总厂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许多工厂在用卡车搬运货物和原材料。

海宁路上，挤满了人。茅盾一打听，原来是前面禁止行人通行，只允许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过去。

蓦然，几架涂着太阳旗标志的日本飞机嗡嗡地从人们头上掠过。不一会儿，远处轰轰地响起爆炸声，几股浓烟翻滚着冲上天空。人们议论着什么工厂、哪家栈房着了火。

紧接着，响起高射机关枪的哒哒声音，中国军队向日本飞机还击了。人群欢呼，鼓掌。

茅盾顿时觉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晚饭后，茅盾正在收听新闻广播，郑振铎叩门进来，兴冲冲地告诉他：从上海市政府得来的可靠消息，政府决定开放民间的抗日救亡活动，各科救亡团体只要向政府登记，就可以化开活动。他还问茅盾是否马上搬家。

茅盾对他说：“暂时还不搬。老母早在内地老家，自己只有四个人，孩子大了，到紧急时刻拔脚便可以走。我大部分的书已经在火线内了，身边的一小部分随它去吧。”

这一夜，茅盾又失眠了，服了安眠药片，才勉强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时，窗玻璃已映出朦胧的玉色晨曦。忽然弄堂里传来：“小白菜、韭菜要？菠菜、雪里蕻……”

怎么，还有农民出来卖菜？他感到诧异。妻子说要去买点青菜，茅盾就跟她下了楼。

妻子一问，小白菜的价钱竟然和原来一样！他感动了，心想：清晨冒着被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挑来这样新鲜的青菜，就是加价一倍，也不算多，而这农民倒并不肯抬价。问那农民：“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不怕么？”

农民笑了笑答道：“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

茅盾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天中午，茅盾去参加例行的月曜聚餐会。到了菜馆，他看到人数大大超出了预计的，心想：也许大家预感到这将是象征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聚餐，所以都赶来了。于是，临时又增加了一桌。

在餐桌上，人们的谈话集中到今后作家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上。

许多人的眼光向着茅盾，听他发表意见：“……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但我们的工作岗位将不再在亭子间，而是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日觉悟，开拓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在会上，多数人主张要赶快创办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够迅速反映出作家们救亡呼声的小型刊物，而且提出要茅盾出任这个刊物的主编。这种信任和期待，使他感到义不容辞，立即向大家表示：下午就去找人商量，着手

筹办，早日出版。

聚餐会将散席的时候，电台播出中国空军出动轰炸了日本海军“出云舰”的消息；大家还听到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高射炮的声音。忽然，轰轰的飞机声在屋顶响过，茅盾和朋友们拥到凉台上，只见三架一队的飞机朝东北方向飞去，有人大声说：“好啊！这是我们的空军！”

下午，茅盾找到了冯雪峰、巴金，晚上又找了黎烈文，第二天一早找了王统照。他们都赞成由《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同人集资出版一份文艺周刊的计划。巴金来电话说：“勒以、黄源都赞成我们的方案。我建议明天开一次同人会。”

茅盾当即表示同意。次日，他和巴金约了四家刊物的主编开会，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问题。他们一致决定用《呐喊》作为刊名。他对巴金说：“我看，创刊号的文章就由我们这些人包了。稿件最迟十九号交来，文章不要长，一千字以内。”巴金表示同意，并说他还约了胡风、萧乾写文章，言明是没有稿费的。

晚上，隆隆的炮声似沉雷轰鸣。茅盾耳听炮声，手挥毛笔，撰写《呐喊》的创刊献词……《站在各自的岗位》。

第一期《呐喊》出版了。邹韬奋主编的《救亡日报》也出版了。上海的公众纷纷争购。

《呐喊》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在第一期《烽火》的封面上，加印了以下的文字：

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

那些天，茅盾日夜为《呐喊》（《烽火》）、《救亡日报》、《抗战》、《少年先锋》等抗日救亡报刊写稿，眼睛熬出了一根根殷红的血丝，失眠症越来越严重，胃病也常发作。他妻子心疼得很，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累垮的。如果我不写文章，那才会闷死的！”他从桌子上捡起《救亡日报》第一号，对妻子朗读他写的《炮火的洗礼》：“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

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里洗一个澡！……”读罢，对妻子说：“德止，我们原来就是战士，一直以来就是战士，今天我们是经受着炮火洗礼的战士，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去同民族的敌人战斗啊！”说着走到妻子的身边，把《救亡日报》放在妻子的手中，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关注地望着她。

妻子的眼眶里也有泪珠在滚动，她深情地说：“你的心，我懂！”

三三、在《文艺阵地》上

战火向上海整个市区蔓延。

1937年10月5日，茅盾带着女儿、儿子离开上海。他们先坐火车到镇江，再乘轮船到汉口，又搭火车抵长沙。在陈达人和黄子通帮助下，他让沈霞考入周南女中，又送沈霜插进岳云中学。安排好两个孩子之后，他即乘火

车到汉口，想搭轮船回上海。谁知战事发展很快，轮船只通到南京。孔德止来电报，让他走浙赣和沪杭铁路。然而一路上火车时开时停，11月5日才到杭州。使他吃惊的是：这天凌晨，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从中午起火车已不通上海。

归路断了，如何是好？他去找生活书店杭州分店想办法。一个老店员建议他到绍兴，再乘船返上海。

11月12日晚上，茅盾终于回到信义村家中。妻子在替他炒蛋饭时告诉他：“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了。”

茅盾想，从现在起，租界已成为“孤岛”，看来得想法离开上海了。

这年除夕，他和妻子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站在船舷旁，他眺望夜色中的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在这里，他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二十年，如今在战火的逼迫下，终于要离去了！他后来怀着深情写道：“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现在我要离去了，为了祖国神圣的事业。但是我还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年初，沈雁冰和妻子抵广州，再转车到长沙，和两个孩子会合。然后他只身到武汉。

这时，生活书店已从上海迁到这里。他去生活书店，见到了徐伯昕和邹韬奋。三人商量后，决定编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取名《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考虑到武汉不可能长期坚守，他们决定刊物在广州编辑、出版。

一天，茅盾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董必武。董必武希望他留在武汉，参加正在筹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他认为自己还是去编杂志和创作小说更合适。董必武听了，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并介绍吴奚如帮助他组织稿件。

沈雁冰听说楼适夷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就找到了他，对他说：“你跟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多，请你为《文艺阵地》多组织一些稿件吧。”楼适夷应允了下来。他又向老舍、叶以群、冯乃超、洪深、孔罗荪、宋云彬等人约了稿。然后才回到长沙。2月21日，茅盾携家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张天翼赶到车站送行，并且交给予他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华威先生》。

2月下旬，茅盾一家抵达广州，住在爱群大酒店。他着手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

有一天晚上，《立报》总经理萨空了来访，对茅盾说：“我准备把停刊的《立报》。

迁到香港出版，特此来请你去编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

我要在这里编《文艺阵地》。”萨空了说：“这并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嘛。

《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又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而《言林》每期只要二千五百字，你顺手就编了。你可以到香港安家，那边居住条件、写作环境都比广州好，安静，免得天天躲警报。”

“唉，我最烦躲警报了。可是……”

“你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来排印，反正你只好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生活书店负责，如果有事情要来广州，坐火车两个多

小时也就到了。他们生活书店给你多少编辑费？”

茅盾对他说了数目。

“那怎么够你开销？现在物价又天天上涨。如果加上《言林》的编辑费，你又住在香港，那里物价便宜，你就可以安心搞创作。”

一番话使茅盾动了心。经过与妻子商量，他接受了萨空了的建议，举家迁居香港。

把家安顿下来后，就埋头阅读、编辑源源而来的稿件。

3月20日，他把《文艺阵地》创刊号的最后一批稿子发往广州，但是他听说广州的印刷条件很差，简直不能跟上海相比，实在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去看一看排印情况。

这天，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经营陪着茅盾走进印刷厂。校样拿来了，他发现几乎满篇错字。看看排字工人，技术差，手脚慢；字体不全，许多字要靠手工刻，字行间不用铅条而是用竹条，排出来的版面很难看。心想，果然耳闻不如目见，广州的印刷条件竟如此之糟！茅盾本来打算在广州在两三天，结果却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在印刷厂里校错字。

巴金到旅馆来看茅盾，见到他伏案校对的情景，很感动。后来他说：“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很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文艺阵地》创刊号在4月1日出版后，各界反映强烈。尤其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反响更加强烈。在这篇近五千字的小说里，张天翼以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的抗日官。抗日的青年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读了纷纷拍手称快。

国民党当局却大肆咆哮，说这篇小说是讽刺政府，破坏抗战。也有一些人忧心冲冲，害怕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不利于抗日救亡。

面对这种不同的反映，茅盾作为《文艺阵地》的主编挺身而出，先后撰写了《论加强批评工作》和《八月的感想》，高度赞扬和评价《华威先生》。他写道：“《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这里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得很大‘兴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这也是近半年来文坛的新趋向。这决不是不好的倾向（有人以为这是作家的悲观主义的流露，我则不以为然）。这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

诚然，《华威先生》尚多可议之处，这个典型还应去发展，但是以此而作为反对丑恶描写的借口，那就是‘倒掉盆里的污水边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了’的笑话。”

那些天，他一边忙着编辑刊物，一边为《立报》的《言林》创作边载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同时还不断写作评论，热情鼓励支持第一批抗战文艺作品。

《文艺阵地》创刊号出版后，茅盾的编辑工作一帆风顺，然而刊物的排印工作却困难重重。茅盾于是和生活书店商量，是否移到香港出版。

生活书店同意了，却又遇到了麻烦：香港政府怕得罪日本人，规定刊物上不准用“敌”字，连“彼此敌对”、“同仇敌忾”也不准使用，“敌”一律用“×”代替。还有“奸淫掳掠”等二十多个词句也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刊物上满页××，那怎么行！

茅盾找到新知识的爱国教育家吴涵真，对他说：“吴老先生，我想，《文

《文艺阵地》虽在香港排印，名义上却仍在广州出版。香港政府是否可通融一下，免去例行的审查？”吴答应去找港府有关方面说说，再给回音。过了两天，吴涵真来说，香港政府里的华人官员倒愿意帮忙，但英国官员一口拒绝，他们还是怕得罪日本人。

“一本鼓吹抗战的文艺刊物，却把所有抗敌的字眼换成‘××’，在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文艺阵地》是面向全国的大型刊物，它不能受制于香港这个弹丸小岛！”

茅盾因为气愤，有点口吃地回答。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孤岛”上海。经过与生活书店广州、香港、上海三个分店的磋商，他们决定把《文艺阵地》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到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由于茅盾不能亲自去上海发稿和看校样，他就写信给留在“孤岛”的妻弟孔另境，请他帮助编排。

孔另境曾协助他编选《中国的一日》，是可以信任的。从第四期起，茅盾先是组稿、选稿、编稿、编好后由生活书店托人带往上海，然后写信“指挥”孔另境编排。孔另境是个青年作家，他在协助茅盾编排中，常常自作主张。有一次把《旅途中》一篇小说题目下的“笔记”二字改成了“手记”，等到茅盾发现，杂志已经印出。他只好写信告诉孔另境：“‘笔记’二字仅稍牵强而已，‘手记’则不通矣！以后遇有此等情形你还是不要改动。”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大凡我手写手订之件，都看了两遍的。不会有错误及遗漏，——你所不解或认为不妥者，我都自有其用意也。”他对孔另境就是如此“遥控指挥”。

那时，有几个青年评论作者常常给他主编的《文艺阵地》投稿。其中一个李南桌，湖南人，长沙遭到敌机大轰炸后和妻子来到香港，在一家中学教书。

这年元月，茅盾路长沙，应邀在“银宫”讲演。李南桌听后到茅盾的住址，曾前去访问。

茅盾当时以为他是想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请求批改习作。出乎茅盾意料的是，他却谈起了文艺方面的许多问题，从外国的到中国的，从古典的谈到现代的，而且很有见地，对于战时文艺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看到这个青年思路敏捷，很有才气，许多观点与自己一致，茅盾感到惊讶，心中顿生喜爱之情。便对他说，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如果办成了，希望他能支持。后来李南桌接连给《文艺阵地》寄来了几篇文章，茅盾是多么喜悦呵！他把这些文章一一发表在《文艺阵地》上。在《文艺阵地》创刊号至第十三期的二十篇文艺论文中，李南桌的就有八篇。

从此，茅盾和李南桌的交往密切起来。每当李南桌来访，茅盾总让妻子给这位青年朋友沏茶、拿水果、递点心，和他促膝交谈文艺问题。面对这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听着他侃侃而谈，茅盾为他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对于他善于把所学的原理溶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又用来衡量现实，剖析现实中的矛盾，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深为佩服。

一些知名的作家、理论家读了《文艺阵地》上李南桌的评论，也给茅盾来信称赞，有的还以为那样老练的文笔一定是某位大作家的化名之作。茅盾复信告诉他们：李南桌是个刚出茅庐的青年，但他是一个读书多而善消化的人，他谦逊，好学，深思，明辨，在他这样的年龄实在难得。

有一天，茅盾听说他打算系统地写几篇莎士比亚和歌德研究的论文，

还有一个构思了很久的长篇小说也打算写，便热情鼓励他一篇一篇地写出来。

“沈先生，我们有了个孩子以后，我是又要教书，又要当保姆，实在很少有时间来写作，我的论文都是在深夜灯下赶出来的。”李南卓说。

“我不教书，不当保姆，可我也常常写到深更半夜呀！”茅盾说着呵呵地笑起来。

“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夜猫子。”进来给客人茶杯续水的茅盾夫人插了一句。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了半夜。

然而，万万没想到，李南卓因急性阑尾炎未能及时治疗而死了。茅盾听到噩耗，顿时惊呆了，跌坐在椅子上，久久说不出话，泪水潸潸而下。李南卓是他发现的第一个卓越的青年评论家呵！

茅盾和夫人去向李南卓的妻子表示哀悼和慰问。她含泪告诉茅盾，李南卓在弥留之际神智清醒，念念不忘他的治学写作计划。呼喊：“我要活，要活，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茅盾回到家里，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灯下写了《悼李南卓——一个坚实的文艺工作者》，发表在《立报》的《言林》上。为了纪念李南卓，茅盾还把他的论文汇集起来，帮助李南卓的妻子编成一本《李南卓文艺评论集》，并由他推荐给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茅盾在《文艺阵地》上的战斗，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关心和指导。廖承志派从事文化联络的杜埃去拜访茅盾，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告诉他，以后各期都定期转给他。茅盾如获至宝，拜着《新华日报》说：“有了它，我就有了指路明灯。”

茅盾以他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组织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队伍，象陆定一、地圣陶、萧红、老舍、郑振铎、许广平、丰子恺、刘白羽、周而复、骆宾基、臧克家、田间、陈白尘……等等作家的作品，都从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延安解放区，和大后方寄到茅盾手中，又经茅盾之手刊于《文艺阵地》，为抗日战争呐喊、冲锋。

三四、赴新疆途中

抗战开始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以进步姿态出现，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与他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遣了毛泽东、陈潭秋、孟一鸣、林基路、邓发等前去工作。新疆一时间出现了一种新局面，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和进步文化人的向往。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到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后，担任了新疆督办公署和省政府高级顾问兼新疆学院院长。

杜重远向盛世才推荐了茅盾，并代表盛世才邀请茅盾到新疆学院任教。

1938年12月中旬，茅盾将《文艺阵地》委托给予楼适夷编辑。同月20日，他偕夫人也德止及女儿沈霞（亚男）、儿子沈霜（阿桑），离开香港，前

往新疆，想到那一片正在欣欣向荣的天地里干一番事业。

他们先是乘法车轮船“小广东”号抵越南海防，再坐火车经河内到昆明，1月4日早晨7时，登上欧亚航空公司直飞兰州的班机。同行的还有萨空了的夫人金秉英、她的女儿苦茶和苦茶。

“沈先生、沈太太，跟你们作伴去新疆，我们母女三个可有照应了。我先谢谢二位！……”

萨空了哪知道我们留在香港的苦楚呵！”金秉英见人自来熟，热情地对茅盾夫妇说。

“我跟萨空了是老朋友，你别客气，一同入疆，理应互相照顾。”茅盾介绍妻子和金秉英认识，又招呼女儿、儿子和她的两个女儿坐在一起。

飞机在成才停留半小时上下客。张仲实来了，他对茅盾说：“上星期，杜重远给我来了电报，让我赶到成才搭你们这班飞机。”

“欢迎！欢迎！”茅盾和他多年不见，紧握着张仲实的手说。

“张先生，你还认识我吗？”

“哦，萨太太，怎么能不认识呢！”

他们跟别人换了座位，坐在一起热烈地聊着彼此这些年的情况。

经过九个小时的飞机，飞机在兰州机场着陆。他们一下飞机，凛冽的西北风迎面扑来。

在昆明，茅盾只在西装里加一件薄毛背心，上飞机前，他穿上了毛衣毛裤，珧上了呢大衣。但是一下飞机，他就感到自己的装备太差了，西北风轻易地穿透厚呢大衣，直浸骨髓。他回头看了看张仲实，这位旅伴只穿了一身西装，连大衣也没有，站在这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这时，航空公司送旅客进城的大轿车开来了。茅盾、张仲实、金秉英等人连忙钻进汽车。

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卷进车厢的黄色尘埃使他们一个个成了土人。

他们走进中国旅行社兰州招待所。这家旅馆是兰州最高级的，却简陋得可怜，楼上楼下各有五间客房。

就在茅盾与经理寒暄的时候，金秉英快步奔上楼，占据了中间最敞亮的一大间，又主动替张仲实占了隔壁的一间。“张先生，你东西放在这间好了！”她对正在上楼的张仲实喊道。

张仲实看见金秉英替他占的那间房约有二十平方米，而留给茅盾一家的紧挨楼梯口那间只有十一二平方米，于是让茅盾一家住了大间，自己搬进了小间。金秉英看了，气得鼓着腮帮直吹冷气。

茅盾看到妻子在忙着开箱子，就问：“德止，你急着找什么？”“找你的丝棉袍、丝棉裤呀！”

茅盾心想，这些东西在香港根本用不着，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下的。

这时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了清静洗脸水和浑黄的饮用水。茅盾一家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清的是井水，但是苦水，别说喝，就是洗脸也使人皮肤涩得难受。浑的是河水，却是甜水，是五角钱一担雇人从黄河里挑来的。

从兰州去新疆，没有定期的航班，只能等苏联的便机。但是苏联的飞机有时三五天一架，有时一个多月也不飞一趟。茅盾和张仲实原来估计最多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成行。

谁知在兰州等了四十多天。

第二天上午，茅盾看到在金秉英右边房间里两位二十几岁的女房客。其中剪短发的一个像学生，另一个高挑身材，梳两根长辫子，总是一身男子

打扮 黑皮夹克、马裤、长统皮靴，经常外出，显得有点神秘。他虽有一双善于观察人物的眼睛，却也一时看不出这一对女郎的身份。向金秉英打听，她说：“她们也是去新疆的。可她们去那里能做什么？沈先生，我猜那个高个子的是军统女特务。”“哦 ，会是吗？”“怎么会？”

弄不好是重庆方面派来盯我们梢的！”

“啊 ”茅盾没有料到这一层。心想，看不出这位旅伴会有如此的头脑，真是人不可貌相呀！而那一对女郎要是也与自己同行，又不知道会成为怎样的旅伴呢。

有一天，孔德止和金秉英为争根晒衣裳的绳子吵了起来。茅盾正巧去逛书店回来，急忙上前劝解。

“沈先生，你夫人真是太不讲理了，呜呜 ”金秉英拉长哭腔诉说。

“你才不讲理！我拉的绳子，你为啥不说一声就霸占了去？啊？你说！”孔德止伸手指着金秉英，毫不示弱地说。

茅盾一边向金秉英道歉，一边劝说：“为了一根绳子，何必争吵呢？萨太太，你就在这儿晾衣裳，我们再拉一根。德止，走吧！”“我不走！我拉的绳子为啥让给她？”“德止，看在我的面上，你让让她吧。”茅盾背转身悄声对妻子说，“外人见了多不好看！”

他把妻子劝回房间，叫女儿亚田再找个地方拉上绳子，把衣裳晾上。又倒一杯热茶，对坐在床沿的妻子说：“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新疆，也真不容易，萨先生不在一起，我们要多照顾她。”“谁不照顾她了？一路上她处处抢先住好的，用好的，难道我们活该吃亏受欺侮？”妻子余怒未息地说。“萨空了跟我们是老朋友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同我们一起入疆，我们把方便让给他们，也理所应当。”经过茅盾一番好言劝说、安慰，孔德止的怒气才渐渐消去。

在招待住久了，茅盾和那两位女郎天天见面，也慢慢熟了起来。旧历除夕，招待所免费请全体旅客吃年夜饭，他们在一个桌上，还互相碰杯共祝新愉快。剪短发学生相的那个，很少出门，天天看小说，见人显得腼腆，不多说话。另一个被金秉英猜为军统女特务的，善交际，茅盾等人提防她三分，轻易不同她答话。有一天，孔德止外出买日用品，茅盾正在为兰州出版的《现代评论》写一篇《抗战与文艺》，那位神秘女郎却叩门而入，主动和他交谈起来：“沈先生，我知道您是大作家茅盾，能和您谈谈吗？”“可以，可以。”

茅盾感兴趣地说。

她告诉茅盾，她早就是茅盾的崇拜者，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爱读他的小说，喜欢《蚀》、《虹》里的慧、章秋柳、梅女士。“其实，我不过是爱好文学，我的女伴小林简直是着了迷。沈先生，您能不能对小林作些指导？她很胆小，怕见您这位大作家。”

他见这位女郎侃侃而谈，的确不像个学生，就问她们从哪里来，到兰州有什么事。

她说她们从重庆来，想去新疆。他问：“你们是学生吗？”“原来是，现在都不是了。”

我大学没有读完，为了生活，考进重庆的一个机关当了小职员；小林是学医的，半年前失了学。”那你们去新疆做什么呢？”“听说新疆不错，我们想去碰碰运气。沈先生，你们准备怎样进新疆呢？”“我们是应聘去迪化

教书的，进新疆要得到新疆当局的同意，自己想去恐怕容易。我劝你们对入疆的事，要三思而后行……”

她听了茅盾的话，笑而不答。当茅盾问她在兰州有什么社会关系时，她又回避了茅盾的问话。

晚饭后，茅盾到金秉英房里，询问苦茶、苦茶两姐妹是否过得惯。金秉英悄悄告诉他，神秘女郎在甘肃省政府和省党部都有熟人，她们打算通过这些关系到新疆去。她说：

“沈先生，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她到新疆去是负有任务的。她的同伴看样子并不知情，是被她利用了。我们应该通知新疆当局不让她们去你说呢？”茅盾听了未置可否，金秉英就说她要拍电报告诉萨空了，让萨空了报告新疆督办公署。

那女郎后来又再次找茅盾，希望他能介绍她们去新疆。茅盾婉言推辞，并且劝她们不要去那里碰运气。孔德止听说这个神秘女郎几次找茅盾谈话，紧张得很。她告诫丈夫：

“德鸿，你可别大意，也许她真像金秉英说的，是个军统特务呢。”他安慰妻子说：

“她即使是蛇蝎，我也不怕。我倒以为这个女郎很值得观察了解，她跟你、金秉英都不同，是当代新女性中一个新的类型。”“我不管她是新类型、老类型，你自己可要留心，别上当！”“三姑有旨，德鸿遵命就是。”

听到这句茅盾平时少有的风趣答话，孔德止严肃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在茅盾一和将要动身之前，那个神秘女郎又来找茅盾，说她们决定不去新疆了，明天就离开此地。

茅盾心想，她们终于未能去新疆，也许是金秉英造的舆论使新疆当局不发通行证。

或是她们听了我的劝告改变了语音。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就不必管它了。如果这两位女郎成为自己入疆的旅们，不知又会要引出多少麻烦？

2月20日，茅盾一行八人搭飞机来到哈密。因为孔德止患肺炎，在哈密滞留了半个月。

3月6日，迪化（现为乌鲁木齐）的新疆督办政府派一位副官和一辆小轿车、一辆八个座位的旅行车到哈密接茅盾、张仲实等人。那位副官对茅盾和张仲实说：“迪化小汽车很少，这次只来了一辆卧车，我想请沈先生、张先生、还有刚病好的沈夫人坐小卧车；萨太太一家、沈先生的小姐、公子和我本人坐旅行车。”茅盾、张仲实同意他的安排。

8月早饭后，茅盾和张仲实向送行的哈密区行政长官刘西屏等人告别，走出招待所大门，却见迪化来的那位副官一脸尴尬地指着小卧车说：“沈先生，你看……”

原来金秉英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坐在小卧车里了。她看见茅盾、张仲实走去，就大声招呼张仲实：“张先生！张先生！我这里给你留着个座位！”张仲实进退两难。茅盾连忙说：

“仲实，你去罢，我们一家坐旅行车。”

张仲实见周围已站满了送行了哈密官员，只好上了小卧车。茅盾招呼副官进了旅行车，对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离开哈密，按副官的规定，旅行车在前，小卧车在后，相距五十米，在戈壁滩上行驶起来，他们预定在天山脚下的七角井过夜。

午饭后再次上路，小卧车抄到旅行车前疾驶而去。副官神色紧张地吩咐司机追上去。

可是看不见小卧车了。夜幕降临了，旅行车打开前灯，在荒漠中开足马力，顶着狂风奔驰着。两个多钟点以后，前面灯光闪烁，副官指着灯光说：“好了，总算到了！前面就是七角井。沈先生，你不知道，这辆车太旧了，在迪化刚刚大修过，我真担心它在半路上抛锚呵！”

四时半，车子才在招待所门前停下。张仲实已经等得很焦急。他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多小时，晚饭也已吃过，萨太太和孩子们都已睡了。

第二天、他们一早出发，一路上两辆车严格按照旅行车在前小卧车在后的顺序，结伴行驶。晚上安抵鄯善县招待所过夜。茅盾听妻子说，昨晚副官狠狠地训斥了小卧车司机，不许他擅自开车先行。在戈壁滩上行车，必须结伴一起走，互相照应，这是一条纪律，否则单车出了故障，陷在沙漠里很危险。小卧车司机辩解说，这是车上那位太太一再要他超车快开的。副官警告他今天不能再犯，不然到了迪化要叫他吃官司。

第三天，副官已经成了他们熟悉的新旅伴，一路上向茅盾夫妇和孩子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下午三点多，他们在汽车里远远望见一座火红色的山脉，副官说：“沈先生，传说这就是《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吐鲁蕃就快到了。”

茅盾知道吐鲁蕃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当汽车驶进吐鲁蕃狭窄的街道时，副官指着跨街搭的棚子介绍说：“这棚子是专用来遮太阳的。其实，到了夏天，这样的荫棚也不起作用。正午，居民都躲进地窖，仅清晨和黄昏时才有集市。在最热的七八月里，墙壁上可以烙饼。”

“叔叔，那种饼子好吃吗？”茅盾的儿子阿桑好奇地问。“好吃，有一股太阳香味呢。”

那些天，鸡蛋放在太阳下，也能晒熟。去年，我到吐鲁蕃来，看见公安局长热得蹲在大水缸中办公哩！”

茅盾想了解新疆督办盛世才的情况，可是副官缄口不谈。

1939年3月11日是茅盾赴疆之行的最后一天。汽车翻越了天山，经过了达坂城，下午四时到达迪化郊外二十公里的地方。突然，前方尘烟飞扬，钻出一前一后两辆卡车，保护着中间的两辆小卧车，迎面驶来。这时，副官对茅盾说：“督办来迎接了，我们下车吧！”

茅盾、张仲实等人走下汽车，伫立等候。转瞬间，两辆卡车驶了过来，上面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驾驶室上面各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瞄准前方。茅盾暗算？正想着，前后两辆卡车突然一辆驶向公路右侧，一辆驶向公路左侧，形成两翼，那两辆小卧车在中间驶到他们面前。“看来情况不太妙！”茅盾不禁悄悄地站在身边的张仲实说。

他想，不要双脚才踏上迪化的地面，就被绑架。

这时，从前面的小卧车里钻出一个军人，身披黑斗篷，内穿将校呢的军装，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杜重远身穿西装、大衣，从后面的小卧车里走出，赶上前向茅盾、张仲实介绍：“这位就是盛督办！”

盛世才露出满嘴黄牙，大声嚷道：“沈先生！张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兄弟欢迎来迟，请二位多多包涵！”

茅盾一行随着盛世才的轿车驶进了迪化。

三五、身陷虎口

茅盾原来是想来新疆作一番事业的。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盛世才在新疆实行的是特务统治，所谓“六大政府”——“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民族平等）”，只不过是标榜自己进步的外衣。

杜重远请茅盾担任了新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茅盾心想：这一来，我将不得不改行做我并不熟悉的工作，而我的七行——文学工作将成为副业了。

有一天，毛泽民来访问茅盾。两人畅叙了阔别十年来的人事变迁。毛泽民告诉了他许多新疆的情况，并对他说：“……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性。他对我们延安来的人很客气，奉为上宾，但从不交心。他周围有一伙亲信，是他的耳目，你今后与这些人打交道，要小心。”

茅盾点了点头，表示知道。毛泽民又说：“我们在这里，与苏联领事馆很少往来，今后你我之间往来也不会多。因为我这个财政厅长与你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而盛世才他们又不知道我和你是老朋友。这些都是为了避嫌。不过孟一鸣今后可以与你和仲实联系，他是教育厅长，算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孟一鸣，原名徐梦秋，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莫斯科时的同学，也是从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茅盾想起那天盛世才在宴会上对他说：“这次请你和张先生到新疆来，除了教书，还有更重要事情需要你们帮助。……这件事等以后再给你们说。”于是在见孟一鸣时就问：“一鸣，你知不知道盛世才有什么打算？”

“他这人在人事任免问题上向来独断专行，不征求我们意见。”

一星期后，盛世才找茅盾和张仲实谈话，才揭开了“谜”底。原来他是让茅盾担任新疆文化协会会委员长，张仲实担任副委员长。他说：“我这个新疆呀，十四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会是由教育厅兼管的，但又管不过来。我早就想成立一个全新疆的文化协会来统管这些促进会，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你们二位莅临新疆，又是全国文化界的权威，正是领导全疆文化建设最理想的人选。”

茅盾和张仲实都说他过誉了。盛世才却说：“你们不必推辞！你们初来，情况不熟悉，这不要紧，我已经为你们物色了一个助手，就是汉族文化促进会的李佩珂，他人头熟，过去与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联系就是由他负责的。我打算让他挂个副委员长的名，兼任秘书长。”

茅盾心想既然来了新疆，就应该为新疆的文化发展多做点事，不仅仅在新疆学院教几十个学生。然而，当他问盛世才对文化协会的工作有什么指示时，盛世才却说：“你们先立个章程，订个一年计划，我想最好能尽快编出一套小学教科书来，当然要符合六大政府啦！”茅盾不禁在心里叫起苦来，但他揣摸不透盛世才为何“杀鸡用牛刀”。他只好耐着性子，一边当教师，一边做小编辑。从此，在学院里，他是“沈系主任”，在官场上，则是“沈委员长”。

三六、逃出魔爪

从6月份起制造“患病”舆论以来，茅盾时时刻刻在寻找逃出新疆的机会。但他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因此在外间丝毫不露声色，继续“生病”。

1940年春节后的一天，屋外下着大雪，茅盾和女儿沈霞在屋内谈诗说文。他问女儿：“用什么比喻下雪最好？”亚男随口吟出：“未若柳絮因风起。”茅盾说：“你这是拾人牙慧。

你看那窗外的大雪，哪里像柳絮呢？”亚男往窗外看了片刻说：“是不像。”茅盾又问女儿：“《世说新语》中那一则《言语》，你还能背得出吗？”

女儿摇摇头。他便背诵起来：“谢太傅雪日内集儿女讲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爸爸，你记性真好！”女儿赞叹道。坐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说：“你爸连《红楼梦》都背得下来呢！”女儿问爸爸是背给谁听的。茅盾不肯回答。女儿便缠住母亲问。

孔德沚只好停下针线，对女儿说：“那是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你爸爸有事去开明书店。

章锡琛、郑振铎还有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谈话。章锡琛说你爸爸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来，振铎不相信，说灵不灵当场试验。你爸爸推脱不掉，只好请他们指定一回，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

朋友们才服了。德鸿，我没有给你夸大吧？”

茅盾说：“是这么回事。”接着又和女儿议论下雪：“从古以来的人，和你一样，都以谢道韞的比喻为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起，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呵！

如果说北方，我看她哥哥谢胡用‘撒盐’来比拟，实在也没有错。当然北方也有下大朵雪花的时候，那也是‘柳絮’了，不过，总是‘撒盐’时居多。你说，是不是这样？”

亚男再次望了望窗外“撒盐”似的大雪，问：“爸爸，如果要你写这大雪，您也把它比喻成‘撒盐’吗？”

“那怎么行呢！写作要有自己的发现、创造才行。”茅盾说着，走到书桌前，捡出一张笺纸递给女儿：“这是爸爸写的一首绝句，你看好不好？”亚男接过来，念道：“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初试爬梨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这时，忽然张仲实来了。他说：“雁冰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我昨天去拜访了孟一鸣。

他说盛世才已在怀疑我了。”

“有根据吗？”茅盾问。

“他说盛世才多次问起我，问我回国多久了，是不是共产党员。仓只好回答不清楚。

我想去找盛世才当面说说清楚，老孟不赞成，他说盛世才既然已经怀疑，我去解释也没有用，相反只能增加他的怀疑。”茅盾认为孟一鸣说得有道理，又问他：“老孟说到盛世才怀疑我了吗？”张仲实说：“孟一鸣认为盛世才对你似乎还没有怀疑，你的历史盛世才好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是不是也有人在盛世才耳边说你什么，他还不清楚。据他估计，大概短期内还不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茅盾劝他不必过于紧张，然而他也感到，长此下去危险会一日甚于一日，必须设法早日离开新疆。

两人还谈到，杜重远最近再次要求回内地治病，又遭到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

他们都为这个老朋友岌岌可危的处境担忧。午饭过后，他们两人正在聊天，突然督办公署来人通知张仲实，说盛督办叫他立即前去公署。张仲实敏感地低声对茅盾说：“恐怕要出事了！”

茅盾的妻子急得要哭了：“这下怎么办呀？张先生”事到如此，他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茅盾握着张仲实的手说：“多多保重！”张仲实穿上皮大衣，戴上帽子，迎着“撒盐”似的大雪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去了。

茅盾夫妇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时看看电话，希望张仲实来个电话报平安；但又怕电话骤然响起传来凶信。到晚上七点钟，孔德沚才摆晚饭。他们刚拿起筷子，张仲实竟来了。

茅盾夫妇喜出望外，忙问究竟。

张仲实余悸未消地说：“唉呀呀，我这几个钟头就像是闯过了鬼门关。”茅盾妻子特地为他开了一瓶名酒，斟上一杯说：“张先生，你先压压惊。”张仲实告诉他们：“我到了督办公署，并未见到盛世才，也未被引到他通常会见我们的西客厅，却被盛的副官带到了一间厢房，说督办请我等一等。谁知我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多小时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盛世才终于来了，手中拿着一份材料，说要我修改一下，并对我久等表示歉意。

说完他就走了。那是一份极普通的材料，我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翔实我盛世才。一会儿副官回来对我说，请张先生回去罢。你们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茅盾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吧？”

张仲实分析说：“盛世才要我修改材料，完全是借口，因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份材料让我等两个小时，他可以派人把材料送到我家。猜想起来，他本来想把我抓起来，所以把我带到了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个小时，才借口让我修改材料，把我放了。雁冰，你说是不是这样？”

茅盾点头说：“你这分析合乎情理，但是盛世才为会么要抓你呢？倒使人难以捉摸。”

张仲实说：“我早年在苏联留学，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因故脱党，这些不能成为抓我的理由，除非因为我与杜重远的关系比较密切。”

茅盾想到他去年新疆，是杜重远建议盛世才发出邀请的，自己与杜重远的关系同样密切。

不知那一天盛世才心血来潮也把我“请”了去，那就不知道能不能像张仲实这次平安脱险了。

第二天、两人按昨晚的约定，一起去找孟一鸣，茅盾问孟一鸣：“党组

织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们脱离险境吗？”孟一鸣说，他与陈潭秋、毛泽东两同志商量过，都认为当前是张仲实面临着危险。

“那我怎么办？”张仲实着急地问，孟一鸣为张仲实出主意：“万一盛世才下一次真的把你抓起来了，你就说你是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面向盛世才证明你的确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经过延安派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放出来，送到延安去。”“好的，就这样！”张仲实胆子壮了许多。

“我呢？”茅盾忙问。孟一鸣分析说：“估计盛世才顾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影响，还不会对你下手。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另想办法。当然，你也要时刻警惕。”

2月底，萨空了来向茅盾辞行，说是要送妻子去重庆动手术，并说：“盛世才告诉我，如果国民大会召开，就让我作为新疆代表。还说，另外两位代表是你和张仲实。”茅盾和张仲实分析，盛世才的这个姿态对他们也许是个好兆头。

几天以后，张仲实收到他的伯母去世的电报。经过与孟一鸣商量，他给盛世才写一封辞意恳切的信，说他从小由伯母抚养长大，现在伯母去世，想请假回去安葬。信送出去之后，他们估计盛世才不大会同意。然而，他居然准了假，并说一有便机即可以走。

张仲实是多么高兴呵！他天天等飞机。虽然经常见到飞机从空中飞过，但督办公署经常给他的答复总是“没有飞机”。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也没有走成。

“四·一二”新疆革命七周年活动那天，茅盾又被请去骑马阅兵。这回他已能自己坐在马上，不要人牵着走了。然而，他却无心观赏阅兵的场面。他眼望着盛世才，心里想的是，何时才能摆脱这个“土皇帝”的魔爪呢？4月20日上午，茅盾突然收到他二叔发自上海的一封加急电报：“大嫂已于十七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

茅盾心痛如绞，孔德沚捧着电报放声痛哭。她想起婆婆把她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哭着责怪丈夫不该到这能进不能出的地方来，弄得无法回去去奔丧。茅盾的眼泪也潸潸而下。

他想到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来，母亲几乎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她以最深沉的爱培育两个儿子成长，又支持他们远走高飞，投身革命，却从不企求补偿。她劳碌一生，而在弥留之际却见不到一个亲人。忽然，他心中一亮：“我何不学张仲实的办法，也来个请假奔丧？盛世才一向以孝道教人，既然允许仲实奔丧，大概也不会拒绝我吧。不管盛世才是真心还需要假意，无论如何这是我请假回内地的一个理由，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值得一试。”

挂通了电话，茅盾说他接到上海电报，母亲病故，虽说丧事已毕，但还有些后事需要请假回去料理。盛世才沉默片刻，就同意了。茅盾接着说：“督办，我母亲的丧事已办完，但我还想在这里开丧遥祭一下。您看是否可以？”

盛世才大声说：“沈先生孝心可嘉，完全应该，应该。”“那么回头我拟个讣文，请督办过目，如果可以的话，请交《新疆日报》刊登。”“好的。”茅盾当即拟写了一个讣告，内称：

“母亲病故，经请示盛督办，将于4月*日在本市开丧遥祭，并已获准请假回乡料理后事。”

22日一早，茅盾一家穿了素白的孝服，来到设在汉族文化促进总会的

灵堂内，伫立在茅盾母亲陈爱珠遗像的一侧。盛世才的代表卢毓麟第一个来祭奠，依次吊唁的是各厅厅长和各机关首长。下午，茅盾前往督办公署向盛世才谢孝，又去向各厅长谢孝。

张仲实来看望茅盾，说盛世才已答应他和茅盾一道回内地。

24日，茅盾和张仲实来到督办公署，参加盛世才为他们举办的饯行宴会。在宴会上，盛世才冠冕堂皇地说：“沈先生、张先生为慈母、伯母奔丧，请假回内地，你们孝道可嘉，我盛某岂有不准假之理？我衷心感谢你们一年来在新疆帮忙作了许多工作，希望沈、张二位先生在事后再来新疆。”

茅盾和张仲实也相继讲话，表示感谢盛世才的款待，并说：“办完事一定再回来。”

过了两天，茅盾借着向盛世才请示如何交代文化协会工作的机会，顺便问他哪一天能走。

盛世才却回答：“现在没有飞机，什么时候有，我会通知你们的。”张仲实听了茅盾转述的这番话，着急地说：“糟了！当初他也是这样答复我的。他可以借口没有飞机，一直拖延下去。”“那不行。我们必须趁热打铁，不能让他拖。”茅盾果敢地说。

两人又去找孟一鸣求援。孟一鸣说：“盛世才对我说过，你们这一走是不会回来了。”

不过，你们这次声势造得不错，这是有利条件。如果你们提出乘汽车，盛世才是无法拒绝的。只是路上很不安全，万一有人扮成土匪半路上截去，就毫无办法。至于坐飞机，你们不妨私下找苏联总领事，也许他有办法。”“我们私下找总领事，会不会引起盛世才的怀疑？”张仲实有点担心。

茅盾说：“不会的。我们是中苏文化协会正副会长，现在要回内地，完全有理由去拜会总领事。”

在苏联领事馆，总领事告诉他们，这几天正好有一架交通飞机要从莫斯科来迪化，过了“五一”节就飞往重庆。盛世才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就是搭这架飞机回重庆。茅盾心想，盛世才对他俩保密，看来还是不想让他们走。于是他请苏联总领事想办法让他们搭这架飞机走。

“我当然愿意帮忙，不过总要得到盛督办的同意才行。”总领事说完，想了一会儿，就如此这般说了一个办法。

“五一”节，盛世才宴请苏联总领事，请茅盾和张仲实也赴宴。在宴会上，他们瞅准盛世才正与苏联总领事交谈，便走过去敬酒，趁机问道：“督办，听说有一架飞重庆的苏联飞机，不知我们能不能搭这架飞机走？”“哦，哦，只是这架飞机是苏联的，请你们问问总领事。”

茅盾立即问苏联总领事：“总领事，盛督办已经同意我们回内地，我们可以搭贵国的飞机走吗？”

总领事爽快地答道：“盛督办同意了，当然可以，可以。”盛世才不好再阻拦，举杯对茅盾、张仲实说：“我祝你们二位一路平安！”

事后他俩见到苏联总领事，三人哈哈大笑，原来这是总领事出的妙计，他们如法炮制，果然成功。

5月4日晚上，茅盾和妻子送走了最后几个前来送行的朋友，准备早点休息。因明天上午就要乘飞机离开新疆。突然，电话铃急骤地响起，一听，是盛世才打来的，不禁一惊：

难道又要出事？盛世才寒暄了几句，忽然问：“你的儿子不是在新疆学

院读书吗？他是不是去内地呀？”茅盾心想，莫非他要拿我儿子作人质？顿时紧张得额头渗出冷汗，镇静了一下马上回答：“督办弄错了，我的儿子去年十二月就退学了，他有病，支持不了紧张的学习，我正打算这次把他带到内地去好好治一治病哩。”盛世才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那就去治病罢，明天我为你们送行。”

第二天，盛世才在架着机关枪的两卡车警卫护卫下，来到了迪化机场。

茅盾面带笑容与这位新疆土皇帝交谈着，心却忐忑不安，怦怦跳动。只要飞机未起飞，盛世才一声令下，他们一家和张仲实便会立刻成为阶下囚。

9时，飞机轰鸣着离开跑道，昂首冲向蓝天。茅盾眺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全身顿时漾溢一种难以言说的轻松感：啊，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逃出了牢笼！

12时，飞机在哈密降落。张元夫对茅盾说，要在哈密过夜。哈密行政长官刘西屏在外宾待所设宴欢迎茅盾一行。由于他们在迪化已从孟一鸣处获知刘西屏是从延安来的共产党员，因此这次的宴会气氛比一年前更融洽，茅盾也破例喝了几杯香槟酒。然而这一夜，茅盾夫妇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对妻子说：“我总觉得飞机在哈密停留有点蹊跷，不是说好飞机从迪化直飞兰州的吗？”“是呀，这事真奇怪……”妻子说。“我真担心，怕再出事。盛世才这人是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的！”

果然如此。午夜12点，盛世才给刘西屏打来电话，命令他把茅盾和张仲实扣留起来。

过了半小时，盛世才又电令刘西屏先不要行动，他要再考虑考虑。深夜三点，盛世才第三次打电话给刘西屏：“算了，让他们走吧！”

刘西屏怕盛世才反悔，天蒙蒙亮就去催促茅盾等人赶快起程。他想，在飞机当着苏联人的面，盛世才就不便再扣留他们。驱车来到机场，他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刘西屏耐心地陪伴着，直到茅盾、张仲实再次登上飞机，双方挥手告别。

飞机载着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向东方飞去。当玫瑰色的朝霞染红了天际，茅盾鸟瞰大地，飞机正飞越猩猩峡。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现出了疲倦而胜利的微笑，终于逃出魔爪了！

三七、到延安去

苏联的那架交通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等人仍住进兰州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清晨继续乘飞机飞往重庆。他已给重庆的友人拍了几封电报。

晚饭后，茅盾和张仲实正想早点休息，张元夫忽然来通知他们：因为傅作义将军有急事要搭飞机，请他们迟走几天，搭下一班飞机去重庆。

茅盾问张元夫：“傅将军怎么会知道我们这架飞机去重庆？”

张元夫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个，他们自然消息灵通。”

听到这位盛世才的代表如此说，茅盾心中冷笑道：哼，才飞出新疆，我们的“身价”在你的眼里就变了。于是说：“张仲实先生是单身一人，飞机上不会只缺他一个位子，我们一家可以留下。”

“不，不，我还是和沈先生一起行动。”张仲实连忙推让。

看到张元夫还想噜苏什么，茅盾冷冷地说：“张先生不必解释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又无公干在身，早走迟走无所谓。只是要麻烦你派人把飞机上我们的东西送到这里来。”

“好，好，这事我来办，您放心！”张元夫一迭声地说着走了。

茅盾的妻子嗔怪张仲实不该谦让：“张先生太老实了，你这一让让掉了一张飞机票，要飞重庆，只好自己掏腰包了。”

张仲实却坦然地说：“我原来就不想去重庆，现在你们都留在兰州，我一个人更不想去了。”

“您想去延安？”茅盾问。

“对，延安。在迪化我问过孟一鸣，他说到了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就行。”张仲实又劝他俩，“你们也去延安看看吧！”

夜晚，茅盾和妻子商量此事，他说：“如果交通方便，我们就和仲实同去延安，两个孩子可以进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学习。”

“也好。听说闻天、琴秋都在那边，我真想见见他们！”妻子说。

由于买不到飞机票，茅盾去找西北公路局的沈局长帮忙。过了一天，沈局长告诉茅盾，正好青海有一位活佛要去重庆，也因为买不到飞机票，甘肃省府指令西北公路局为他开一辆专车，经西安去重庆。他已跟那位活佛说好，让他们搭他的专车去西安。

1940年5月1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车。那位活佛是喜饶嘉错，他带着一个秘书、两个随从，坐在车前面，茅盾等五人坐在中间。

因为风雪，他们在华家岭滞留了三天。第四天翻越了六盘山，汽车在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上奔驰。

专车的司机对茅盾说，塬上水贵如油，除了天上落下来的，就得从百丈深的井里打上来，人们难得洗上一次脸。停车休息时，茅盾和张仲实走进白杨树下的几户人家参加。

眼前的情景使他想起曾经听到的传说：西北有些地方大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刹时他感慨万分：

这黄土高原是肥沃的，然而在它上面生息的人民却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5月19日下午，他们经咸阳抵古城西安。由于敌机炸坏了发电厂，没有电灯，照明的只是蜡烛。

当晚7点，又一次响起敌机空袭的警报。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在乘车到郊外躲警报时失散了。孔德沚急得哭了。茅盾安慰妻子：“你别急，我想，不会出事的吧。”来到郊外，在一块麦地里，他们砰碰巧见到亚男、阿桑坐在那里，心上的大石头才落下地。

第二天下午，茅盾和张仲实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走进客厅，意外地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茅盾是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朱德总司令，感到他是一位话语不多的敦厚长者。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离开新疆的经过，并问他们今后有何打算。

茅盾和张仲实都说想去延安。

“好啊，”周恩来说，“你们无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了有了保

证。噢，你们也许还不知道，近年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去延安的沿途设下重重关卡，随便抓人。我们对于自愿去延安的青年，采取集中后分批护送的办法。去的青年都换上军装，充作八路军的人员。但即使这样，仍发生过多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截留卡车的事件。不过，你们这次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不敢留难的。”

茅盾请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们简略地讲了抗战的形势。从中了解到一年来敌我形势的变化，敌军的进攻和“扫荡”，根据地的扩大和胜利，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内战政策。朱德还告诉他们：前不久军队在山西大举进犯我八路军，被我军一举歼灭了朱怀冰的三个师。

“总司令原来要去重庆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总司令不去了，我代他去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周恩来说，“至于你们去延安的准备工作，请我们办事处的主任跟你们谈吧。”

办事处主任告诉他们，总司令是 24 日走，他们得在 22 日下午雇几辆人力车，直接拉到大门口，他派人在门口接。

5 月 24 日出发前，茅盾的女儿、儿子换上了军装，并且各起了一个假名。他和妻子仍旧穿便服，因为他们是知名人士、可以冠冕堂皇地前去延安参观，如果也换穿军装，冒充朱司令的随从，也不像。

临上车时，负责照顾茅盾几人的陈绪宗对他们说，到延安要走三天，第一天在国民党统治区过夜，那里布满了国民党特务，行动稍一不慎，就有被绑架的危险。他特别警告阿桑：“路上休息，你下车后不要乱走，不要看热闹。年前有个延安的青年，走到街上，一个国民党特务故意撞他一下，反而诬告他打人，就被预先等在旁边的宪兵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交涉抗议都没有用，而汽车又不能因他一人滞留下来。”

这天傍晚，车抵铜川。朱总司令下榻在一家旅馆，他们在另一家旅店住宿。子夜时分，突然响起一阵嘈杂的人声。茅盾连忙起身。陈绪宗不让他出去，自己走到门外。一会儿，响起陈绪宗和那些人的大声争吵声。原来他们国民党的宪兵，声称奉命搜查一名可疑分子。

陈绪宗不准他们进屋，把他们拦在门外。负责护送车队的副官闻讯赶来，他亮出朱总司令的通行证，坚决拒绝宪兵的无理要求。在双方各不相让之际，来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对副官说误会了，请副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谈谈。那群宪兵就尾随着溜走了。

翌日一早，车队又上路了。下午 1 时，来到桥山脚下。山坡上一片苍翠蓊郁的古柏，簇拥着“轩辕黄帝陵”。车队停下来，茅盾一家、张仲实等人在朱总司令率领下拾级而上，登山拜谒帝陵。黄帝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前来担任向导。

茅盾看到陵墓古朴雄伟而又带点清凉，迎面是一个巨大的土冢，冢前有一座汉武帝时建筑的祈仙台，台前立一块大石碑，陵墓两旁的许多石碑上刻着祭文。

他们在陵前留影时后，朱总司令要茅盾给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他推辞不掉，就只好提高声音简略地讲了讲：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用现代的话说，大概是中国氏族社会最早的各族落公认的首领。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先打败了炎帝，后又击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在他统治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与一个叫歧伯的医生编了中

国第一部医书《内经》……。当然，这些都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神话传说在人们口头传颂了五千多年，正证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茅盾讲完后，朱总司令带头鼓掌，幽默地说：“刚才沈先生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想妥协投降，这种人就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听着朱总司令的即兴演说，茅盾不住地点头。昨天晚饭后，朱总司令特地来看望他们。在闲谈中，他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他们谈的话题是杜甫、白居易。临分别时还提议明天经过黄帝陵时要上去拜谒一番。现在他又发现，朱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他的话虽不多，却极富煽动力，让听的人头脑清醒，热血沸腾。

下午4时许，三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经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军队的关卡，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汽车停下来让人们稍事休息。

沈霞、沈霜和其他青年都跳下车去，兴奋地跳着、笑着、唱着，尽情地倾泄第一次踏自由土地的欢乐感情。

茅盾看着欢呼跳跃的一双儿女和青年们，他也感到浑身轻松、愉快。

1940年5月26日下午2时，茅盾乘坐的汽车到达延安南郊七里铺。由于他们比朱总司令的汽车迟到了二十分钟，朱总司令和到七里铺欢迎的人群已经进城去了。公路旁还停着两辆小轿车，站着五六个迎候他们的人。

坐在驾驶室里的茅盾妻子先下了车，忙着向一个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着：“闻天！闻天！”

茅盾正从卡车后面爬下来，听到妻子的喊声，也急忙向张闻天走去。

张闻天热情地向他们伸过双手，笑着说：“一路辛苦了，欢迎！欢迎！”

“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茅盾说。

早在建党初期，茅盾和张闻天就因工作关系而认识了。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与张闻天是同学、好友，曾一起赴日本留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投身革命。

这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志走过来，用上海口音问茅盾：“沈先生，你还认得我？”

茅盾仔细端详那人，觉得很面熟，却一时记不起名字，便说：“好像见过面。”

那人哈哈大笑道：“我就是虹口分店的廖陈云。”

“哦，陈云！老朋友，老朋友。那年我们一起发动商务印书馆大罢工，你多年青年呀！”

“沈先生那年不也一样是个小伙子吗！”陈云说，“后来我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我们就再未见过面。”

“对，对！算起来有十四年了。日子过得真快，你看，我都成了小老头了。”茅盾感慨地说。

张闻天、陈云请茅盾、张仲实和茅盾的妻子、儿女换乘小卧车进城。

在南门外，他们受到不少机关、学校代表的欢迎。茅盾的弟媳妇张琴秋也来了。

茅盾他们在亲人和同志们的簇拥下向延安城里走去。这位一向以冷静稳健著称的作家，此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三八、清凉山下路

初夏的陕北高原，红杜鹃、山丹丹开得格外红艳，信天游有民歌更加嘹亮、悦耳。

茅盾住进延安南门外中共中央交际处的窑洞里，第二天早餐是小米粥，又糯又香。

他看到儿子不喜欢吃，就对两个孩子说：“这在上海是难得吃到的。你们不但要习惯于喝小米粥，还要习惯于吃小米饭，因为我们要在延安长住下去，你们将进抗大或其它学校学习。”

正说时，张琴秋来看望他们了。她是延安女子大学教育长，建议茅盾让女儿沈霞进“女大”。听说“女大”是新创办的学校，专门培养女青年，茅盾觉得这对女儿很合适，而沈霞也愿意进“女大”。张琴秋又建议沈霞进“毛泽东青干校”，但是沈霞连声说：“不去，不去！”

什么‘青干校’，《西行漫记》上有个‘陕北公学’，我要进‘陕公’！”茅盾见儿子执意进“陕公”，就同意了。

张琴秋才离开，张闻天走进了窑洞。他问：“住窑洞，你们是第一次吧？”

“嗯，平生第一次。真正是别有风味！”茅盾脸上现出舒心的笑容。

他们促膝叙旧，长谈八九年来上海文艺界的情形。张闻天问茅盾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想到前方看看。”茅盾答。

张闻天表示欢迎。然后，他陪同茅盾去拜望了毛泽东。茅盾回来后对妻子说：“润芝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跟十多年前没有两样。”

6月初的一天，茅盾正在家里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门外忽然响起一个人的湖南口音：“雁冰在家吗？”

茅盾就声把毛泽东迎进窑洞。

毛泽东对他说，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他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他们原谅，并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您上大作家、评论家，请您看后多多批评呵！”

两个老朋友无拘无束地从上海、延安的文艺活动，谈到中国的古典文学，还交谈了对《红楼梦》的评价。

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活动。他说：“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价钱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

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

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茅盾的妻子看到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而饭却吃得很少，便劝他戒烟。

毛泽东摇了摇头，幽默地说：“戒不了罗！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扑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送走了毛泽东，茅盾就翻开《新民主主义论》贪婪地看起来，不时用红笔划出重要的句子，并读出声来。

和毛泽东谈话后的第二天，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主持鲁艺的周扬领他走进特地为他们准备的两孔窑洞，并对他说：“这里一排排的窑洞，都是鲁艺的学员们挖的。”

“哦，这两孔窑洞还是套间呢！”茅盾的妻子惊喜地喊。

茅盾也看到两孔窑洞一孔有门，另一孔只有窗户，两孔间有一通道。洞壁刷了白灰，洞口向阳，窗格上虽糊的是白纸，光线却很充足。茅盾夫妇商量，里面一孔作卧室和书房，外面一孔作客厅兼饭厅。

窑洞前是一块小平台。周扬说：“您写作乏累了，可以在这里散步；天热了，这里可以纳凉。”

“晾衣裳、晒被子，也是个好地方。”茅盾妻子插话说。

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地，有许多正在泛红的蕃茄。不远处传来潺潺的溪水声。窑洞离地面仅两米，十几步台阶，进出方便。茅盾对这个住处很满意。

周扬指着附近几孔窑洞说：“那里是伙房。我给你们派一个警卫员，叫任先智，帮你们打水、打饭，明天来报到，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就是。”

小警卫员准时来报到了。

“这是我爱人，”茅盾指着妻子说，“以后你就叫她德止吧。”

茅盾妻子笑着说：“往后就多麻烦你了，你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只管说，别客气。从新疆出来时，走的太急，好多东西都没有带来，看你鞋子破得不像样了，我还带了一块布，就给你做两面三两双鞋子穿吧。”

小警卫员推辞说不要。茅盾叫他不用客气，等妻子做好了就交给他。说完叫来女儿、儿子，介绍说：“这是我的两个孩子，女儿叫沈霞，儿子叫沈霜。”孔德沚补充说：“你就叫她亚男，叫他阿桑吧！我们都是这样叫。”

从此，这个小任每天负责茅盾的警卫，给茅盾拿公文包，送信件，牵马匹，打饭，打水和采购东西。

搬到鲁艺以后，茅盾应邀去给鲁艺文学系的学员讲中国市民文学发展史。从新疆出一时，他什么书都没有带。此时要讲课，总不能只凭记忆吧？他便去找周扬。周扬给他拿来了一本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一本材料十分丰富的著作。茅盾如获至宝，参考这本书又凭他的博闻强记，他边写边讲《中国市民文学概论》。

盘腿坐在篮球场上的鲁艺学员，神情专注地听茅盾分析市民文学的三部代表作《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

在教学之余，茅盾还到学员住的窑洞串门。他谦逊亲切的态度使学员们无拘无束地提出许多问题。他对学员们谈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

也讲荷马史诗，赞美《伊里亚特》、《奥德赛》中形象的准确性、独创性。他说：“譬如，荷马的作品描写战士们打仗的勇敢，说是像苍蝇一样的勇敢。以苍蝇的勇敢形容战士们的前仆后继，而不是像老虎一样勇敢，细研究起来是很对的。苍蝇这东西，你把它赶走了，它又回来，百折不回，这不是勇敢吗？老虎狮子虽猛，但人们很少看见，苍蝇的勇敢是一般人天天都看得到的，但一般人却想不到用苍蝇来形容勇士的再接再厉。你们读荷马的史诗，就会知道他是多么善于观察生活，创造出含义深刻而又新颖的字句啊！……”

有时，他走出自家的窑洞，绕过另一个山头，到鲁艺教员居住的东山住宅区去和新老朋友谈心，观察人，体验生活。这里是文艺家之家，茅盾发现每一个窑洞的布置装饰各各不同，反映出主人的独特的个性来。艺术家们凭最简陋的物质条件将他们的住所（窑洞）

布置得或清雅，或明艳，或雄壮，或奇特。每当夕阳在山，红霞照眼，这遥遥相对的东西两山（教员住宅区与美术工场区），便有一簇一簇的人儿，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逍遥散步，谈天游戏。艺术家的夫人们，用她们自制的小坐车推着孩子们慢慢地走，或是抱着挽着孩子聚在一堆谈天。她们也是一律的灰布制服，但是她们的“小天使们”却一个个打扮得新奇艳丽。

给他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象的，是夏季晚上的鲁艺。后来他追记道：“……月圆之夜，天空无半点云彩，仰视长空，万里深蓝，明星点点。这时候，‘鲁艺’大礼堂后边第一个院子里，正展开一幅诗意的画面，两列峨特式的石头建筑，巍然隔院对峙，这是学生的宿舍。……”

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的青年，席地而坐，有靠着一株树的，也有在游廊的石级上的，有人在低语谈心，有人在月光下看书。但也有人琮琮地弹着曼陀琳，有人在低声的和唱，如微风穿幽篁，悠然而又洒然，但渐渐和唱者多了，从宿舍里也传出了歌曲的旋律。

于是，突然男是音、女高音一齐迸发，曼陀琳以外又加进了小提琴和箫管，错落回旋，而终于大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来。……这些穿灰制服吃小米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感情淋漓，大气磅礴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在这段时间里，茅盾自己也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布制服，天天吃的小米饭或南瓜汤，只是由于他患眼病而常戴一副墨镜，与别人稍有不同。

除了在鲁艺讲课，茅盾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从事写作、参加文艺活动或开会。他每周至少从桥儿沟骑马进城两三次，去参加各种活动。开头由警卫员小任牵着马，后来他就独自进城了。在经过延河滩上的飞机场时，还能策马小跑几步。有时路过王家坪前的桃园，他会跳下马来桃树绿荫下的石凳上休息片刻，喝上一杯冽茶，买一棒红枣品尝，或者和在那里游憩的青年们交谈。

9月下旬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为民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张闻天向他介绍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经过后说：“文化工作委员会虽说是研究机构，但我们只要有这块合法的招牌，仍然可以做许多工作。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

来延安了，你原来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

这件事太突然了。茅盾心想去重庆工作，并无困难；两个孩子，当然留在延安；德止，愿意守着孩子还是跟着我，由她自己决定。只有一件事弄得很局促……

所谓“一件事”，是前几天，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里工作的张仲实兴冲冲地跑来告诉茅盾，他的党籍问题已经解决了，劝茅盾也在延安解决这个问题。茅盾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党提出。但现在突然要他去重庆工作，这事怎么办呢？

张闻天见他沉默不语，就对他说：“你和德止姐商量商量，我过两天再来听你的回音。”

茅盾立刻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张闻天又说：“德止姐如果放心不下孩子，也可以留下。”

“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茅盾妻子急忙说。

“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们都会照顾的。”张闻天又说，“董必武同志下个月要去重庆，你们可以和他同行，这样路上比较安全。”

现在行期尚未定，你们可以先搬到交际处去，在那里还要作些准备工作。”

茅盾送张闻天走出窑洞，向沟底慢慢走去的时候，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

张闻天停下了脚步。

茅盾郑重地说：“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你这个愿望很好，等我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后再答复你。”张闻天握着他的手说。

回到窑洞，警卫员小任迎上来：“首长，你是要到重庆去吗？”

茅盾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四个月的小同志说：“是的。小任，我想叫你同我一道去重庆，到那里我可以继续教你学文化。”

小任高兴地回答：“我也想去，等我请示一下警了团的首长。”结果警卫团的领导没有同意小任的要求，他只好两眼含着泪花跟茅盾夫妇告别。

孔德沚拿出刚缝制好的两双蓝色花格布凉鞋，递到他手里：“做的不好，你拿去穿吧。”

过了几天，茅盾辞别了周扬和鲁艺的一些朋友，搬到南门外交际处去了。他托张琴秋和张仲实照顾两个孩子，又再三叮嘱沈霞、沈霜应注意的事情。沈霞、沈霜在四个月里已过惯了集体生活，对即将离去的父母并不怎么留恋。茅盾的妻子却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抱着儿子啜泣起来。

张闻天来到交际处，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你的要求，认为你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你能理解。”

对于党中央作出的决定，茅盾当然是理解的。

临行前，他和妻子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茅盾说：“我把两个孩子交

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0日，茅盾和夫人由周扬等人陪同，从交际处步行出来，身后是一头毛驴，驮着他们简单的行李：一口书箱，一卷铺盖。他们缓步来到列队欢送的鲁艺学员们前面。

热烈的口号响起来了：“欢迎茅盾同志再来鲁艺！”

“欢迎茅盾同志再来延安！”

茅盾和妻子没有演讲，没有说话，只是一边挥手，一边擦泪，频频点头告别，向前走去，踏上了新的征程。

两年后，茅盾在一首诗中写道：

鱼龙曼衍夸韬略，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千红万紫斗春风。

三九、雾都来去

茅盾夫妇于1940年11月下旬来到山城重庆。这时，雾季已经来临，到处是湿漉漉的，许多天见不到一线阳光。

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一个个炸弹坑，成了一汪汪的水潭。雾蒙蒙中的一处处房屋，大都被弹片震得斑斑驳驳。然而这个战时陪都，比茅盾预料的更活跃，也更乌烟瘴气。

他们先是住在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两天后搬到城内枣子岚垭良庄，与沈钧儒、王炳南两空合租一幢小楼。他们夫妇住的是三楼。

在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对茅盾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他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徐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并给了茅盾一些《新华日报》及其他材料。

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徐伯昕、老舍、沙汀、叶以群等朋友先后爬上小阁楼，看望了他们夫妇。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派人约茅盾见面。张治中是他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的顶头上司，因此他想，约见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茅盾来到张治中官邸，张治中却和他拉家常。最使他料想不到的是张治中居然谈起了茅盾的母亲，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表示敬佩。茅盾心想，不知他怎么会了解我母亲的？后来，他才弄清是张治中读了孔另境六月份在报上发表的《一位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茅盾对张治中的看法改变了：如此看来，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的人。

几天后，从新疆传来盛世才诬陷杜重远“与逆精卫勾通”的消息。茅盾不胜惊异，他立即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量营救杜重远的办法。在向周恩来征询了意见后，茅盾起草了由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七人署名的一份千字电报，向盛世才婉转而又严正地申辩杜重远绝对不可能“通汪精卫”，他列举了杜重远抗日爱国的言行以及为人耿直磊落等事实，同时电文又给盛世才留下退路，说新疆地处边陲，许多证人证据不易查找核实，难免发生错误判断，希望能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他们愿为杜重远作保。

一个星期后，盛世才给他们一个一复电：“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狱。”茅盾拿着电报，气得两手打颤，满脸青紫，愤怒地吐出了两个字：“魔鬼！”

他常去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创作座谈会、讨论会，在会上发言。会后回到家里，他就坐在靠椅上闭目默想自己在会上的讲话，对演说稿、讲话提纲细细推敲、修改，然后伏案写成文章。长期以来他已养成了习惯，每一篇稿子都是自己抄写，凡在两页以上的，他都亲手用白线订起，以免遗失。

一天，徐伯昕通过各种办法，弄来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审查证”。他交给茅盾说：“现在就看你这个主编的了！”在茅盾提议下，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

叶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这样，叶以群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

时间一长，茅盾发现叶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的。

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他来通知。而党内的文件、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

二天，茅盾和叶以群商量复刊后的《文艺阵地》怎样“创新”。他提出，《文艺阵地》一定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叶以群完全赞同他这个主张。两个商量后决定向编委会提出，刊物增加“杂感”一栏，专登杂文。

1月17日晚饭后，沈钧儒从二楼走上三楼，神色紧张地告诉茅盾：“刚刚得到的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了冲突，顾祝同的七万军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包围并消灭了。”

听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捕。今天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唉，扑克来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茅盾惊愕得半张着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待定了定神，他才说：“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连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下。”

“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对付了。”

第二天，茅盾读到《新华日报》上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两天后，徐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茅盾心想：他们下令解散，我们又下令任命，真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呵！

1月20日上午，他应约匆匆乘车来到沙坪具，然后步行到红岩，攀上

八十八级石梯，经过黄桷树，沿右侧小路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向与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茅盾和大家的心里更亮了。

那天晚上，徐冰又来到茅盾的家里，对他说：“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不过，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也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复杂。”

“那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地从事斗争了。”茅盾说。

徐冰点了点头，继续说：“恩来同志指示，目前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太集中，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

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您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您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我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茅盾立即表示：“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儿女都留在延安了，现在只我和老伴两人，行动方便，去那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罢。”

2月下旬的一天，徐冰约茅盾去见周恩来副主席。他们驱车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请他们在小客厅坐下，然后对茅盾说：“雁冰，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很大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万一国内政局发生剧变，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

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茅盾神情专注地听着，默默记在心中。周恩来又说：“已经从重庆和桂林等地抽调一些人去了，其中有夏衍和范长江，韬奋先生也要去，他地这里不安全。也打算让叶以群去，所以《文艺阵地》恐怕办不下去了。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不久我们有一些人要撤回延安，还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孔大姐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茅盾说：“对于我的安排，我没有意见。德止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内，沈太太仍旧住在枣子岚垭，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的有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这两次你就在家中等通知罢。”

茅盾回到家里，妻子不安地问：“恩来找你有什么事？”

“他建议我们去香港。他让我问你，是去延安还是去香港？”

“我不去延安，我跟你去香港。亚男、阿桑在延安很安全，又有琴秋、仲实照顾，我去了反而没有事情可做。你在香港单身一人，生活上没有人料理，我怎么能放心？再说，如果我要守着两个孩子，去年就不到重庆来了。”

徐冰赞同他们夫妇都去香港。但是提出两人不能一道走，要茅盾先走，到了香港以后，他妻子再走。

随后，茅盾隐居到重庆郊外二十公里处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办的职

业教育社房子里。

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幽静。他想到二十天后才能走，如今无事可做，就又拿起笔来，一口气写出六篇“见闻录”：《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重庆雾”拾零》。

3月中旬以后，茅盾接到动身的通知：坐长途汽车赴桂林，再转乘飞机去香港。经过一个星期的昼行夜宿，在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两个职员的护送下抵达桂林。

在旅馆中，茅盾眺望城市明亮的灯火，诗绪萦绕胸怀，写成一首七绝：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欲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四十、《腐蚀》轰动香港

初到香港，茅盾一时找不到住房，暂住在一家旅馆里。两星期后，孔德沚也来了，看见丈夫还住在旅馆里，便抱怨说：“靠你这点稿费，没有资格长期住旅馆！”茅盾说，来到香港后天天忙得不可开交，要给范长江、夏衍办的《华商报》写文章，要接待朋友的来访，要准备筹办一文艺刊物……没有时间去找房子。

孔德沚能体谅丈夫的难处，第二天就到处奔波，傍晚时终于在坚尼地道找到一处房子。那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已有两家房客，一家是沈兹九和她的女儿，住在厢房；

另一家是《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住在正房里。他们租住的是“骑楼” 装上玻璃窗的阳台。

茅盾看到房间很小，只能放一床一桌，又要经过张铁生的房间，觉得很不方便。但是他听沈兹九说，她不久即去新加坡，厢房可以给他们住，而且这里环境幽静，也有利于写作，就同意搬来这里。

5月初，邹韬奋来请茅盾为即将复刊的《大众生活》写连载小说：“雁冰，你是编委，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这个任务是不成问题的。请你作为紧急任务写一部吧。”

“长篇小说哪里能说写就写得出来的。”茅盾感到为难。

“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星期只占四个页码，八千字左右。三千前你在《立报》的《言林》上，不就边写边登过一连载小说吗？”

“你是说《你往哪里跑》呀，正因为边写边登，所以小说写失败了。”

“我不这样认为，那是第一部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在帮助当时的青年认清抗战的持久性，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茅盾沉吟片刻，咬了咬牙说：“好罢，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扳了扳手指，答道：“给你一个星期，十三号交稿。我给你留四个页码，你给我四天的印刷时间。”

送走了客人，茅盾就坐在书桌前考虑起来：写什么好呢？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可是我不会写这种小说。不过国民党

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特务机关的内幕，倒也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加以训练后强迫他们当特务，如果不干，就被投入监狱甚至杀害。

特别是一些爱国少女，落进特务组织后，先被特务强奸，然后再叫她们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去搞“美人计”。她们是不允许结婚的；特务头子甚至无耻地告诉她们：“你们的战线就在床上。”

这些少女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她们不愿做特务，但又摆脱不了特务组织，内心受着痛苦的熬煎。有一少女曾找到重庆《新华日报》，诉说她经历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希望共产党向她伸出援助的手，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也有一些陷进去的青年偷偷与进步人士联系，希望得到帮助，使他们跳出火坑。邹韬奋就接待过这样的青年。

茅盾决定写这个题材。但他感到时间太紧迫了。要写长篇，须得事前做好准备，编写情节提要，列出人物表……，这样，一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于是他“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写边发表的要求。”虽然他过去从未写过日记，而且如他所说，“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

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决定选一女性，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我给这部小说取名《腐蚀》，以概括日记人的遭遇。”

为了吸引读者，他在书前加了一段小序，说这本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

日记的主人公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

日记的女主人赵惠明原是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女儿，在学校学习时，她曾追求光明和正义，参加过爱国学生活动，后来还曾奔赴抗日前线服务过。但后来由于受了国民党的诱骗，刚二十四的她，就陷入了一个特务组织，心灵受到腐蚀，过着罪恶的生活。但她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腐烂，她痛苦，好挣扎，渴望做一个好人，跳出人间地狱。虽然她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基础。但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教育了她，促使她悔改，寻找出路。

5月17日《大众生活》第一期出版了。茅盾的《腐蚀》立即吸引了香港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纷纷致函《大众生活》社，询问：《腐蚀》的作者怎样得到这一本日记？赵惠明现在在哪里？她做什么职业？……

收到邹韬奋转来的许多读者来信，茅盾很愉快。也增添了他写下去的信心。差不多每天一吃好晚饭，他就动手，一直写到夜深。白天有暇，也抓紧写几页。

这部以一个被腐蚀的女性——赵惠明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虽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却吸引了香港、南洋一带众多喜爱惊险、武打小说的读者，这是茅盾始料未及的。

《腐蚀》原来计划写到女主人公的爱人小昭牺牲就结束全书。可是，当小说连载到第十四期，即将结束时，邹韬奋来找茅盾，说他已看完结尾。他请茅盾考虑，能否再续写几节，给主人公一个光明前途？又说，《大众生活》每十期成一合订本，连载小说起讫最好能与合订本一致，免得给购买合订本的读者带来不便，希望《腐蚀》连载到第二十期。

茅盾对邹韬奋说：“我已在筹备文艺期刊《笔谈》的出版，原想结束《腐蚀》后将大部精力投入《笔谈》的创刊，被你一番游说，我只得续写下去啦。”

于是，茅盾在原来的结尾后面，续写了女主人公被派到某大学区的邮局里当邮检员的故事。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刚刚陷进特务罗网的女学生N，并且帮助她从火坑里逃了出去。赵惠明自己呢？茅盾在书中写了革命者对她期望：“生活不像我们意想的那样好，也不那么坏。只是自己去创造环境。……她一定能够创新的生活。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指引。……”

茅盾塑造的这个赵惠明，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典型形象。《腐蚀》这部革命现实主义杰作，使茅盾赢得了新的声誉。

四一、战时“大家庭”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飞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日军沿广九铁路进攻九龙新界，激烈的炸弹和枪炮声震颤着香港、九龙居民的心：战争爆发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三天前，茅盾出席了中共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召集的时局座谈会。他刚回到家，叶以群便跟踵来到。他对茅盾说：“廖承志认为一旦战争爆发，香港守不长，我们必须作撤离香港的准备，第一步先要隐藏起来，躲开敌人的耳目。你们现在的住所，敌人的情报机关恐怕早已知道，战争一起就不能再住。我已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临时避难的地方，到时候万一我们失去联系，你们就搬到那里去。”茅盾问在什么地方。叶以群说：“在山下轩尼诗道，那儿原来是一所舞蹈学校，在三层楼上。你现在如果有空，我领你去看看。”两人来到轩尼诗道，叶以群找到一位姓应的舞校老师，为二人作了介绍。

日机开始轰炸香港后，茅盾和妻子作了分工，他去找朋友联络和打听消息；妻子去银行取钱，采购生活用品。傍晚，两人拖着乏累的身子回到家里。他看到妻子已采购了足够两个月吃、用的物品，便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妻子：日本海空军袭击了珍珠港，美英已向日本宣战；香港与九龙之间的交通实行了严格控制，不让九龙的难民涌入香港。

他见到的朋友都在整理行装，劝他们也早点转移。妻子问他见到叶以群没有。“没有找到。他住在九龙，恐怕被困在那里了。”茅盾回答。

清晨，茅盾又被日机的轰炸声惊醒了。他想起存放在地下室里的那两藤篮书籍、信件和手稿。谁知到那里一看，竟不翼而飞。哪儿去了呢？他去问房东。房东二太太的侄女操着上海口音说：“你那藤篮里全是抗日的东西，日本人看见会连累别人的，我们把它烧掉了！”

茅盾想，这虽然可惜，但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女郎，不知是什么声份，跟她多说，徒费口舌。

正欲上楼，忽听这个女郎说：“你用的是假名！”茅盾想，她怎么知道我租房用的是假名？

立即怒声反问：“那么，你大概知道我的真名了？”

“你是郁达夫！”她得意洋洋地说。

“哈哈……”茅盾忍不住大笑。

“日本兵已经到了弥敦道，马上就会过海来，这边马上要扯白旗了。九龙方向杀了许多抗日分子呢。我看你们还是早点搬走。”房东二太太大概听了她侄女的警告，知道茅盾是抗日分子，害怕得很，急得催促他搬家，免得自己受牵累。茅盾解释说等一个朋友来了就搬走。

中午，他们夫妇刚收拾了饭碗，邹韬奋就来了。听说他还没有吃中饭，孔德沚连忙为他拿鸡蛋炒饭。邹韬奋边吃边告诉茅盾，他全家刚从九龙逃到香港，朋友们已为他找到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作为临时避难所。谈起这次突然发生的战争，他对茅盾说：“这样的事，我还是头一遭，一点经验也没有，现在全听别人的安排。”茅盾知道，这“别人”是指香港的中共组织。于是安慰老朋友说：“你就相信他们的安排吧，我也是听从他们的安排。”

邹韬奋走了以后，房东二太太来到了茅盾的房间，指着张铁生的房间问：“张先生到哪里去了？他房中那两架子的书怎么办？”茅盾告诉她，张铁生到九龙去看病了，那些书他自己会来处理的。房东却逼着他们立即搬走张铁生的书，声称如不搬走，就不让他们离开。

茅盾夫妇费了许多口舌，二太太才同意他去把张铁生找回来。夫妇俩当即提上一只装有细软和替换衣服的小皮箱，在暮色苍茫中离开家。茅盾对妻子说：“能找到张铁生，就一起回来搬东西，万一找不到，我们就不回去了。”他们来到轩尼诗道那所歇业的舞蹈学校，应老师指着茅盾给女房东介绍：“我这位朋友是九龙裕大纸张文具店的老板，他们刚从九龙逃难到这里。”由应老师作保，他们向女房东租下当作客房的舞厅。于是，这座四壁漆得花花绿绿、悬挂着不少纸做的葡萄枝藤的舞厅，就暂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晚上九点多，叶以群和戈宝权找来了。第二天，宋之的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还有文艺通讯社的高汾也住了进来。八个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家”。他们把“骑楼（阳台）作厨房，茅盾的妻子自告奋勇担任厨师。但是，这八个人全是空着手跑到这里来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呢？孔德沚决定回坚尼地道家里去拿。

看到妻子如此勇毅，茅盾很感动。在妻子走后不久，他担心二太太和那时时髦女郎会刁难她，就请叶以群前去接应。

中午了，两人还没有回来，茅盾的心提到了半空中，会不会出什么事？炮声时响时停，也使用权他替两人捏着一把汗。傍晚，他妻子安全回来了。几个人连忙围上去，帮她搬拿来的米、炭和罐头等东西。孔德沚对丈夫说：“德鸿，亏得你叫以群来，要不我就回不来了。”

原来她到了坚尼地道，二太太一见就吵着要她先搬走张铁生的两书架书籍，可是她跟本不知道这些书应该搬到哪里去，当然不能答应。她一再解释，二太太却不听，叫仆人锁上铁栅大门，派人守着，防备茅盾妻子溜走。恰在这时，叶以群赶到了。二人分工，由他去找挑夫来搬书，孔德沚去取米、炭等物品。叶以群雇来了三个挑夫，搬走了张铁生的书籍。

茅盾的妻子也理好了应取的东西，跟自己的女仆算清了工钱，又将一些不带走的东西都给了她。正要去雇挑夫，二太太已叫来了两个挑夫。她的侄女用上海话要孔德沚留下地址，说是日本人来查问，她们好回话。孔德沚想了一下说一个地址。二太太和侄女还把挑夫拉到一旁叽咕了好一阵。孔德沚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心中却想好了对策。她带领挑夫下了山，直奔已经搬走的金仲华家。那是一所大夏，他们爬上四楼，见金仲华家的大门敞开着，

门内人声嘈杂，她也不管，叫挑夫把东西挑进大门放下，立即付了工钱。两人挑夫满意而去。这时有人走来问她是住哪一间房的。她故作惊讶地说是找错了门牌，并且请那人代为照看一下东西，转身下楼另找了挑夫，就这样平安地取回了东西。

大家都称赞她随机应变，真有本领。茅盾也笑着对妻子说：“你把‘二太太’的妙计全给破坏了！哈哈哈，有趣！妙极！”

孔德沚这次“冒险”的收获很大，她不仅“抢救”出了丈夫和她的衣物，取来了她早些天采购的大米和食品，还给茅盾拿来了一本《元曲选》。她给大家安排了每天的食谱：

早点，茶牛奶、饼干砚、面包；午饭、晚饭，大米饭、香肠、咸鱼、罐头牛肉。茅盾满意地说：

“真不错！只是少了新鲜蔬菜。”“你这个敌人炮火下的难了，别不知足啦！”妻子用嘲讽的口吻说。

从这以后，他们就吃、睡在这座舞厅光滑的地板上，茅盾一边读《元曲选》，一边提防着日本兵的炮弹。

12月24日下午3时，一颗炮弹在相隔他们住处不远的“广生行”爆炸，燃起了大火。

茅盾为了弄清情况，不怕炮声隆隆作响，不顾妻子的阻拦，大胆地跑上屋顶的平台。

他终于看清了“广生行”和他们住的大厦中间隔着一小块空地，大火不会延烧过来。还发现日炮兵的目标不是这一条街，而是山腰的“高等华人”住宅区，就是他们原来住的那一带。击中“广生行”的炮弹可能是流弹。他把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了妻子，安慰她不必害怕。接着把箱子搬到妻子的头前，靠着她躺下，轻声说：“要是有一个炮弹穿窗进来，那就无话可说，但这种‘头奖’到底是可有而不一定有的。要预防的还是弹片，我们这只箱子挡挡弹片是不成问题的。”

一天茅盾正说话，忽然眼前一亮，顾时满屋红光。他本能地跳了起来，一声“糟糕”还没喊出口，响起轰然的爆炸声。他拉着妻子跳出门外，下意识地挤进楼梯上的人堆里。

第二天一早，他和叶以群一起爬上屋顶平台，看到昨晚那颗炮弹落在屋顶，把三四寸厚的钢筋水泥屋顶炸开了个小天窗。他们和大家商量决定：立即离开这里，搬到市中心的中环去。

四二、与日兵周旋

在高粉的同事阿陈和小林的帮助下，茅盾一行八人离开了舞校，将他们的战时“大家庭”搬进香港中环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旅馆里的房客很少，显得空洞洞的。他们都挑选了二楼的房间，认为上面还有四层钢筋水泥的楼板，而且背向九龙，不必害怕日本军的炸弹和炮弹。

“亏得昨晚上有那个小炮弹掉在屋顶上，倒把我们轰到这好地方来了。”茅盾幽默地说。戈宝权则担忧地问：“可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消遣呵？”茅盾

惋惜地说：“我把那本《元曲选》丢在跳舞学校了，要不然还好解释闷。”

叶以群建议小高去租一副麻将牌给大家玩玩。

这一晚，茅盾他们在席思上睡了个好觉。清晨醒来，四周异常寂静。一会儿，从街上传来清脆的木屐声。接着又听到几声吆喝声。

叶以群扣着衣扣走到茅盾身边，轻专声说：“刚才在马路上吆喝人的，好像是日本人！”

“哦”茅盾一怔：难道不知不觉中，香港就换了主人么？

茅盾和叶以群蹇到“骑楼”外往下窥看，果然一个日本兵正持枪站在“骑楼”下面。

他想，昨晚阿陈说海军码头的英军和印军已经放下武器，但是香港政府投降的谈判还在继续，想不到只一夜日军就占领了香港！这实在太突然了。他又哪里想得到，香港政府在12月25日这个欧美人的盛大节日圣诞节，会在扯旗山上扯起了白旗，仅仅经过十八天，就投降了。

早饭后，阿陈来关照他们：“静坐房中，少抛头露面。我会说日本话，有什么事我来对付。”茅盾等人都认为这话有理，可不要他们寺庙里的和尚那样“静坐”，却感到为难。

于是，他们推起了麻将。又因为旅馆里不供应水，大家就轮流着到街上旋开的消防龙头处“抢水”。

两天来，茅盾从楼窗里看见日本人和汉奸开着“宣传列车”，吹吹打打在街上游行，一些“市民”拿着小纸旗，零零落地喊着什么“欢迎皇军”的口号。还看见汉奸们在对街的在同酒家开“庆祝会”，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进进出出。他想，这大概是准备招待“皇军”的。

唉，无耻呵！

叶以群从外面探听消息回来说，湾仔一带十分混乱，日本兵和伪军污辱了不少良家妇女。而最使人们害怕的谣传是：日本侵略军将于元旦举行战胜仪式，从元旦起，“放假”三天，准许官兵自由行动。

“哎呀，这可怎么好呀？”茅盾妻子说，“你们快想办法，先把小高藏起来。”

这时，阿陈走来，对高汾说：“小高，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安全的地方。”他通知大家，日军要征用旅馆，但他正设法免征；如果不成功，全部旅客就得搬走。不过他又答应茅盾等人，若是找不到地方住，就作为他们旅馆的职员和职员家属，混过一两天再说。

他去拿来几套旅馆职员的制服，让他们在必要时换上。

经过阿陈与日军交涉，日军征用了旅馆的一半房间。茅盾等人住的房间恰恰在外。

但他们怕日兵来找麻烦，就在大房间的客厅里摆开一桌麻将牌，戈宝权穿上旅馆职员的制服，叶以群在旁观战，茅盾夫妇和宋之的夫妇四人成为一局。

在哗哗的麻将声中，茅盾说：“要是日本兵闯进来，大家要镇定，我们不妨‘欢迎’他们加入‘战团’。日本人见了麻将就舍不得走开，麻将俱乐部在日本到处都有的。”宋之的点头赞成。茅盾又指着叶以群向大家建议：“以群的日本话很好，我们推他做‘对敌工作者’，授以全权，相机应付，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叶以群也笑着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就玩起了麻将

牌。

果然不出所料，才打了三圈多，一高一矮的两个日本兵闯了进来，站在麻将桌旁叽叽咕咕，不肯走开。

茅盾看这两个日本兵满口酒气喷人，都有六七分酒意，究竟不会依仗酒兴来一次“宣扬王道”呢？他实在有点担心。但他仍然按照事先所约定的，和另三位牌友自顾自地认真打牌。

叶以群也用安闲的口气向他俩招呼：“懂得么？也很喜欢吗？”

两个日本兵听见叶以群会说日语，顿时笑逐颜开，说他们喜欢，可是在本国时没有玩过；他们是乡下人，乡村地方还不大通行这种玩艺儿。

叶以群翻译给茅盾、宋之的等人听。茅盾也和他俩开玩笑道：“我们来做老师吧，这玩艺学起来不太难。”他让叶以群翻译给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听了傻乎乎地笑着，坐在牌桌旁看起来。其实这两个日本兵是懂得麻将牌的。他们一边看一边问叶以群牌是哪里来的，还问了其他的一些话。叶以群有时回答，有时装作听不懂，支吾其词应付着。

坐在宋之的妻子斜对面的那个高个子日本兵，老拿醉眼朝她看，她感到如坐针毡，待一圈牌打完，便借口照顾小孩，起身走开。牌局暂停。高个子日本兵问：“为什么不玩了？”

叶以群说她不会打。两个日本兵叽咕了几句，终于走出去了。

“好危险哪！”茅盾妻子轻声喊道。

“刚才那个不肯走的日本兵不得不走，是因为另一个警告他，点名的时间快到了，要看打牌回头再来。”叶以群说。

茅盾感一打不下去吧，可能招来更多的日本兵，会出麻烦；不打下去，要是两人再来，他们会借故生事，也要弄出麻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之的妻子说：“和豺狼同居，终究不能够安逸的，最好趁早搬家。”宋之的也说：“对，这是一了百了。”

大家计议了一番，决定化整为零，分头出发，各找地方，谁先找到谁先搬，分散后仍要保持联系。

1941年除夕那天，他们都搬出去了。茅盾在叶以群的照料下，移住到一家挂着“大同旅馆”招牌的三等小旅馆里。虽然这里的设备差，但却因其小而不为日军注意。他们的房间外面是“骑楼”。茅盾挑起遮阳的帆布往外看：月明如昼，海水犹如白银闪烁，没有轮渡，没有舢板，没有……；远处有两三个油池燃起冲天的烟柱，纯黑色，有时转为殷红，却看不见火焰；“骑楼”下面是干诺道，平时很热闹，现在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影。一排短的铁丝网在地上描出淡淡的黑影。

“香港完了”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叹息着说了这么一句话。听声音，茅盾知道他是旅馆中那个来乍上海虹口的茶房。他转过脸，看见一双阴凄凄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遮阳的灰色帆布。

“几时可以回上海？”

那茶房自言自语的声音，却使茅盾听了毛骨悚然。

“你想回上海么？上海也不会比香港好些。”

茶房讷讷地说：“唉，先生，全是战争敲破了我的饭碗。我在虹口有多好！到了香港，失业一年多，才托人介绍到家旅馆做茶房，哪知道又碰上触霉头个打仗。前几天老板已经不管我们饭了，幸好今天你们来了，我们恳求，老板才答应把你们预付的二十元房钱让我们买米。可是二十元钱能吃几天

呢？我们同伴有五个哪，只好一天两顿粥。”

“过一个时期旅馆还是要开的。”茅盾想不出安慰他的话，只能这样说。

“香港死了，活不转来了。”茶房颓丧地喃喃自语，摇着头，趿着木屐走出“骑楼”。

看着他的身影，茅盾心里很难过。想不到战争才二十多天，这家旅馆老板连茶房的伙食也不管了！不过他又回过来想：那旅馆老板或许也是可怜的吧？在战争前，这样的旅馆本来就靠着一些熟客维持开销，老板未必有多大的资本。停业三个星期，他自然要叫苦连天了。

茅盾夫妇在这个“大同旅馆”住到第四天，叶以群便为他们在西环找到了一处安全的住房。那个上海茶房在算帐时可怜地说：“先生，你们怎么走呢？可是我们招呼不周到？”

我们不敢怠慢你们，只是日本人把香港弄死了。先生和太太还是住在我们这里吧，别的旅馆也一样，换来换去还不是半斤八两？”

面对这热心的茶房，茅盾很感动，但是爱莫能助。他们预付了二十元房钱，只住了四天，照讲还结余很多，应找还。但是，当他看见那茶房递上帐单的手在发抖时，他想起这几天看到茶房们每天吃两餐粥，下饭的只是一小碗咸菜。于是他拿起帐单看了一眼，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五元票，连同帐单一起交给那个茶房。“都给你们做小账吧。”茅盾说过，转身就往大门外走，他感到一阵酸楚正涌上鼻子。

“谢谢先生，太太！”那茶房感激地说。

茅盾似乎觉得对不住这旅馆中正忍受饥饿威胁的茶房。他对妻子说：“我觉得很抱歉，我们不能在大同旅馆多住几天。这次以群为我们租的房子，二十五元一月，但是恐怕也不会住满，说不定也只住四五天，我们就要离开香港。”

四三、千里跋涉脱险

还是住在“大同旅馆”的时候，叶以群就告诉茅盾：党组织正在为文化人布置三条撤离香港的路线，其中一条最安全却花时间较多的，是九龙取道东江转内地，不过先得偷渡到九龙。

1月8日下午，叶以群来悄悄通知他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还得换装，打扮成小商人模样。于是，茅盾让妻子上街买了两套香港人称为“唐装”的黑布短衫裤。

他们把多余的五大件行李放在大中华旅社的阿陈那里，只带了两个小包袱和一只小藤篮，里面是一床毯子，几件内衣、一个热水瓶和电筒等零星用品，还是一本伪装用的《新旧约全书》。

次日上午，戈宝权带他们到东环贫民区的一栋房子里。下午五时，他们换上了“唐装”，拿着包袱，夹在难民当中，沿着皇后大道来到铜锣湾，在暮色苍茫中登上一艘画航似的大船。

在中舱里，他们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邹韬奋、胡绳、于伶等。茅盾见邹韬奋摘掉了眼镜，换了一身浅色法兰绒“唐装”。

邹韬奋见到了孔德沚也来了，惊异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

“全靠了雁冰，不然我还来不成呢。”

茅盾颌首微笑。三天前，当有人来通知他，让他先撤离而他妻子随后再走时，他坚持要和妻子一同走。他认为自己迟走早走没有关系，但是把妻子一人留在香港，他一定不能安心；

妻子将因等待他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食不宁。党组织后来同意了她的意见。

邹韬奋于是想起自己的妻子粹真和孩子，低声对茅盾说：“粹真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是一切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于这种事，我毫无经验呀。我这裤管，你看得出来？一支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真缝的。”

晚饭后，负责组织文化人从香港脱险的连贯走进中舱，对大家说：“今夜就在船上休息，明天一早过海到九龙，那边自有人招呼。沿路都有布置，可以保证大家的平安。”

黎明前，天色黑黝黝。茅盾夫妇挽着包袱、提着小藤篮，随着其他人摸黑从大船移到三四只小艇中的一只上。东方泛白，大雾笼罩海面。几只小艇首尾相衔，轻轻划向九龙。

晓风忽忽，从船头灌进舱中。他俩紧偎在一起，仍然不免瑟缩。

不久，抵达九龙红磡。他们每人向守在渡口的“烂仔”（流氓）交了一元“保护费”，提着包袱跟了“向导”走进市区。他俩和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七八人被领进一栋很讲究的房子住下。茅盾和妻子商议，今天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长征”。

睡梦中，茅盾听见一片杂乱的人声，睁眼一看，人们在昏黄的煤油灯光里走来走去。

看看表，才四点钟。咦，妻子呢？问叶以群，听说在厨房里帮忙弄早饭，他才放心地整理行装，不到五分钟，就整理好了。他的打扮很简单，只是把新买的黑布短衫往身上一套就行了。

他的卧具只有一条毛毯。吃早饭时，妻子对他说：“你吃得饱一点，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午饭呢。”临出发时，“向导”为他俩找来了挑夫，帮他们挑行李。

出发了，他们一行几十个“难民”穿过市区街道，汇入沿着青山道向深圳方向流去的难民大队。使茅盾感到惊异的是，这万把人的洪流竟那么肃静，几乎连脚步声也不听见。好像曾有谁下了命令，一律穿的是橡胶底跑鞋；而且又好像是谁下的命令，不分男女，一律都是短衫裤的“唐装”。

大约十分钟，人流来到荃湾。茅盾他们却在“向导”带领下，离开了人流，走上通往元朗的小路。敌人指定的难民疏散路线是经深圳去广州。而他们则要先到宝安，再经东江游击区去内地。

爬上山坡，又翻过一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簇木寮，住着五六户人家。“向导”领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平屋。一行人才坐下，就有四五个妇女送进来一大桶茶水和十来只大粗碗。

茅盾想，这显然是预先准备好的。在这里，茅盾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红米饭。他感到很新鲜，加上饥肠辘辘，比平时多吃了一大碗。

午饭后，他们汗流浹背地爬过一座高山。傍晚进入“绿林好汉”“江大哥”的势力范围，晚上则宿在“山大王”“王大哥”防区的村子里。当时，

东江游击纵队和曾生司令员在那一带有巨大的威望；听到游击纵队司令部要求他们在文化人队伍通过他们辖区时予以保护这些草莽英雄都乐于从命，派人带路、护送和接待吃、住。

在“王大哥”大厅中休息的时候，茅盾妻子拿出万金油，给扭伤了脚筋的邹韬奋搽涂，一边问：“今天我们走了多少路？”

“大概四五十里吧，”茅盾随口回答。

“不，足有七十里呢！”叶以群纠正道。

“呀，有七十里么？”茅盾的妻子喊了一声。

茅盾的眼睛也因惊讶而发亮了：妻子居然迈着一双解放脚，走了七十里，而且又是翻过了两座山！而自己也是头一次步行这么长的路。他的脚底还没有打泡，只是小腿肚在隐隐地胀痛。坐的时间一长，腿脚发麻，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不料两腿竟不听使唤，禁不住唤了一声。心想，我到底是不中用的，如果今天再要走，怕是一定要掉队。明天还要走多少路，此刻也不知道。但他终于挣扎着起来，慢慢地踱着。晚饭虽有白米饭，菜却只有淡而无味的萝卜汤。茅盾和妻子等人胡乱地装饱了肚子，就睡在大厅右厢走廊的地上。身上铺的是稻草，但泥地上透着冷气，他俩一夜都没睡好。

这支近百人的文化人队伍，在“王大哥”的保护下穿过元朗镇，又乘平底大船渡到宝安县。

这里是沦陷区，三个日本兵站在岸上检查他们的护照。因为是“王大哥”与元朗镇伪组织打交道办来的，护照没有问题。

茅盾几个人经过这“鬼门关”时，看见前面的人已经走远，卢停下来等一等后来的人。

“快走！看什么？快走”带队的“向导”催促他们。

三个日本兵大声咆哮着，茅盾他们猜想大概是骂他们为什么不走。这时，后面的几个人神色仓皇地逃奔过来：“快走呵，日本小鬼子要打人了！”

茅盾急忙拉上妻子快跑。收割过的稻田里满是稻茬，时时绊脚，他们跌倒了，爬起来再跑。这一阵跑，可把他们考验倒了，一步一步落后，几乎看不见前面的队伍。穿过稻田，转进村中的石板路，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路旁一间破屋门口的石阶上坐下，大口喘着气。

昨天他们空着手，走走歇歇，一天走下来并不感到太累。今天拿了衣包，又是一口气跑步，不过十里路，他们就吃不消了。

一个“押阵”的游击队员过来催他们快动身。茅盾和妻子各自去提一个衣包，感到异常沉重。妻子对他说：“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困难的路程呢，反正是要丢的，不如今天丢了罢。”

““好吧。”他也下了决心，只拿起那个装有毛毯和替换衣服的轻包袱，把那只重的丢了。他妻子提着那个装日用零星物品的小藤篮，两人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押阵”的游击队员在后面唤他们，指着地上的衣包喊着什么。茅盾说：“不要了，我们拿不动。”那人又哇啦哇啦嚷着，但他俩听不懂，只顾去追前面的人。可是等他俩赶到住宿地时，却发现了他们丢掉的那只重包袱。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押阵”的游击队员会不辞劳苦替他们拿回来。

天亮以后，伪乡长带来四个日本兵，要他们排好队，由日本兵点验了人数，押着他们快步走了七里路。来到一个小山脚下，押解的日本兵向山头眺望哨中的日本兵喊了一阵话，才放他们自由地前进。

茅盾夫妇跟着叶以群、戈宝权，随着大队匆匆通过一片稻田，爬上林木茂密的山坡。

在一平坦的地方，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向导”告诉他们：“爬过海林坳，就到目的地了。”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个个笑颜开，刚才“急行军”的紧张、疲倦全消失了。

黄昏扣，他们的队伍终于来到东江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白石龙镇。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把茅盾夫妇、邹韬奋、胡绳、于伶、戈宝权、叶以群等十多人请到司令部里。

曾生司令员说：“实在抱歉，弄不以好菜，只有用狗肉来为诸位接风了！”

一大碗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狗肉端上来了。大家捧起碗大口嚼了起来。

“哈，这狗肉比山珍海味还要香哩！你们要是不说明，我会当成羊肉呢。”茅盾对曾生、林平两位游击队首长说。

在白石龙，他们休整了一个多星期。茅盾洗了澡，刮了脸，但为了增强化装的效果，他没有把胡子剃光，留下了唇疵，经后就一直留了下来。他穿上游击队送的新棉袄，心身都感到回到亲人中的温暖。

他们的目的地是惠阳，必须继续前进。休整了几天，茅盾就向曾生司令员、林平政委提出了“继续赶路”的要求。于是，1月20日下午三时，他们又出发了。这是一个五人小组：

除茅盾夫妇外，还有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两名带枪护送的游击队员、两个挑夫，一行共九人。

他们越过广九铁路，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茅盾第一次黑夜走山路，只觉得脚下忽高忽低，仿佛在上坡下坡。有一段下坡路，他听到脚下悉悉唰唰，全是细沙子，滑得很。

这使他想起邹韬奋扭伤脚筋的情形，便和妻子前后拉着不敢放开步子走。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反正还不是‘后的追兵’；走急了扭伤脚筋或者跌伤，那就简直不能动弹，不是更糟么？”他轻声对妻子说。

走了不知多少时候，忽听走在前面的胡仲持说：“有一条河，小心呀！”

护送的游击队员说这是石纪河，河水很浅。他们穿着鞋或袜子涉水到了对岸。半夜时，抵达了宿营地。吃过煮番薯，负责接应的人领他们到了山上的“寮”里。对他们说：“睡在山上比较安全。”

但是两名护送的游击队员却不肯睡在“寮”里，其中的矮个子指着“寮”外大树底下说：“我们就睡在那里！”

茅盾想这是要给我们放哨呵！忙叫妻子拿出毛毯，可是两个游击队员却不肯接受，矮个子说：“用不着，我们是惯了的。大雨底下，我们也照样睡觉做梦呢！”

第二天黄昏时，九人小队又上路了。走了五六十里，他们接近了预定住宿的村子，却发现这里有敌情，不能住宿。于是匆匆向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转移。不料到了那里，敌人忽然逼近过来。他们只好得再回到原来的村子，但是不敢进村。两位游击队员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山上，稀稀落落的几棵大松树说：“就在这里睡觉罢！”

“在露天么？”茅盾吃惊地问。

回答是肯定的。他们五个人来到一棵大松树上，背靠背坐成一堆。茅盾让妻子拿毛毯来蒙在头上，偷偷擦了一根火柴，吸起手卷的土烟。

天亮后，他们才进村见到了当地的游击队长——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他向茅盾等人表示歉意，并且说：昨天下千，淡水、龙岗的敌人突然沿公路两侧蠢动，目的不明，而他们的村子离淡水——龙岗公路只十来里，不得不警惕。

“今晚上他们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长说，“可是不用害怕，敌人照例是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的。原来护他们的人和挑夫已回去了，我派一个小队长带领六个队员护送你们过封锁线。他们吃过饭，好好睡一觉。”

这天晚上，茅盾夫妇等五人在六支长枪、一支手枪的护送下，和两个挑夫一起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来到东江游击纵队控制的一个小镇。第二天，他买了二十斤猪肉，慰劳完成护送任务的七位战士和两位挑夫。

在这个小镇上，他们遇见了张友渔夫妇。三天后再次出发时，张友渔夫妇就成了他们的新伙伴。

游击队派了三个挂盒子枪的战士和四个挑夫，把他们护送到一个叫洲田的大村子。

在一幢城堡式的大房子里，东江纵队的一位大队长告诉他们：刚刚得到消息，敌人攻陷博罗，有进攻惠阳的样子，他们得住在村里，看情况再决定行止。临走又叮嘱说：“这里距惠阳虽然还有七里，离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却很近，村里的情形也比较复杂，他们不要随便走动。”

谁知他们这一等，竟等了半个月。因为五天后，敌人占领了惠阳，掠夺了物资后再撤出，已是旧历年底。

最后一天的行军，是在白天。由于后半段路程要进入国民党的控制区，武装的护卫改成了不带武器的向导，茅盾等人也乔装成逃难的商人。

天色阴沉，冷风飒飒。下午三点多钟飘起了毛毛细雨；黄错时分，雨下大了。一阵阵寒风苦雨又一次考验茅盾等几个急行军的文人。叶以群反动派一把脸上的雨水，对茅盾打趣说：

“茅公，这风雨奏乐伴君行，趣味如何？”

“别有风味呵！”茅盾扬起挑着雨珠的浓眉头也笑着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思背古董！真是苦中行乐。”孔德沚低志打断了丈夫的话。

雨越下越大，向导带领他们跑步前进，不久，来到一个小镇——三栋，走进一家杂货铺里歇脚。茅盾看到自己和朋友们身上的棉袄都已淋湿，就与向导商量：“是否就在这进而宿夜？”

向导不同意。他说：“事先没有布置，这镇上驻扎着保安队，怕不安全。可是继续赶路也危险，下一段有三十里，要通过敌人刚刚撤出的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不带武器在夜间赶路，太危险了。”

这时，杂货铺老板替他们出了个主意：花钱请驻军连长派几个保安队员当“保镖”。

并说他愿意帮他们去办交涉。茅盾和几个人商量后同意了。杂货铺老板去那里一谈就成。

于是他们凑了一百五十元雇了两个国民党保安队员，“保护”他们向惠阳奔去。

饭后，他们原想买几盏灯笼，可是商店早已打烊，未能买到。但茅盾和张友渔的妻子还各带着一支电筒，他们就靠着这两支电筒，冒着风雨在黑夜里赶路。

三小时后，雨渐渐小了。妻子从后面问茅盾：“离惠阳不远了吧？”

“估摸着快到了。”

茅盾眼睛近视，又有眼病，这时当然看不清路，只能一脚离、一脚低地走着，凭感觉他知道软的是烂泥，硬的是石块。有时一脚踏进水潭，“砰”的一声，大腿上全是水，他也不管，马上拔出脚再走。这样摸黑走着，当他正觉得似乎走在石桥上时，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身后的妻子不见了。他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

德止掉下河里去了！”

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他吓呆了……

闻声奔来的人也都慌了，不知怎么办。张友渔的妻子甚至哭了起来。

这时，桥下却传来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

两支电筒循声照去，看见了！她下地站在桥下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

“受伤没有？”茅盾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赶快设法拉我上去呀！”

靠了两位“保镖”的帮忙，终于把她救了上来。

在惠阳城内一家大旅馆里，孔德沚换去湿衣，借到一只小泥炉，生上火，一边烘烤衣服，一边叙述她“失足”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我赶快爬起来，就听到你们在岸上喊。你们以为我死了，我就喊：

没有死，没有死……”

在床上发烧的胡仲持说：“真是奇迹，竟没有一点伤，还坚持走到了惠阳！”

“那时我们都吓慌了。要是伤了，怎么办呢？”廖沫沙说。

“幸而冬天水浅，不然，两丈深的水……”叶以群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死了，或伤了，那你们就麻烦了。”孔德沚笑着说。

大家也都笑了。

茅盾对妻子的勇毅深为钦佩，他松了一口气说：“三栋出发前，我要买灯笼，好像是有预感似的。不过，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茅公，我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既惊险又富有传奇色彩，你要是写在小说里，那有多精彩！”叶以群冒出这么一句。

茅盾微笑不语，心里说：“我一生中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要写的，要写的……”

四四、笔耕桂林

1942年3月9日，从桂林的一家旅馆门外走进两个客人，身上都穿着

既肮脏又肥大的蓝布棉袄，男的左手提着个包袱，右手拎着一只热水瓶；女的一手挽着个包袱，另一手提着只小藤篮。两人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男，孙家禄；女，孙陈氏。”

茶房看着这两个落魄的客人，露出鄙夷的目乐。他怎么会知道：这两位旅客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和夫人呢。

那时，他俩的全部家当是：一条俄国毛毯，几件替换的内衣，一些梳洗用品，一本《新旧约全书》，一支自来水笔。经过三个月的难民生活，他们的钱袋里，所剩已寥寥无几。

“钱袋快掏空了，怎么办？”妻子问丈夫。

“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重做冯妇，卖文为生。”茅盾无可奈何地说。

“这旅馆住不起，你快找人帮忙租一间房吧。”妻子提出了当务之急。

过了一天，叶以群介绍茅盾和邵荃麟认识，邵荃麟就把自己的一间厨房让给了他们。

叶以群说，他接到党的指示，要去重庆，并告诉他邵荃麟是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负责人。

于是茅盾夫妇来到桂林市郊丽泽门外丽君路南一卷，搬进邵荃麟腾出的那间厨房。

这间房很小，八九个平方米，只能放一只双人床和一张桌子。

田汉、欧阳予倩、王鲁彦、孟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从香港脱险的夏衍、金仲华等朋友闻讯都来看望茅盾。夏衍问他今后有何打算，他回答：“我想好好休整一下。”

首先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所以打算写点东西。”

茅盾发现桂林并不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短短的一条桂西路，就有几十家书店。

邵荃麟对他说，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店、出版社，就有近七十家，虽然有一些是“皮包书店”。

“皮包书店，怎样讲？”茅盾不理解地问。

“这样的书店大半是贩卖文具起家，他们除了囤积贩运纸张文具和上海出版的书籍，也做翻版盗版的生意，其中少数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书籍，获利比大书店还多呢。”邵荃麟答道。

不久，许多出版商打听到茅盾的住址，纷纷打上门拉稿。一些人了解到他手头拮据，主动提出可以预支稿费，而且书在出版之前，某些章节还可以先在刊物上发表。这些条件使他动心了，可是他只答应了可靠的书店，并未一概同意。

以往，茅盾每到一地，总是先为报刊赶写短论和杂文。这次他却一反往常，婉辞了各家报刊的约稿，先写长篇。他是这样考虑的：写短论的杂文，是向敌人掷投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匆匆忙忙上阵，既不能使“投枪”通过图书检查老爷的关口，反倒授人以口实。还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局势再写不迟。可是德止在等米下锅，那就先写长的吧。

香港战争和东江脱险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

茅盾有眼病，晚上无法执笔，只能利用白天。房中只有一张方桌，夫妻在房口做饭，半张桌子放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他用另一半桌子，歪坐在竹椅上进行创作。

5月1日，描写香港沦陷前后市民生活和艰难遭遇的《劫后拾遗》脱稿了。这部中篇小说写法别致，近乎特写，纪实性很强，由桂林学艺出版社自动，被称为是有“文献价值”的作品。

在抗战前夕，茅盾就打算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长篇小说，因为抗战爆发而作罢。如今他又开始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表现“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他设计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是认不清方向。当革命浪涛袭来时，这些人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惘，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

写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他在桂林是客人，许多社会活动可以不参加，能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写作。写作的条件很差，不得不在他称之为“两部鼓吹”的特殊环境中爬格子。

什么是“两部鼓吹”？茅盾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天井（院子）。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天井里非常熱鬧。樓上經常是兩三位太太，有時亦夾着個把先生，倚欄而縱談賭經，樓下則是三四位女傭在洗衣弄菜的同時，勻換着各家的新聞，雜以詬誶，樓上樓下，交相應和；因為樓上的是站着發議論，而樓下的是坐着罵山門，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而戲稱之為‘两部鼓吹’。”

他住的小房里没有电灯，点了一盏桐油灯照明。夜晚，妻子在昏黄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他唯有卧床闭目构思，打腹稿、推敲字句。白天的八九个钟点，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

然而，“两部鼓吹”却常干扰他的运思作文。有一天，他正写着，“两部鼓吹”又开场了，嘻笑谩骂，撕打哭闹，扰得他实在忍无可忍，便把笔一扔，冲到天井里，对“立部伎”中的宋云彬大声吼道：“老宋，你一天到晚可以打麻将、讲赌经，我可是要靠做文章吃饭的！你要讲，好不好回到房……房里去……去讲！”

看他气得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宋云彬知道茅盾是真的发火了，连忙说：“好，好，不讲了，不讲了！”

“坐部伎”的几个女傭也吓得互相吐舌眨眼，不再高声骂街。

孔德沚低声对丈夫说：“你平时忍着性子不声响，一发火，倒蛮灵光哩！”

这以后有六七天，“两部鼓吹”停止“演出”，使茅盾得以安心致志地写一百多项原稿纸。

不久，就完成了这部后来题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长篇小说。

8月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妻子问他：“熊佛西先生找你去做什么呀？”

“嗨，他胃口大得很，雄心勃勃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叫《文学创作》。要柳亚子、田汉和我帮忙，给他写文章，还派定我每期至少写一篇小说。”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他有那么大的劲头，应该支持他。”

茅盾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文学期刊，要比自己上阵更为有利，

也更有效。而且，这本刊物有可能在西南部站住脚跟。于是，他改变原来的打算，提笔再写短篇小说。

可是，现实性很强的题材无法写，于是他想了个主意：选择圣经中的一则故事来写，用它来隐射现实。于是就写了《耶稣之死》。写到叛徒犹大出卖了耶稣，要来抓拿耶稣时，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捉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倒这样鬼鬼祟祟来干？现在是在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这“黑暗掌权了！”影射的便是国民党反动派掌了权。茅盾正是要借喻圣经中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斗争，诅咒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熊佛西读了这篇《耶稣之死》，看出了茅盾的创作意图，担心通不过国民党图书期刊检查官的审查。岂料它竟顺利逃过了“关卡”。

在熊佛西的怂恿下，茅盾又用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写了《参孙和复仇》，预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没落。

对这两篇借用圣经故事改写的作品，茅盾自己很喜欢。他后来说：

“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茅盾在桂林写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是《列那和吉地》。他在这期间还写了大量的创作艺术技巧短论、书评及杂文。九个月“笔耕”的收获竟有五十多万字，真是惊人！

他还和柳亚子、陈此生等人论史作诗。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和对延安亲人、同志的思念。其中一首七律《无题》写道：

偶遣吟兴到三秋，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剑芒山老岂惠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拜日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

四五、蒋介石发出邀请之后

茅盾从香港来到桂林不久，听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给广西当局下了一道电令：中央对由港归来文化人将有所借重，广西不得为他们安排工作。他冷笑道：“这一手分明是想扼断我们的生机，逼我们就范！但蛇对我不起作用，我是靠卖文为生的，并不需要别人安排什么工作。说什么‘将有所借重’，我倒要看看它是什么货色！”

不久，这所谓的“将有所借重”便真相大白。1942年5月初，公开身份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文化特务的刘百闵由重庆抵达桂林。一天，他邀茅盾到乐群社共进午餐，客气地说：“沈先生此次从香港脱险，回国效力，忠诚可嘉。我代表中央向您表示慰问。

请允许我敬您一杯！”

茅盾虽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也以实相告：“我素来不会饮酒，请原谅。”

刘百闵又客气一番，便自斟自饮地转入正题：“近两年来，文化工作委

员会的委员散居各地，使得重庆总部的工作难以开展，所以，蒋委员长特意要我请沈先生以及其他原来在重庆的委员回去。至于工作问题、生活安排，这些都好说。”

茅盾心想，蒋介石此时向我发出邀请，不知要干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把我置于中统和军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于是对刘百闵说：“我刚到桂林，需要歇一口气，会会老朋友，手头又正写一部小说，不好打断，去重庆的事以后再说吧。”

谈话之后，他了解到刘百闵在代表蒋介石“邀请”他的前后，还找了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人。但大家都在观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冒风险。

刘百闵游说没有结果，不敢回重庆，每隔一段时间就上知名的文化人家里继续游说。

茅盾自然是他经常“光顾”的对象。

7月间，刘百闵还托刚到桂林的叶圣陶来劝茅盾。他推托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无法离开。

10月底，茅盾完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以及《耶稣之死》等几个短篇小说。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下了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为什么呢？

对于蒋介石，他虽然只见过几次面，却深知其人。1925年初，他由上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大会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官学校招待全体代表，并当场演说。茅盾实在不很懂这位“大同乡”的宁波官话，但却听懂并且记得他曾厉声怒色地说：“我不但有子弹打我的敌人，也有子弹打我的不敢冲锋的学生！”

“四·一二”政变发生，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激起了茅盾极大的义愤。

他以总主笔的身份在《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社论，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及本质，怒斥蒋介石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第二”，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大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转入地下之前写的最后一篇社论就是《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蒋介石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茅盾。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蒋介石举办庐山谈话会，邀请全国各党派暨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国是”。茅盾也接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柬，邀他参加第三期庐山座谈会。

当时，他曾对转送此信的郑振铎说：“发这封信的人大概忘记了十年前他们对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消呢！我看应该去封信问问清楚，免得上了庐山他们却拿出了那个通缉令。”

“不要开玩笑，你打算去不去呢？”郑振铎问。

茅盾表示要想一想。

郑振铎劝他去：“你可以听听老蒋说些什么，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好吧，那就去听听他谈些什么。”茅盾答道。

然而，过了二十多天，郑振铎却转给他一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庐山办事处的电报：“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

“蒋介石是何许人，我沈某清楚得很！”茅盾想。近几个月来，为什么刘百闵三番五次上门转达蒋介石的“邀请”呢？他几次和妻子商量。

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考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是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和重庆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再从蒋介石再三派刘百闵到桂林请我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茅盾说，“老蒋是想把我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目前尚无意向我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

孔德让觉得他讲的在理，便说：“我想老蒋也不大敢。”

“到了重庆，我可以凭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常委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取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致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他妻子“唉”了一声说：“只不过到了重庆，我们将会丧失行动自由，不可能再像上回那样化装潜逃了。在桂林，我们还能想法转移到敌后根据地。再说，到了重庆，再去延安更难了。老蒋知道我们把孩子留在延安，怎会让我们再去延安呵！”

自从来到桂林，困居斗室之中，夫妻俩常思念留在延安的两个孩子。茅盾对妻子说：“德止，几十年的经历使我明白，我个人的幸福已牢牢地和民族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只有争得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我们阖家才有团圆的可能。”

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去重庆。

叶以群又来信催茅盾去重庆主编《文艺阵地》，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于是当刘百闵再来劝说时，茅盾便通知他：“我的长篇小说已告一段落，朋友来信要我编杂志，我准备不日起程去重庆。”

刘百闵一听，喜出望外，连忙讨好地问：“那您有什么困难？盘缠够不够？如果有困难，政府可以给您解决。”

“一切我都能自理，不用政府为我操心。”茅盾冷冷地说。

其实，他们除了一日三餐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幸亏接受出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华华书店老板孙怀琮拿出三四千元预付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稿费，帮了茅盾的大忙。

柳亚子和田汉夫妇听说茅盾夫妇要离开桂林，便请他们夫妇来到月牙山素医馆，品尝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的煮豆腐，替他们饯行。

柳老诗兴大发，即兴赋诗一首赠给茅盾：

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

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筵醉巨觥。

田汉对茅盾说：“我的大孩子海男也要去重庆，他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一路上也可以保护你们。”

“那好呀！海男是正规军人，有他带着枪陪伴我们，就不有找保镖啦！”茅盾欣喜地说。

12月3日，他们夫妇和田海男乘上了开往柳州的汽车。预定的路线是：桂林 柳州 金城江 贵阳 重庆。

来到柳州，茅盾夫妇住进一家旅馆之后，妻子上街去买东西，茅盾靠

在床头歇息，忽然有人敲门。他走去开了门。来人是一个獐头鼠目的青年。

“沈先生，我在桂林拜访过您，您不记得了？”

听茅盾说不记得他，又自称：“我去过苏联，懂俄语……”

“请问你有什么事？”茅盾打断他的话问。

“我也住在这旅馆里，是要同你一路去重庆的。”

茅盾心中一惊，他是什么人？

“我来给您看两样东西。”那人从怀里掏出两张纸。

茅盾接过一看，一张上面写着：“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分处、分局留心稽查该二人行径上报。”另一张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名字为“沈雁冰（茅盾）陈培生”。两张纸上都盖有国民党中统局的大印。

这两份东西看样子是真的，茅盾心中思忖道，他们大概是在对我进行神经攻势。只是为什么把陈培生和我连在一起？他远在新疆嘛。

茅盾笑了一笑，将两张纸还给来人。

那人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严肃地说：“沈先生，您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因为我向来敬佩先生，所以来向您透个风。明天火车上就有一个人和您同行，这人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您到重庆。”

哦，这家伙原来是中统局的特务，不知他的上司是怎样一个人？

等妻子和田海男回来，他便告诉了二人。田海男说：“怪不得我在旅馆饭厅里看见了那个人。”

“你说的是谁？”茅盾问。

“一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的身份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在桂林和柳州都有他的办事处。”田海男答道。

“你在桂林随便接见客人，混进了特务也不知道！”妻子埋怨他。

第二天他们乘火车去金城江，茅盾果然看到一个中年胖子昨天来找他的小特务坐在一起。

下了火车，茅盾和田海男赶到汽车站排队买去贵阳的车票。他买到了两张，而田海男却未买到，说是卖完了，让他搭后天的车走。这时，田海男从售票窗口看到姓陆的胖特务正在里面和一个人嘀咕什么。

“显然他们是想把你和我们拆开。”茅盾听了田海男的话，分析道。

“那我们也迟走一天吧，我担心他们要搞什么鬼……”孔德沚担忧地说。

茅盾想了想，告诉田海男：“我看他们的阴谋只是要把你和我们分开，由他们来‘护送’到重庆。既然他们硬要代替你当我们的‘保镖’，我们也不便推托，明天还是上路，发生什么情况再随机应变。海男，你也不必为我们担心，我虽不会打仗，对付特务还多少有点经验。

我们到重庆再见吧。”

夜晚，他看到妻子忧心忡忡，就又分析给她听：“老蒋派刘百闵专程到桂林来请我们去重庆，而且耐心地等了半年，这表示他的‘诚心’和‘宽宏大量’。再说，我是第一批被他‘邀请’去重庆，假如他在半路上对我做什么手脚，那就等于撕破他戴了半年的面具，而且会惊动其他还在桂林的文化人。老蒋还不至于蠢到这步田地的。我估计，那姓陆的任务就是把我們囹圄地送到重庆，防备我在途中逃走。他们派这样一个大角色来护送，算是看得起我了。”

在赴贵阳的汽车上，姓陆的胖特务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他们夫妇的后面。

他主动地同茅盾打招呼：“沈先生，您好！”

“哦，您贵姓？您怎么认识我的？”茅盾问。

“鄙姓陆。抗战那年，沈先生在长沙讲演，我就在下面听讲，所以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请问陆先生现在官居何职？”

“不敢，鄙人现在是西南公路局稽查，常在这条路上跑。”

“我可是头一次呢。”

“那我给您当向导好了。”胖特务假装热情地说，“今夜要在独山住宿，那里只有一家旅馆，总是客满，住不上店的客人，只好住民房。不过只要沈先生愿意，我可以帮您订到房间。”

“好哇，那就拜托你了。”茅盾顺水推舟地说。

到了独山，胖特务让小特务陪他们夫妇慢慢走，自己和那个女人先去房间。他开的房间是里外两间，客气地让茅盾夫妇住里面，他们住外面。

“那位小兄弟呢？”茅盾意指小特务。

“他另外有地方住。”

晚饭后，胖特务找茅盾谈。茅盾就问他那位女的是不是他太太，他支吾其词地说是朋友的夫人。

哼，假话！还不是专门派来盯我妻子梢的。茅盾心里说，至于你把我们的房间安排在里面，虽然也是为了便于监视。

“沈先生为什么不想做一番事业呢？”胖特务问。

“事业？写作就是我的事业。”

话不投机，两人也就未谈下去。等姓陆的走后，他对妻子说：“我看，明天干脆把住旅馆、买车票的事托付给姓陆的，这在他是求之不得的，在我则乐得轻松。”

“你倒会利用人。”

“嘿嘿”，茅盾轻声笑了，双眼闪着狡黠的亮光。

他们来到贵阳，准备换车。哪知道汽车站里人山人海，要去重庆的客商有上千人。

姓陆的胖特务虽有“本事”，也只买到了五张三天后的汽车票。但他却凭关系，安排茅盾夫妇住进了贵阳最高级的旅馆——贵阳招待所。这里住有国民党的“党国委员”，大门口站着宪兵，茅盾夫妇也享受到了“保护”。

在贵阳，茅盾去拜访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谢六逸，还有他的亲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又给重庆的刘盛亚去了封信，告诉他预定到达的时间。

第四天早上，茅盾因风寒发起烧来，咽喉红肿，说话嘶哑。王会悟得知后，去请来一位教会的医生，给他打了退烧针，让他服了药。陆胖子闻讯也来看望，并且对他说：

“车票是明天的，不过您明天恐怕不能走了。”

“等到明天再看吧，车票太难买了，实在走不了也只好退票。”茅盾卧在床上道。

“换几张票还是容易的，您放心治病吧。”陆胖子安慰他。

过了一夜，茅盾的热度退了，喉痛也已痊愈。他和妻子决定仍然上路。看看姓陆的，正和那女人睡得呼呼打鼾。他们不管他，打好行李，掏出汽车

票看了看，叫了两辆人力车，准备去汽车站。刚走到招待所门口，被那个小特务看见了，惊慌地问：“沈先生，你怎么今天又走了？”

“昨夜出了一身汗，烧退了，今天能走了。”茅盾边走边说。

“您身体虚弱，还是明天再走吧。”小特务劝阻道。

“不！车票太难买了，我们还是今天走。”

小特务看茅盾走意坚决，急忙转身跑进招待所。等他和姓陆的胖特务赶到汽车站，茅盾夫妇已坐在汽车上，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

“昨晚多喝了几口，今早睡进了头，差点误了事。没想到沈先生的病这么快就好了，还先上了车！”胖特务自我解嘲地说着，挤进了座位。

茅盾心想：瞧这个家伙，何等样狼狈！万一他赶不上这趟车，到了重庆怎么交差呢？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显然是那个女人来不及，仓促间被他甩在贵阳了。

一路上，由于姓陆的胖特务和那个小特务的“保护”，茅盾夫妇不必操心吃饭、住宿，他的身体完全复原了。第三天中午，汽车抵达重庆海棠溪车站。姓陆的胖特务向茅盾说了声“再见”，匆匆下车先走了。

来到出口处，茅盾见姓陆的特务在向一个人交代什么。他想，这是把我交给了别人继续进行监视了。

“刘先生！”茅盾发现了来接他们的刘盛亚，便唤道。

刘盛亚挤了过来，帮他提起皮箱、包裹。茅盾低声说：“有两个人跟我从贵阳来。”

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走到检查处，刘盛亚指着茅盾夫妇的行李同宪兵打招呼说：“这是我们的行李，要看吗？”

“看一样吧，”一个宪兵回答。

这时，另一个宪兵被人请了过去，立刻又转回来，对他们说：“行李统统要看！”

于是，皮箱、铺盖卷、小藤篮……一件一件地被检查，连一条鱼干的肚子也被搜查到了。

茅盾妻子在綦江买的那筐橙子，却幸运地未被一只一只剖开检查。一个宪兵从皮箱里拿出一个层层密包紧裹的纸包。

“小心，这个很重要！”茅盾郑重地说。

宪兵一层一层地解开纸包。“一个墨盒。”他十分捻地说。

“我们写文章的人，墨盒当然重要啦！”茅盾不出声地笑着，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着开心的光亮。

然而，生活的道路充满荆棘。自茅盾重新来雾都这一天起，他就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了，活动的阳光困难和斗争和艰苦是可想而知。

新中国诞生后，有一天，萨空了来拜访茅盾，对他说起一件往事：“我被中统特务秘密绑架囚禁了两年零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六月，即将恢复自由的时候，中统局长徐恩曾托人传话给我说：‘人有幸有不幸，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掉了。最幸的是茅盾，因为他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哈哈，雁冰，被你逃过了鬼门关！”

茅盾也笑了起来，对这位老朋友说：“特务头子的幸福观不值得一驳，不过他这话也证明了我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没有错，我在桂林所下的决心是正确的。它使我赢得了三年宝贵的时间，得以尽我所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多做一些工作。”

四六、教胡子婴写小说

重庆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是一栋精巧的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一个青年店员，楼下一层住的是茅盾夫妇。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茅盾正在修改“突兀文艺社”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习作。

她妻子听到“笃笃”的叩门声，放下手中的针线去开门。

“哦，是你呀！”她一边请起家来客进屋，一边欢声向丈夫喊道，“雁冰，你看谁来了！”

“沈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来客是一位清秀端丽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向茅盾打招呼。

“啊呀，胡子婴！认识，认识，老朋友了。”他忙起身让座，叫妻子沏茶，拿粮果、糕点，招待客人。

茅盾和妻子在“五卅”运动前一年就认识胡子婴了。那时，她才十六七岁，不认识字，在一个工厂做工。徐梅坤带她来到茅盾家里，她很拘束，但是茅盾从她那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中，发现了智慧和机敏。这以后，她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茅盾知道她除了参加工人运动，也勤奋地补习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徐梅坤被捕入狱，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茅盾从日本回国，再与她见面时，胡子婴已以是章乃器的夫人。她谈吐举止雍容大方，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抗战初期，她以章乃器夫人的身份参加救亡运动，和宋庆龄的关系密切。前两年，茅盾听说她和章乃器分手了，自己独立地从事经济活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乡间小屋来的呢？”茅盾问胡子婴。

“春风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我这个墨水匠，能帮你这个女能人的什么忙哟！”

胡子婴说她住在重庆，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谈论抗战形势和祖国前途。在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深深感到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只有萎缩，很难生存。要使民族工商业发展，必须先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洗涤剂上的自由。许多朋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作了不少报告。

“我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文艺武器来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由于我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我很想写一部小说，表现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您是写过《子夜》的大作家，可得帮帮我啊！”胡子婴恳挚地向茅盾提出要求，眼里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色。

“噢哟，原来您是想跟我们作家争夺饭碗呀！”茅盾开玩笑说，“不过，我是非常欢迎你来‘夺’这个饭碗的。现在，文艺战线的兵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是老朋友，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这可太好了，你肯收我这个徒弟，我先谢谢您！”胡子婴站起身，向茅盾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天不早了，吃过饭你们再慢慢谈好不好？”孔德沚对二人说。

“好，好。子婴，我们这里就一间房，虽说已搭了两张床，还好再搭一张，你就住下来，我们从长计议吧。”

晚饭后，茅盾替她搭好床，又和妻子一起为她铺好被褥，还拿出苹果，削好递给她吃。胡子婴被感动了，她想不到一个闻名中外的大作家对朋友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这样真诚热情地招待，于是也就毫无拘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写小说，在我头脑中已酝酿很久了，常常感到一股冲动，使我跃跃欲试。但是，我虽看过不少小说，却从未写过，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写呢？”

茅盾燃着一支香烟，热情地说：“你想借这个题材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创作意图很好。你又有这方面的真切感受和第一手素材，这部小说，你一定能写成功！”

“哎呀，你先别给我打保票了，还是教我这个徒弟怎么写吧。”胡子婴急切地说。

“别急，别急，我说给你听。”

茅盾一向反对初学写作者从各种《小说作法》中寻找创作的捷径，然而他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解“小说作法ABC”，想把创作的基本方法一下子灌输给胡子婴。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半夜。第二天，茅盾又和她谈了整整一天一晚。

茅盾说，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在开头把布局搞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全部上场，在读者眼前出现许多陌生人物和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悬念，使读者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时，才逐步弄清楚第个人物的面目、性格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你的《子夜》就是这样写的吧？”胡子婴问。

“《子夜》还不是好的例子。”茅盾继续说：“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他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场的。书中上百名的人物，开篇时使读者眼花缭乱，逐章看下去，渐渐明朗，进入胜景。”

他又把另一种方法告诉胡子婴：一开始只是把一、二个主角介绍给读者，用简单的事件开始，逐步开展，引出一个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宏大场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就是一例。小说一开始只是写安娜在铁路上的遭遇，由此引伸开来，出现了情节复杂、场面壮丽的故事。

第三天早上，胡子婴怀着充实和高涨的创作激情，返回重庆市区。

茅盾对妻子说：“我不知道她究竟理解了多少，我讲的那些对她有没有用，也不清楚。”

“我看有用！”妻子说，“不管怎样，子婴的创作勇气，是被你鼓动起来了。”

隔了两个多月，胡子婴又一次来到唐家沱，小心翼翼地交给茅盾一厚叠稿子。

茅盾笑着接过来，在手中掂了掂说：“好重，多少万字？”

“五万多。这是我的第一次作业，您要多批评呀！”胡子婴愉快地说，她想，自己终于把小说写了出来，经过茅盾的指教，再作局部的修改就可以了。

茅盾让妻子陪她聊天，自己坐到桌子前阅读稿子。他觉得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血，作品主题明确，故事也有头有尾。然而，这小说的最大毛病是人物苍白，缺乏个性，只是一种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正是写小说的大忌。看来，这小说必须推倒重写。但她受得了吗？

又想：相信她经受得住，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沈先生，您看完了吗？”胡子婴微笑着问，流露出期望得到赞许的眼光。然而，她却听到茅盾说：“这不是小说，这只是政治口号加上些艺术的形容。”

茅盾看到这位女作者脸上闪过惊愕而又失望的神色，便诚恳地向她指出这部稿子所以不能为小说的原因。而且决断地说：“必须重新写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在为从这初稿看，你有生活，你有激情，你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你还不善于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还不理解小说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他详细地谈了修改意见，并且特别提醒她：“不要企图在初稿上修修补补，而要重新写过，这样可以放开来写，把环境写真，把人物写活。子婴，拿出你创办企业的那种勇毅精神，这部小说必定能写好！”

胡子婴辞别茅盾，又去拜访了曹禺，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和鼓励。

她从头写起，写了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

茅盾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上唐家沱的女作家、老朋友。他把全稿浏览了一遍，看出这是以章乃器为模特儿的。书中也可以见到胡子婴自己的影子。他对胡子婴说：“很好，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只要再作些修改就成了。”

孔德沚对丈夫说：“你就帮子婴改改吧。”

茅盾对胡子婴说：“还是你自己来改，你能改好。我给你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供你参考。你把书稿留下，我再仔细看看。”

胡子婴走后，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自己的小说，对这部稿子逐字逐句地考虑起来。

为了尊重作者他没有直接在原稿上改动，而是另用稿纸写上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

茅盾觉得小说主人公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发家办起企业，与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相比较，缺乏典型意义。主人公的性格刚愎自用，这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不典型。

那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是容易动摇，习于苟安。但是，他考虑到胡子婴是以章乃器作为模特儿的，而这些特点正是章乃器所有的，因此就没有提出要作者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

一个星期后，茅盾进城去，把书稿和修改意见交给了胡子婴。

她没有想到茅盾写的修改意见竟有几十张稿纸，像是一本小书。老作家对她的书稿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深刻、详尽，使她除了发自内心的金价佩和感激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

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很大的修改。

茅盾看了第三稿，对胡子婴说：“现在这一稿只需要作些文字上的加工了，假如你同意，就由我来作这最后的润色吧。”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太谢谢您了！”

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 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

四七、第一次过生日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往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中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诉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

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

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但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 /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甸，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过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

四八、清明前后

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党像慈母般地关怀着我，而我却是工作得太少、太少了。

下旬，茅盾签名的《文艺界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团结抗日。

3月初，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迫害民主人士，强化独裁统治。

接着，国民党财政部宣布黄金自每两二万元提价至三万五千元。事先获得消息的主管人员及官僚政客乘机抢购以获暴利。案发后全国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是那些抢购了几千两黄金的大户，草草退款了事；却把几个挪用存款合伙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抓了起来，作为替罪羊。

这件黄金提价舞弊案发生在“清明”前不久。

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他向妻子要了把剪刀，把这天报纸上的新闻剪了下来，又一篇一篇地看着，想着：“这是个好材料，要以写！”他想到有些朋友曾向他建议：“你使枪使了这么多年，何不换把刀来试试呢？”

于是他决定写剧本。

茅盾认真地写起大纲来。抗战以来，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两万七千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

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吴祖光还把他的大纲带回家，让他的弟弟吴祖强帮茅盾誊抄清楚。茅盾怀疑自己的剧本是否适合演出。曹禺鼓励他：

“西洋戏剧史上不乏不适宜演出的好剧本，譬如萧伯纳的有些剧本就是。茅公，您写小说是大手笔，写剧本也会成功的！”

过了两个星期，话剧《清明前后》开始由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连载。

当茅盾刚把第二幕写完，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使他异常兴奋。但是他并未停笔。他知道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经济界将有大变，他的题材会显得有点过时，而且自己的编剧能力不行，然而他又转念：公然卖国殃民的事还在大量产生，我又何不在这乌烟瘴气中喊几声？

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清明前后》。

茅盾这次创作，是在“使枪使了许多年”之后第一次学着“使一回刀”。剧本以国民党的“黄金案”丑闻为背景，写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在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觉醒的过程，以及小职员李维勤购买黄金受害的遭遇，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

如此一本话剧，谁来演出呢？没有一个导演敢接受。他们一怕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二怕万一演砸了，不好向茅盾这位大作家交代。

“莫非我这第一个剧本真的要步萧伯纳的后尘？”茅盾的确很忧虑。

“茅公，您的《清明前后》交给我们演吧！”4月初，赵丹登门拜访，一见面便对他说，“我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从新疆监狱中逃出的难友，刚刚组成了中国艺术剧社，决定第一个戏就上演您的《清明前后》，并且由我担任导演。”

“啊，那可太好了！”茅盾深为感动，但他考虑到该剧社初创，万一演出失败，将会影响剧社的前途和几个十个人的生活，就劝赵丹说，“这件事对你们非同小可，你可要慎重呀！”

“我们考虑过了，愿意冒这个风险，相信这个戏会取得成功。沈先生的脚本我已读了三遍，从内容讲，这剧本具有尖锐的、丰富的现实意义，正是

当前最需要的。只是从演出的角度看，怎样使它更加……”

看到赵丹欲言又止，茅盾笑道：“请只管大胆说，是不是有些地方不合话剧的规律？”

“不是这个意思，”赵丹接着说，“我是说如何加强戏剧效果，怎样更能出戏，说干脆点，沈先生能不能允许我这个导演对剧本作一些技术性的变动，譬如把太长的对话改得短些，把某些情节改得更富于戏剧性些？……”

“可以，完全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能加强演出的效果，你尽管全权处理。”

“沈先生这样信赖我，使我信心倍增。等我把剧本改好，就送来请您过目。”赵丹说。

“不必了，”茅盾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排练，争取早日公演，要趁现在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的机会，把戏推出去。我想，老蒋囿于目前国共谈判的形势，大概不好意思下令禁演。你既看过剧本，总有一个修改的想法，你现在就可以谈一谈，大的改动有吗？”

赵丹说：“大的改动只有一处，就是把全剧的演潮移到最后一幕，现在的高潮在第四幕，第五幕又低落下来了，所以想把四、五两幕颠倒一下，或者把两幕合并为一幕。

另外一点比较大的改动是金澹庵，他是官僚资本的化身，我打算一直不让他出场，却又随处使观众感到有他在幕后，直到最后一幕全剧达到高潮时，才让他出场亮相。您看行不行？”

茅盾感到赵丹所提两点大的改动，都很有理，便欣然同意了。

9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一则广告：“中国艺术剧社不日公演茅盾第一部剧作《清明前后》，导演赵丹，舞台监督朱今明，演员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

这天晚上，茅盾偕夫人进城看了彩排，发现赵丹扮演了那个只露一面的金澹庵。

9月26日，《清明前后》正式公演了。第一天的上座率只有六、七成。茅盾心里很担心，怕演出成了兔子尾巴。第四天，他不放心，戴了一副墨镜，悄悄去察看售票情况。

他大吃一惊：嚯，售票处排起了双行长队！

后来他听说，从第二天起，上座率就逐日增加了。由于场场爆满，星期日还要加演一场。

演出气氛热烈，剧场内掌声不绝。记者在报导中称之为“罕见的现象”，“盛况空前”。

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当时《清明前后》已连续演到第三个星期，12日茅盾就听到消息：当局要停演《清明前后》。他想，赵丹他们的剧团已打响了第一炮，我的剧本也走到了大众中间，停就停吧。

然而停演并未成为事实，不仅如此，国民党的中央电台还在10月16日设立了一个特别节目，介绍《清明前后》。但他们的“介绍”却是：这个话剧内容有毒素，观看过此剧的人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切切不要去看。

岂料他们这么一广播，反而帮茅盾和赵丹的中国艺术剧社做了义务广告，观众更加踊跃。

不少工厂的老板看了《清明前后》的演出，大为感动，居然慷慨解囊，

包场招待他们的职员、工人看白戏。

有一天，茅盾收到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厂的一封信，希望他能允许该厂排演《清明前后》。茅盾在信中表示，欢迎他们排演《清明前后》，他将不收取演出税。这个工厂公演了好几场。他们给茅盾寄来了铅印的说明书。

10月8日，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六人，特地设宴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

吴梅羹说：“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的，很多人被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痛苦，自己不敢讲，不能讲的，都在戏里讲了出来，全都是真实的。”还有人希望茅盾再写一个《中秋前后》。

这样一部深受欢迎的好戏，刺痛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中枢神经，成了他们的心头病，虽然不敢公开明令查禁，却在11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一份密电：“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主任道藩10月30日函，‘为茅盾（即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后》剧本，内容多系指责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请特加注意’等语。查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固特电达，倘遇该剧上定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

茅盾当然无法知道此事。到1946年4月9日，他才从《新华日报》上读到一则报道：

茅盾名著《清明前后》，国民党当局密令禁止，电饬各地暗中制止上演出售。

茅盾指出“张道藩”的名字对妻子说：“哼！这位当面对我十分恭维，在我五十寿辰时又称我‘没有矛盾’的国民党‘党国大员’，终于在我背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破例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四九、哭爱女

从1940年秋天离开延安，茅盾和妻子已有五年没有见到女儿、儿子了。

“哎，把亚男、阿桑丢在延安吃苦，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孔德沚常常对丈夫絮叨。

茅盾也不时想念一双可爱的女儿。他在《感怀》一首诗里写他对女儿的思念之情，说自己虽然离开了延安却时时引劲向北国。“双双小儿女，驰书诉契阔。梦晤如生平，欢笑复呜咽。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中夜起徘徊，寒将何凄切！”

几年来，他们给儿女寄过不少信，也接到过孩子的一些回信。儿子来信很少，因而读女儿的信，就成了茅盾和妻子这几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亚男的每封信都给他俩带来无限的慰藉，每封信都充满了对父母的爱。有一次，亚男在信里写道：

“爸爸胖了，这倒是令我们高兴的，爸爸不是从来都是瘦的吗？现在怎么会胖的？我有点想不通，因为照理说近年来只有更辛苦。妈呢？胖瘦？我希望她结实些，不要再虚胖，到重庆逃警报也不方便。甲状腺现在是否完全

好了？念念。”

两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仿佛女儿就在眼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喜讯传来，举国欢腾。过了几天，茅盾夫妇接到了女儿的来信：

“爸、妈，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得十分心焦的见面日子等到了，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

“德鸿，你快设法把亚男、阿桑接到重庆来，即使让我见上一面也好啊！”妻子急切地说。

茅盾深知妻子思念儿女的感情，答道：“我懂。这几年你跟着我到处奔波，形影不离，然而你的心有一大半在孩子那里，这我知道。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向恩来同志提出，想法把他俩接来。”

近一个月来，茅盾曾几次进城去郭沫若家里参加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时局讨论会，也几次出席周公馆的文艺界集会，见到过周恩来为副主席。但都因人多和匆忙，没有找到机会。

在约9月20日，茅盾因腹泻躺在全国文协的宿舍里休息，等妻子进城接他回唐家沱。

以群坐在他对面的床上，正跟他谈报上的一篇杂文，这时，刚从延安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刘岷夫妇走了进来，还带着他们五岁的小女儿。

“沈先生，您好！”

“啊，刘岷！”茅盾见到这位曾为《子夜》刻过插图的青年版画家，显得十分高兴，边忙问，“你们哪天到的重庆？”

看到茅盾要穿鞋下床，刘岷急忙伸手劝阻。

他只好依靠在床栏上，眼睛闪着光，向刘岷询问延安文艺界的情形，还了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他是什么都想知道呵。

刘岷一一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并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孩子，和沈霜很熟悉，只是沈霞同志牺牲得太可惜了！”

“你说什么？！”茅盾大吃一惊，忙问。

看到他神色异常，刘岷不知所措，讷讷地问：“沈先生，你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快说，我女儿，她究竟出了什么事？”茅盾从床上坐了起来，紧张地问。

刘岷像是做错了事似的，显出一副尴尬的样子，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眼睛觑着叶以群。

茅盾意识到女儿出事了，心想：难道会是真的？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收到她的信啊！……胸中一阵憋闷涌起，使他几乎喘不过气。

这时，叶以群告诉他：“沈先生，这是真的，沈霞同志牺牲了。恩来同志叮嘱我们暂时不要告诉您，怕你们过分伤心，弄坏了身体。前一阵您正好又赶写《清明前后》……”

“她怎么会死的？出了什么事？刘岷，你，你对我说啊！”茅盾带着哭声说。

刘岷看到叶以群点了点头，就说：“据说因为人工流产，手术不慎，出了事故。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茅盾的泪水从眼眶溢了出来，痛哭失声道：“我的亚男呀！你怎么就这样死去了，莫明其妙地死去了！呜……呜……，死于人工流产！啊，这，这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你才二十四岁，你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呀！你怎么就……就死了呢？他边哭边问刘岷：“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8月20日。”

8月20日？都已经一个月了！茅盾心想，为什么琴秋、仲实他们不的一封信，难道能永远瞒着我们？医疗事故，随随便便害死一个人！难道不负法律责任？！

叶以群拿出一封信，递给他：“这是张仲实托人带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及时交给您。”

茅盾接过信，正要看，忽听楼下传来了妻子的声音，急忙塞到褥子底下，并向叶以群、刘岷夫妇做了个手势。他妻子走进门，见他坐在床沿上，就关心地问：“病好了吗？”看到刘岷夫妇，又说，“原来还有客人。”

“他们是新从延安来的，这是刘岷，这是他妻子、女儿。”茅盾介绍道。

“看，这小姑娘多么像我们亚男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真可爱！”

刘岷一听茅盾的妻子这么说，感到不妙，连忙把话岔开，与她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走了。

女儿骤然去世的噩耗，对茅盾的打击太大了。他跟妻子回到唐家沱家里，像是害了一场大病，浑身软绵绵的；躺在床上一直昏昏沉沉，缕缕哀思萦绕胸怀。

茅盾只有两个孩子，相比起来，女儿更使他疼爱。在他看来，女儿聪明、刻苦、懂事、有志气，比儿子成熟很多。女儿又从小爱好文学，高中时候就能写出情文并茂的散文，常常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奖励。妻子常对茅盾说：“你的文学细胞，遗传给亚男了。”在延安时，沈霞的英语已达到了一般的水平。茅盾把她送进“抗大”，后来听人说她已是俄语班的高材生。

从女儿的来信里，他逐渐了解到：女儿入了党，有了爱人，叫萧逸，是个文学工作者。

一九四二年秋，两人订了婚，今年春天结了婚。当时，萧逸在延安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一个周末，女儿背上垮包，带上几件衣服、几本书，唱着“信天游”，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萧逸那里。

对着清冷的月光，这两个穿八路军灰布军装的男女战士结合了，没有一杯水酒，也没有一响鞭炮，有的只是两颗火热的心。

这样简朴的婚礼，使茅盾和妻子感到心疼。他自己结婚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十多年，家中没有收笔试，而他母亲还为他花了一千元！现在女儿结婚，虽说是战争年代，但婚礼毕竟太简朴了。这使他们夫妇觉得欠了女儿一笔债。

茅盾怎能不悲痛万分呵！他想，女儿只有活了二十四个春秋啊！她还没有尝到人生的欢乐，就这样骤然离开了父母，而且死得又如此不值得，她怎能瞑目于九泉呀！

张仲实的信是8月20日写的，信中说，他女儿的死是因为手术前一星期报了许多奎宁而没有告诉医生。读完信，他想到：究竟是谁骗了我？或者说医生编了仲实？……看来刘岷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人工流产这样的小手术而出人命，只能是手术不慎引起其他病变所致。

我明天去找徐冰，向他问个明白！

夜晚，茅盾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苦苦地思索着：这个噩

耗怎样告诉妻子呢？

亚男是她的心头肉，现在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宝贝女儿忽然没有了，她怎么受得了呀？

天亮了，妻子问他：“昨晚你做了什么梦？”

“怎么啦？”他诧异地反问。

“我像是听见你在哭。”

“哦，是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梦里见了妈妈。”他顺口说。

茅盾想，虽然妻子从不怀疑我，可是我怎能长久隐瞒亚男的死讯？一旦她知道我骗了她，甚至会怀疑阿桑也出了事，那她会急疯的！

他又想：亚男没有了，我们还有个儿子，如果能把儿子召到她身边，再对她说出亚男的不幸，也许能减轻她的痛苦。对，今天非得进城不可！

“你病还没好，又要到哪里去？”妻子见他匆匆吃了碗泡饭，穿了长袍正要出门，便问道。

“病全好了，城里有急事非去不可。”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我能走了。”

“那你早去早回，路上当心。”

茅盾匆匆来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找到了徐冰。徐冰已接到叶以群的报告，于是连忙请他坐下，不他沏上一杯茉莉花茶，不待他开口，就说：“这件事发生得太意外了，责任完全在我们，是那医生玩忽职守。洛甫同志来电说，已给那医生处分。”

“可是，我们的亚男没有了呀！”茅盾的眼里泪光闪闪。

“沈先生，你要节哀，”徐冰又说，“这件事迟迟没有告诉你，除了怕你们打击太大，影响你们的健康，还因为恩来同志想亲自将这不幸的事件告诉你们，向你们道歉。

你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却没有照管好。可是恩来同志最近实在太忙了。”

自从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飞抵重庆以来，周恩来就忙于和国民党谈判。半个月前，他还安排茅盾夫妇到“红岩”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拜见了毛泽东主席；以后，毛泽东主席又约见了茅盾和马寅初。这几天，国共谈判正处在艰难的僵持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外国通讯社传出谈判将要破裂、内战不可避免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

茅盾听了徐冰的话，赶忙说：“这我知道，他很忙。请转告恩来同志，我完全能料理好这件事，倘若为了我私人的事而分了他的心，那就使我不安了。”

“沈太太知道了吗？”徐冰问道。

“还没有，我不敢告诉她。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商量的。我想先把儿子接到重庆，再对妻子谈女儿不幸的事，您看”茅盾征询地说。

“这好办，等我报告恩来同志后，尽快把您的儿子接到重庆来。”徐冰爽快地表示。

几天后，徐冰告诉茅盾，国共会谈即将结束，准备让他的独生子乘毛主席返延安的回程飞机来重庆。

10 月 12 日傍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夫妇开车来接茅盾夫妇，并说他们的孩子已来到重庆，住在“红岩”。

到了“红岩”，爬上八十八级的石梯，绕过黄桷树，走进八路军办事处。在一间小客房里，和衣躺在床上的沈霜看见他们进来，急忙跳起身喊叫“爸爸、妈妈”。

“长高了，也长壮了。”茅盾的妻子奔过去，抱着儿子喜孜孜地端详着说，又回头看看四周，问道，“亚男呢？亚男呢？你阿姐在哪儿？”

沈霜没有料到母亲还不知道姐姐去世的消息，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看到儿子的窘态，又见到茅盾、钱之光等人一个个阴沉着脸，她慌了，叫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要瞒我！”

“姐姐已经死了。”沈霜说。

儿子的声音很低，而她听起来却像是一颗炮弹的爆炸声，顿时突出眼球问道：“死了！”

怎么会死的！这不可能！”

“这是真的，妈妈，姐姐真的死了，所以让我来重庆。”

她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呆楞楞地，过了几秒钟，才“哇”的一声号啕恸哭起来。

茅盾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然而他还得安慰妻子：“亚男没有了，还有阿桑，他就在你身边呢。你看看——”妻子猛然抬起来，泪眼汪汪地盯着他：“怪不得好几次夜里发现你在哭，原来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呀！我的亚男啊，你怎么会死了呀！……”

钱之光夫妇好言安慰了茅盾妻子一番，便离开了他们。

沈霜等妈妈哭过了一阵，便向父母报告姐姐死亡的经过，他说：“日本投降后，延安的干部纷纷奔赴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我听说，组织上决定派姐姐去东北。姐姐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为了不影响行军和今后工作，就去找琴秋婶婶联系，到和平医院做人工流产。

这不是什么大手术，谁也不会想到会有危险。手术是下午做的，第二天姐姐就觉得呼吸困难，腹痛难忍，告诉姓鲁的主治医生，鲁医生却说这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还说‘这点痛都不能忍耐，太娇气了’，只给了一点止痛药。到第三天早上五点，姐姐四肢突然发青，出现休克，经过抢救，有所好转，可是主持手术的鲁医生却不来。姐姐就要求护士打电话请琴秋婶婶快来。琴秋婶婶后来对我说，她急忙找了医生去会诊，不巧延河正发大水，骑了马也过不去，而和平医院又在河对岸。不久姐姐又第二次休克，再次抢救，已经晚了，中午十一点多，她心脏停止了跳动。琴秋婶婶告诉我，事后解剖，才发现死亡的原因是手术消毒不严，伤口感染了大肠杆菌，又转成腹膜炎，也没有及时治疗。”

“唉，那个医生真是太没有责任心了！如果他第二天仔细检查一下，不是就能发觉，进行紧急治疗吗？”茅盾愤愤地说。

“那个‘白花郎中’，他在忙些啥哟？”他妻子气得用土话问。

“他要去东北，在忙着整理自己的东西。”沈霜回答母亲。

“出事时，你姐夫呢？”茅盾问儿子。

“姐夫和我被洪水阴在对岸，没有人通知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姐夫悲痛得哭晕了过去。”沈霜拿出两张照片交给父亲，“这是姐姐下葬时照的。”

茅盾看到一张照片是下葬时的情景，有一个八路军音乐工作者在用小提琴演奏哀乐。

另一张照片是女儿的坟墓，墓碑上刻着“沈霜之墓”，下署“编辑局教职学员全体、琴秋、萧逸、沈霜同立”。

孔德让捧着这两面三两张照片，又悲伤地痛哭起来。

茅盾心似刀绞：女儿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了！弥留之际身边甚至没有一个亲人！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妻子居然支持他们的儿子沈霜回解放区工作。她说：“儿子大了，应该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永久留在身边，只要他健康、平安，我就满足了。要说安全，还是解放区呀！”

茅盾安顿好儿子的工作之后，已是1946年1月初。周恩来约他见面，热情地对他说：“这几个月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停战协定刚刚签字，政协会议又开幕了。所以您的女儿不幸逝世，我一直没顾得上向你们致哀。”

“为了孩子的事，已经多次打扰您了，我和德止都深感不安。”茅盾诚恳地说。

“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有责任，是我们平时对那个医生教育不够。孔大姐心情好些了吗？”

周恩来问。

“好多了，儿子回来，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那么现在儿子又走了，她能放心么？”

“这次儿子回解放区，是得到她赞同的，她认为儿子在解放区比在重庆更使她放心。”

“好，这样就好。”周恩来笑着说。

但是，茅盾总是忘不了不幸而死的女儿。他和妻子翻检女儿的遗物，在女儿的一封信里发现了过去所疏忽的一段话：“《劫后拾遗》我们已经读到。我自己觉得遗憾的是，这里面竟没有写到我所最关心的学生与文化人的情况，在这中间我也找不出什么你们在那时究竟是怎样的点影子来。”

于是，茅盾埋头灯下，花了一周的时间，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连载。他把每期报纸都剪下保存好，国灰这是他专为纪念爱女亚男而作的。

这年8月，是沈霞逝世的一周年，茅盾在写《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一段文字，表达怀念女儿的深情。他说，女儿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下地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五十、喜晤玛娅访同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茅盾经香港回到上海，住进大陆新村6号。

8月初，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邀请他和夫人去苏联观光的请帖。这请帖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发出的。

经过一番周折，10月下旬，他从南京外交部拿到了出国护照。于是，他和夫人便忙着打点行装，购买准备送人的礼品，又连着出席各种饯行的宴会。

1946年12月5日清晨，茅盾夫妇在戈宝权、苏联大使馆随员克留可夫等人陪同下，坐车来到江海关第三码头。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傅彬然、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送行的人，把他俩送上苏联的“斯摩尔纳号”轮船。朗诵临别赠言、题诗留念、拍照、话别，茅盾夫妇和送行的朋友依依难舍。中午过后，轮船鸣笛起碇了。

“斯摩尔纳号”经过五天的海上颠簸，于12月10日下午进入海参威港。

三天后，茅盾夫妇乘上国际列车，前往莫斯科。他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连续十二天乘车坐火车，因而使我得以饱览西伯利亚冬季披着银装的无穷无尽的平原和森林的景色。”

25日清晨，他俩抵达莫斯科。邀请他们访问、观光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派了副会长卡拉介诺夫、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到车站迎接。叶洛菲也夫通晓英语和汉语，专门陪同他们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三天下午，中国大使馆女秘书胡济邦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便宴。”这使得茅盾夫妇改变了次日的安排，前往拜会了傅秉常。

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

除夕下午2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他们下榻的旅馆设宴，介绍茅盾和莫斯科的苏联作家见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人。西蒙诺夫在外地，没有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派来了代表，他告诉茅盾：法捷耶夫在郊外休养，邀请您和夫人出席1月2日苏联作家协会为您举行的茶会。

在席上，坐在他旁边的吉洪诺夫说，他还记者茅盾在1936年翻译了他的长篇小说《战争》。列昂诺夫为他们表演了三十年前学的一套中国戏法：“仙人搬豆”。

元旦中午，叶洛菲也夫来拜年，又对茅盾说：“我还要送您一件礼物。”

茅盾正想说“何必客气”，却见他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矮小的中国姑娘进来了，原来她是玛娅——弟弟泽民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新侄女！头一次见面，怎不令他感慨呢。

孔德沚一见到玛娅，想起了去世的泽民和女儿亚男，顿时哭了起来。

叶洛菲也夫见这情景，便向茅盾告辞，走了出去。

这时，茅盾见妻子抱住玛娅细细端详，问着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娅听不懂，因为她不通中国话。他便问玛娅懂不懂英语，她也摇摇头。忽然他想起来时准备了一本俄英、英俄两用字典，还没有用过，急忙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他先从英文找出一个字，叫玛娅看俄文解释，再由她找出一个俄文的字回答，他看英文的解释。

通过这样艰难的“交谈”，茅盾夫妇弄清了几个最简的问题：玛娅今年二十岁，在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

玛娅也了解了他们的一情况，知道了祖母已去世，用俄文给她写过信

的姐姐亚男也去世了，哥哥阿桑在解放区工作。

她说，她母亲（张琴秋）从东北给她来过信。

中午了，茅盾夫妇留她吃午饭。玛娅不肯，他感到可能学校有什么规定，但是茅盾和妻子还是硬拉她去餐厅，请侄女吃了一顿法国大菜。看着侄女吃得那么有滋味，两人眯着笑眼，打心底里高兴。茅盾想，看得出，这要丰盛的法国大菜，她有生以来还从未享受过。

临走时，玛娅通过两用字典对他们说，明天带了翻译再来。

第二天下午，她带来了两个男青年，一个是张太雷的儿子，另一个是刘少奇的儿子。

靠了这两个翻译，茅盾夫妇和她的谈话方便多了。他对侄女谈到他们的家族，他们这些年的经历，沈泽民的一生，还谈到了国内的形势，又问了她和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又叫玛娅来玩了几次。对他这个唯一的侄女，茅盾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说：“玛娅是很可怜的，她刚出世，父母因要回国搞革命，不能带着她，就把她一人留在苏联，送进国际儿童院，等于是孤儿。现在看到她长得很结实，她爱好运动，又上了大学，我们总算放心了。”

下午，他和妻子出席了苏联作家协会的茶会。叶洛菲也夫向他介绍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娜塔霞，从前就住在这幢房子里。

从1月3日起，紧张的参观活动开始了：去红军博物馆、列宁图书馆，上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访《儿童真理报》编辑部、红十月工厂……。

晚上，经常是观看文艺演出。5日晚上，主人安排他俩去欣赏苏联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茅盾第一次看芭蕾舞，也是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他说，“我被那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征服，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在日记里又写道：“《天鹅湖》第一次在‘大戏院’上演，为一八七七年。

那时的观众不用说都是贵族和富人，可是今天同在大戏院上演，观众却是工农子弟了。

这些人，在当年恐怕连远远站着望一望大戏剧的都是不许的。”

后来，他们还去“莫斯科列宁勋章马戏院”观看了马戏。

莫斯科气候寒冷，主人见孔德沁几次患感冒，就派人陪同他们先去南方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访问，参观当地的革命遗迹，观看民族歌舞和话剧。

一个月后，回到莫斯科，茅盾急于访问几位苏联作家，这是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

叶洛菲也夫对他说，已经为他作了安排，卡达耶夫、马尔夏克、西蒙诺夫、吉洪诺夫都在莫斯科。

2月15日，大雪纷飞。中午，叶洛菲也夫和翻译史班诺随车来接他和夫人前往卡达耶夫住的公寓。茅盾对这位作家比较熟悉，是他的小说《团的儿子》的中文译者。

两人一见如故。茅盾带了一部中译本《团的儿子》上面有签名和图章，送给主人。

卡达耶对中国的图章很感兴趣。他也拿出一本最新版的《团的儿子》，

题上字签了名，回赠给茅盾。于是两人从这部小说的创作开始了交谈。

“你在《团的儿子》里写了炮队军官 叶拉吉耶夫上尉，这一位炮队军官太可爱了，跟凡尼亚一样的可爱。你挑中一个炮队军官作为这部小说的重要角色，是不是跟您青年时代曾在炮队服务过有点关系呢？”茅盾问。

卡达耶夫回答：“我倒没有想起过。”可是他承认，一个人往昔的生活经验的印象，“常常会场写作时忽然来了，并不是你特地召它来，而且在它忽然来了以后你也还觉得呢。”他说自己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这篇小说里，用玉蜀黍来比拟一个女子的牙齿，为什么会用到这样一个比喻呢？“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后来记起，这是我幼年时的一个印象。”

对于他的构思、搜集材料，茅盾也发生了兴趣。得知这位作家平时像契诃夫一样也写笔记，已积有二十多册。

卡达耶夫问茅盾是否写笔记。

“平常我是差不多不写笔记的，只在构思一篇作品的时候，这才做起笔记来，这实在就是那作品的大纲了。时时修改，最后的形式也许和最初的完全两样。”

他们还谈到了方言和文学的大众化、民族性。

第二天，茅盾夫妇去访问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他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作家已有孙子，家里的客厅很大，摆满了书架、钢琴等物，和卡达耶夫一样，有着专用的书房。

想起自己在上海的家，卧室兼书房，只有他们的一间书房那么大，不禁感慨得很。

对于马尔夏的儿童文学作品，茅盾极为称赞，说是写出了“全新的作童文学”。

过了一日，他和妻子冒着严寒到西蒙诺夫家访问。会客室的方桌上已摆好了各种点心和瓶酒。好客的主人邀他们举杯，为中苏友谊和中国进步作家们的胜利干杯。

酒是甜的，茅盾却只能抿一口，便放下了酒杯。

西蒙诺夫见了，笑着说起他游历捷克时的一则“见闻”：在布拉格一家酒店的墙上，有这样的铭辞 “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吧！”说着又对他举起酒杯。

“这个铭辞应该还有半段，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应当试一试如何而渴死。”茅盾也笑着举起杯。茅盾知道西蒙诺夫这时年方三十一岁，已得过四次斯大林文学奖金，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对于他谈话如此直爽、风趣，感到很亲切。

在临告别时，茅盾又向主人提了一个问题：“你的处女作是什么？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西蒙诺夫说他少年时在飞机厂工作，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吊儿郎当，使得父亲很生气。至于处女作，他说：“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那是用诗体给一个女子写的一封情书。自己以为是很用心写的，可是没有结果。所以这‘处女作’是失败了！多年以后，才用诗体来写作。这回不是情书，而是历史，对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尼夫斯基。”

两人都哈哈大笑。茅盾想，下次写访问记，这可是个生动的材料。

吉洪诺夫，是茅盾在苏联访问的最后一个作家。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

家殷勤接待了他和妻子。他看到吉洪诺夫的书桌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玩意：木、石、牙、雕刻、泥塑、人像、飞禽、走兽、花瓶，什么都有，而人像尤其多。其中的一个青田石雕的山水形笔架，把他吸引住了。

“这是中国的，”吉洪诺夫说。

“而且还是浙江的，所以我特别感到亲切。”主人从书架上限下一尊泥塑弥陀佛，赞叹道：

“你看，多么精致的艺术品！这也是中国民间艺术家的作品吧？”

茅盾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听老作家接着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我很羡慕叶洛菲也夫，他到过你们伟大的国家。”

主人深情的话语使茅盾感动。他说：“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吉洪诺夫先生能够到中国游历。”又指着青田石笔架和泥塑弥陀佛说：“并且，能亲眼看到这些小小艺术品的小小的作坊，以及作坊里世代相传的手艺人。”

“好的，盼望能有这一天，”吉洪诺夫笑道，“中国人民为了自由解放而英勇斗争，最后的胜利现在是不远了。”

他们交谈起两国文坛的情况。主人说，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个中国女作家从德国来，在大会上报告她地德国被捕的经过。

“这位女作家的名字是不是叫胡兰畦？”茅盾插嘴问。他在写《虹》时把胡兰畦作为女主角模特儿，但他和胡兰畦从未见过面，只听说过有关她的情况。

吉洪诺夫答道：“是的。是叫做胡 胡一边报告，一边就哭起来了。那一次大会，高尔基也在场，高尔基也哭了。”

茅盾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博物馆、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涅克拉索夫博物馆、普希金博物馆等。他在和国内的朋友通信时，感叹地写道：“在苏联，每个故世的著名作家，国家都为他成立博物馆。可我们现在连鲁迅博物馆还没有呢！”

他明白，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对鲁迅、郭沫若等名作家的作品禁都怕禁不了，哪里还会设立博物馆呢！这只能盼望新中国建立后去实现。

4月5日晚上10点50分，茅盾和孔德沚乘坐的“莫斯科 海参威”国际列车开了。

他们含着热泪，挥手向送行的侄女玛娅、叶洛菲也夫和其他苏联朋友告别：“再见了，玛娅！”

再见了，朋友们！”

五一、迎接解放

茅盾于1947年4月25日傍晚，走下“斯摩尔纳号”的舷梯，被朋友们簇拥着回到大陆新村的家里。

从去年12月5日登上“斯摩尔纳号”到这一天，一共四个月零二十天。当他们重踏上祖国国土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已十分严峻：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扩大，这年3月9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被迫全部撤回延安。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以二十三万兵力向延安进攻，19日占

领延安。

茅盾分析：我刚刚访苏归来，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有利条件，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苏联上。蒋介石虽然利用苏军在东北的某些行动煽动了一次反苏浪潮，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禁止介绍和宣传苏联。

在几个月里，他出席朋友们的小型集会，接受报刊记者的采访，应邀到一些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的讲演。他发现人们对苏联的一切都感兴趣。有人还向他打听“苏联有没有乞丐”？他回答：“我见到战争中的孤儿，却没有见到乞丐。”

5月上旬的一天，金仲华来找茅盾，看到他带回了一本英文版的《俄罗斯问题》，又听他说在苏联时访问过西蒙诺夫，还观看了《俄罗斯问题》的演出，便约茅盾赶快翻译出来，交给他主编的《世界知识》周刊连载。

不久，《俄罗斯问题》陆续发表了。他的《游苏日记》也在《时代日报》上开始连载。

他还陆陆续续地写了二十二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中的大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苏联见闻录》里。所以他说：“在1947年，我成了苏联问题专家。”

这年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判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以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命令。沈钧儒等民盟中的左派代表，决定出走香港，继续进行斗争。

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派人通知茅盾等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作为过渡，第一步先到香港。”

12月14日清晨，茅盾悄悄地离开了大陆新村寓所，由叶以群陪同，乘船去香港。

孔德沚留在上海，替他放烟幕，对外界说他“回乌镇去了”。在茅盾抵达香港两个星期之后，她才和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结伴，同船到达香港。

茅盾是第三次来香港了。他看到这时的香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伤，自顾不暇，这时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中立、不介入的态度。

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什么文章都可以发表。因此，茅盾等都觉得来到了一个小小的自由天地。他们在《华商报》、《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电讯，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

“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呵！”他兴奋地对叶以群说。

那几天，茅盾和朋友们碰在一起，常常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胜利，议论毛泽东在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使他眼界开阔，心潮澎湃。在为1948年元旦写的迎新献词中，他怀着激情写道：“新年见面，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更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子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忆国的伟大建设！”

战后香港的房子比以前紧张，而从内地大城市及海外汇集到这里来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总数有一千多人，一时间形成了房荒。茅盾夫

妇在公寓中住了一个半月，才靠青年作家周钢鸣的帮助，在九龙弥敦道租到了一位华侨的房子，和历史学家翦伯赞分住二、三楼。

不久，茅盾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7月，他和巴人、周而复、叶以群等人发动、创办了《小说》月刊。

孔德沚见他连日来既要参加政治活动，出席文艺集会，又要编刊物、写评论、作杂文，更要埋头创作小说，胃病、眼疾、失眠等病相继发作，心疼地说：“你五十多岁了，可不能跟小伙子比呵！现在就这样忙，要是新中国建立了，不是会把你累垮吗？”

“是呀，是呀！正因为黑暗即将被光明代替，新中国快要建立了，我才需要更多地工作，更多地锻炼。不然，我会成为一个落伍者呢。”茅盾眨着眼睛，微笑着说。

“我说不过你，你总是有理有。不过，身体总要注意吧？你自己感到累了，就休息。”

妻子关切地叮嘱着。

“好吧，我遵命就是。”他又把头埋进稿纸堆中，唰唰地挥写起来。

5月初，他与郭沫若等六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响应中共关于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9月9日，在上海被查封的《文汇报》迁到香港复刊了。报社负责人邀请茅盾担任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并且要他提供一个长篇小说连载。

前两次他来香港，曾应报纸之邀写过两个长篇连载小说：《你往哪里跑》和《腐蚀》。

这一次，他要写的是《锻炼》。

茅盾对这部小说，计划写连贯五卷的长篇，各卷的人物大致相同，稍有增添。第一卷《锻炼》，写上海战争至大军西撤，包括工业迁移之第一期，抗战初期对民主运动的压迫……

等等。在这一卷中，主要人物都露了面。第二卷拟题为《敌乎？友乎？》，写保卫大武汉至皖南事变发生。第三卷为皖南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中原战争，湘桂战争。第四卷写湘桂战后至“惨胜”。第五卷为“惨胜”后至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

他设想，在这五卷的系列小说里，要把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这可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呵！他预计全书五卷要写一百五十万字，如果时间有保证，大约三年能完成。

从9月开始，茅盾便投入了《锻炼》的创作，由于报社催得急，他没有来得及详细的大纲，只是根据已勾勒出的整部作品的轮廓，写了一个简单的大纲，又陆续写了一些笔记，为书中的主要人物立了小传，便匆匆地赶写出来。

《锻炼》全书二十多万字，在《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上连载了一百一十天。全部登完以后，书店与茅盾联系，要求出单行本。但他没有同意，他想把后面几卷完成以后再出版。

岂知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茅盾不仅未能完成以后的四卷，而且出单行本的事，也不再有人向他提起。直至1980年底，《锻炼》的第一个单行本才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81年5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的横排本。

1948年除夕那天，茅盾和夫人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等二十多人，秘密地乘上一条苏联轮船，直航大连。

在他们之前，已有沈钧儒、郭沫若等两批人秘密离开香港。他们都是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分批地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去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准备的。

五二、首任文化部长

茅盾等一行抵达大连后，略事休息，以恢复海上航行的疲劳。然后坐车进入解放了的沈阳。2月初，北平解放。下旬，中共中央派专列“天津解放号”接他们三十五位知名人士来北平，下榻在北平饭店。

这是茅盾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北平。他陪妻子去观光了市容，重游了颐和园。在《北京话旧》里，他写道：“我在一九一四年游过颐和园，时隔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春重游颐和园时，虽已日月重光，而此园风物依然如故。此外，译学馆没有了，整个北京几乎不认识了。……旧的北京是历史上的北京，它是皇亲国戚、达官大贾、地主、买办的北京；现在的北京，是人民的北京，将永远是人民的。”

几天后，萧逸来看望茅盾夫妇。这是女婿和岳父母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高兴，孔德让像见了女儿似的，笑着哭了起来。

萧逸对茅盾说，他是华北野战军第26兵团的前线记者，北京解放后，随军入城的，想留下来从事写作。

望着这个喜爱文学的女婿，茅盾是多么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在自己和妻子身边，既能就近给他指导，又能对他俩有所照顾。然而，他想到中国人民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应该有年轻人写作品来反映。萧逸就是这样一个人，便鼓励他说：“你最好能参加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个时间不会很长了；然后再进行个人创作，你的材料会更丰富，作品会写得更有价值。”

女婿听从了岳父的教导，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在总攻太原之前，狡猾阴险的敌人伪称投降。萧逸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用话筒喊话，从枪眼中向敌人宣讲形势和政策，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这时，敌人射来罪恶的子弹，他牺牲了。

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夫妻俩收到后大哭了一场。

5月2日，茅盾在给张帆的信里写道：“……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

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

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的安慰。您有来信也同

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

感动的心情您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您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赍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

写了这封信之后，茅盾就忙着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

7月2日至19日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他被选为副主席，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9月中旬的一天，沈钧儒陪着一位老人来到茅盾的房间。

“雁冰，你看谁来了？”

茅盾一看，喜出望外地连忙迎上去：“啊，张总经理！真是贵客呵。”

原来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菊生）先生。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到上海找工作，就是他安排茅盾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的。

张元济告诉茅盾，他是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老人深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不到北京，这次重来，真是‘王侯宅第皆新主’呵！”

沈钧儒接过话，说道：“我们现在说‘新’，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改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侯宅第’现在是都归人民，新主是人民。”

“对，您说得对！说得好！”张元济答道。茅盾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茅盾参加了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又出席了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言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站世界。”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茅盾被推选为政治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会议期间，茅盾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对他几天前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里，他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请求毛当档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

毛泽东的复信如下：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展开信中附来的一张宣纸，上面写着：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

茅盾给周扬看时说：“起应，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呵！”

他没有料到，更重的担子将要放在他的肩上。当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后，来找他：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您为文化部长，特向您征求意见。”

茅盾跟周总理很熟悉，便坦率地表示：“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

民共和同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总理认为他说的合乎情理，答应再考虑一下。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已在等候。坐下后，周总理对他说，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请他来商量。

毛泽东主席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

看到主席和总理如此郑重地向他提出，想到既然革命工作这样需要，他觉得不能再推托，便答应了。

毛泽东、周恩来一听，都笑了。他们跟茅盾紧紧握手，送他步出颐年堂。

10月1日，茅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两天后，他出席了政务院成立大会，又受任为文教委员会召集人。

11月2日，茅盾主持了文化部成立大会。从此，他挑起了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的重担，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筚路蓝缕，殚精竭虑。

五三、吃闷棍

1950年1月27日傍晚，电影剧作家柯灵和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柯灵说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听听茅盾的意见。

提起这部小说，茅盾清楚地记得它在香港《大众生活》连载后引起轰动的情形。当时一封封读者来信由邹韬奋转到茅盾手中。许多读者都很关心赵惠明的命运。邹韬奋还对他提出：

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作者在小说中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能否再写几节，给主人一个光明的前途？茅盾为满足众多读者的请求，续写了赵惠明走向自新的道路。后来他曾写道：

“《腐蚀》在《大众生活》上连载之后，上海的华夏书店在十月份赶印了单行本。

然而，由于当时环境所限，《腐蚀》引起的轰动，仅限于香港、南洋和孤岛上海等几个城市，而且是短暂的，因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也就在战火中湮没了。《腐蚀》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那时，上海的知识出版社重新把《腐蚀》印了单行本，并且运到了重庆等地出售。

不少报刊发表文章，称赞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一部用血写成的特务反动分子罪行的记录’，‘是胜利后一本最欢迎的书’等等。这就既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欢迎。国民党紧急下了命令，到各书店查禁。共产党则在各解放区翻印，向广大群众推荐，有的单位甚至把它规定为学习材料。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

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想不到作为‘紧急任务’赶写出来的这部小说，竟发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当时《新华日报》发表了陈稻的《介绍茅盾先生的《腐蚀》》，指出：

“惠明的发展是完全合理的，不仅惠明如此，过去、现在和将来许多被害的人们也要跟着这唯一的道路打到光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李伯钊的《读《腐蚀》》，称赞《腐蚀》“是一篇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有力的控诉书”。

现在，茅盾听说柯灵要改编《腐蚀》，他表示同意，并对改编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

这年下半年，柯灵编剧、佐临导演的《腐蚀》，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摄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

然而，不久《腐蚀》忽然莫名其妙地停映了。柯灵感到很奇怪，就去打听。答复是：

《腐蚀》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回答是：特务是应该憎恨的，而《腐蚀》的女主角却使人同情。

柯灵写道：“这理由当然无可訾议，而且牵涉到危险的立场问题：同情特务，还得了吗！”

他说，“照我粗浅的想法，惩治特务，律有明文：‘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腐蚀》的女主角是被拐骗走的，正是胁从分子，衡之以政策，不是很好的配合吗？而且，观众如果同情失足者，自然会更引起对特务制度的憎恨。分化瓦解敌人，作用下地在于此。但到了艺术作品中间，不知何以就变得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一个天良未泯的失足者（实质上也是被害者），连少许的同情也靳而不予？”

电影剧本的编写是根据原著的。当影片《腐蚀》遭到停映有厄运时，揣为文化部长的茅盾，犹如挨了一记闷棍。按照他的性格，如在过去，他必然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论争。当《蚀》三部曲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的攻击时，是如此；当“第三种人”诬蔑鲁迅和他写的杂文时，是如此；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是如此。

而如今，他却默无一言。

对于茅盾的不置一词，没有表示态度，柯灵说：“我不信他心里没有任何想法。”

是的，茅盾并非没有想法，而是当时没有形之于语言文字。那时，他不仅知道影片《腐蚀》被停映，是因为公安部门提出了意见，而且还听到一位很有权力的人指责《腐蚀》“不该给赵惠明这样一个满手血污的特务以自新之路。”还批评原著：“这是一本对特务抱同情的书。”茅盾对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指责，当然不能接受。直到1954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问他对原书有无修改，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并且在《腐蚀》新的《后记》中，对人们加给该书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一作了分析。他写道：

“《腐蚀》是采用日记体裁的，日记的主人就是书是的主角，日记是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去理解，那就会对于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反之，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九四一年向

作者提出要求给予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的大多数读者，是看清了赵惠明的本质。”“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将不写赵惠明那样的人，当然书名也决不会是《腐蚀》一类的词儿了；但《腐蚀》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恐怕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而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茅盾又挨了一棍。那是 1951 年初的一天，一位部队青年作家白刃来拜访茅盾。他将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递给茅盾，请求为这部作品写一篇序。并且希望能早点交给他，他所在的中南军区领导已经看过原稿，这个月就要出版。

茅盾一贯热情扶掖青年作者，便答应读过作品之后，尽可能满足他的请求。

1 月 8 日，茅盾出席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学典礼后回到家里。灯下，他伏案为《战斗到明天》作序。这篇序的天头是：“读了《战斗到明天》，我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接着指出：“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优越感、自由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作者是以这一点作为主眼来写这部小说的，他获了成功。”又具体分析了小说中几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称赞作者对孟家驹“处理得颇为细心”，“林侠、辛为群、沙非，这三个人物，作者写的比较多，也写得有声有色。”又指出，对焦思宁“写的较少，而且形象也比较模糊。”还批评作者对“这几个正面人物的思想改造的过程都表现得不够多。”“形象性似嫌不足。”最后，他写道：“尽管有上述的这些美中不足，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自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作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战斗到明天》出版后不到一年，白刃受到了所在部队粗暴的批判。他很痛苦。他后来写道：“一个初生的婴儿，被掐死在摇篮里，还指责母亲生的是怪胎。母亲痛苦地分辩说，婴儿长得不漂亮，生理上可能有缺陷，却不是怪胎。然而族长专横地讲，不是怪胎也是毒瘤！权掌在族长手中，谁敢不服？母亲只好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饮恨伤心！”

为这部小说作序的茅盾也受到了牵连。1952 年 3 月上旬，《人民日报》编辑部转给茅盾三封读者来信，指名批评他为《战斗到明天》作序。

这是茅盾作序时未曾料到的。他把《战斗到明天》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再看看自己写的序，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战斗到明天》是有缺点（他已在序中指出），但是对于读者来信中指责的没有以工农兵为主角，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这种观点，他不能同意。况且，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主张“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至于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则更不同，他们实际上也是“兵”。茅盾早年创作《幻灭》、《动摇》、《追求》之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粗暴批评，他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忿忿地说：“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种倾向：你做一篇小说为劳苦群众的工农诉苦，那就不问如何大家齐声称你是革命的作家；

假如你为小资产阶级诉苦，便几乎罪同反革命。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事。”

茅盾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置之不理吗？显然不行。回信答复吗？又怎么写才好呢？

最后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复信。在这封信里，他承认自己为《战斗到明天》写的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了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的，不严肃的表现。”他还承认，这篇序写的不好，“又与我之存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信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

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还加上了编者按。对于这种做法，尽管茅盾很有意见，但他也只能默然受之。

白刃从报上读到《茅盾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反复念着结尾那一段话，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起来，克服了沮丧的情绪，振作起修改全书的勇气。1958年，经过彻底修改的《战斗到明天》又出版了。

岂知十年浩劫中，白刃连同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了反平。1982年，《战斗到明天》的第三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刃特地在《前言》中写进一段话：“十分抱歉！当《战斗到明天》第一次遭到围攻之时，茅盾同志也受到了连累。（这件事至今想来，心中仍感到不安。）但是茅盾同志仍以长者之风鼓励后进的精神，在报上公开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五四、培育文学新人

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

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

六〇年优秀短篇小说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

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

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洋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

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

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薄、平庸，大家总是能对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

五五、沉默，沉默

1963年12月23日早晨，茅盾吃了妻子给他做的早点，穿上黑大衣，匆匆出门。

他是去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昨天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学习。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本月12日对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其是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茅盾坐在会场里，直到会议结束，未说一句话。和与会同志分别时，他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同志握了握手。在汽车里，他靠在后座上，一直闭着眼睛。

回到家里，就向书房走去。妻子问他要不要给给饭，他挥了挥手。看到丈夫脸色阴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孔德沚没有问，悄悄地拉上了门，退了出来。

茅盾担任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的主编以来，写作的评论和文章有一百多万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至今，他评论的作品有一百多篇（部），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文章有几十篇。他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撰写了《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等等。他所热心提倡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

夜晚睡在床上，他辗转反侧，几次起来报安眠药，喝水，解手。

妻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也缄默着，没有答话。

1964年新年，茅盾参加了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文艺整风会。各协会党组领导干部都对照“批示”进行检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他坐在一旁，沉思不语。

他能说些什么呢，违心为“批示”说好吗？或是不顾事实地把十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

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厥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 12 月 20 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六、总理保护，免遭劫难

1966 年 2 月，林彪、江青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全国各地涌起了批判“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浊浪。一大批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导演、演员被诬陷为“牛鬼蛇神”、“判徒”、“特务”、“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

茅盾也被江青点了名，指斥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已刷出许多批判茅盾作品有大字报，说他“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人。此时竟被加上“和党争夺青年作家”的吓人罪名。

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候，他除了出席半月一次的政协座谈会，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去医院看病以外，大部分时间闲居在家，看报、听广播、读书，或者依照过去的习惯，将旧的德文版《新闻导报》对半裁开，细心装订成册，加上用彩色画报纸作的封面，制成一本本日记本。长期来，他就用这种自制的本子记日记。

对于政治形势，谨言慎行的茅盾在日记中避而不谈的。但有时也偶而流露出一些情绪。

他在 5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三、五年前所摄，今则作为坏电影在内部放映矣。”“昨晨因抽水马桶漏水，水流泻地，蹲身收拾约半小时。当时未觉劳累，昨晚稍觉两腿酸痛，不料今日却更感酸痛。老骨头真不堪使用了！”

年逾古稀的茅盾这一声长叹，流露出这位文豪在十年浩劫来临时无限沉重的心情。

5 月 31 日晚上，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之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刹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连日来，茅盾被通知到统战部或政协听报告、学习文件或讨论。晚上，他常常躺在床上想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他只得通过看书催眠，或加服安眠药。

6 月 27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阅书至十时，服药 PH、LI、L、M 各一枚，继续阅读书。

但至十一时尚无睡意，乃加服 S 一枚，仍阅书以催眠，不料一小时后乃入睡。时已为翌晨一时矣！”

这一年的夏天，似乎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显得更加炎热。多少在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贡献的教授、作家、学者，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游斗”！多少珍贵的文物和书籍被当作“四旧”被破坏或烧毁！

对这些，茅盾时有耳闻，也曾目睹。8 月 11 日。他就在楼上见到隔壁

社会科学院情报所造反派稿的一次“游斗”。这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今日上午比邻之科学院情报所有一小队（大概是该所的干部）在所内草坪内游行，其中有戴纸帽者七人，当即右派，但不知其为单位的，抑有科学院其他单位被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纸帽甚高，有字。在窗前望去，不辨何字。”

8月18日，他被通知参加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这以前一天晚上，他“入睡后约二小时即醒，加服S半枚，M一枚，旋即入睡。但四时许即醒，闻街上鼓声咚咚，盖群众赴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将在门楼与群众见面。四时半起身，开炉烧开水及早餐，盖褫姆例假，而德止又因腰疼不能工作也。至六时许早餐已毕。六时廿五分机关事务局来电话请到天安门来了，即出发。七时五到开安门楼。七时半大会开始。九时回家。九时半又赴政协参加追悼聂洪钧之追悼会。十一时返家。”（日记）

8月25日，即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致死的第二天，他目睹了一场“破四旧”的闹剧。

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日下午有若干小孩，闻系文化部职员之子女，大者十余岁，小者有十岁左右，先在文化部宿舍之辽中将旧放在露天之汉白玉石盆（有桌子大小），一一推翻，不知其何所用意。后来又到我的院子里，见一个汉白石小盆（此亦房子里旧有之物，我本不喜此），推翻在地。彼等大概认为此亦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

这事后的第五天 8月30日上午，突然一群人大“三红”的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了茅盾住的小院。那天只茅盾和老伴在家。只见为首的一个举着手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气势汹汹地嚷道：“我们刚从张治中家来，抄了他的家。对他算是客气的！你家有四旧，我们要检查！”

茅盾心想，对这些狂妄的孩子无理可说，答道：“这件事，得通过政协，你们无权在这里乱翻！”

然而这群红卫兵根本不理睬他的话，纷纷冲进房里乱翻起来。

茅盾急忙给全国政协打电话，对方的回答只是“向上反映”。此时政协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看他讨不到“救兵”，正在抄家的红卫兵更来劲了。抽屉被拉开了，箱子被打开了，“有一樟木箱久锁未开，锁生锈，不能开。乃用槌破锁。”（当天日记）“检查”不出什么要破的“四旧”。那满橱满架的书，他们看了不看，却冲着茅盾嚷道：“书太多了没有用处，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只要有部‘毛选’就够用了！”

有个红兵发现墙上一个镜框里是张军人的照片，怒问茅盾：“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谁？”

他们哪知道，这是茅盾女婿、革命烈士萧逸的照片，而萧逸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

“国民党军官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我同你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问统战部去！”

茅盾气愤地说。

又一个红卫兵嚷起来：“快来看这张照片啊！”

原来这是苏联电影明星拉迪尼娜送给茅盾的照片。红卫兵也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在照片背面写上：“不准看！”

文化部的一个群众组织听说人士“三红”红卫兵在抄茅盾的家，连忙

派了几个人赶来，对那个红卫兵头头说，“我们来协助你们抄家。”然后，悄悄对茅盾说：“我们是来监视他们抄家的。”

这伙红卫兵在茅盾家里乱翻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上面派来一个工作人员，才一哄而散。

事后，中央统战部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件事。

其实，就在茅盾家被抄的8月30日这天，周总理已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就有茅盾。随后，茅盾的家便有了解放军警卫。虽然他的处境日趋艰难，却没有再发生过抄家的事。中国作协里的大字报，也被集中到一间屋里，没有向社会开放。

被抄家后的第二天下午，茅盾又接到通知，出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气候突然由热转凉，而他并没有多穿衣服，在天安六城楼上由傍晚五时站到七时，觉得“冷不可支，浑身发抖，乃于七时半返家，急服羚翘丸三丸，姜汤一盞，幸未发烧。”（8月31日日记）

对于这场所谓“破旧立新”的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茅盾在公开场合终缄默不语，内心却很气愤。他曾对亲属说：“他们那样搞，天怒人怨！”

茅盾受到周总理的保护，家里有解放军警卫，“四人帮”的爪牙无法进去冲击，无法将他揪出来批斗。但“四人帮”对此很不甘心，时时寻找机会，企图进一步迫害他。

1967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袭击下，文化部被造反派夺了权。全国政协瘫痪了。

文联和作协被“砸烂”了。林彪、江青利用他们控制下的报纸、刊物，大造舆论。

姚文元在“两报一刊”上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蔑茅盾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四人帮”控制的《文学战场》发表了长篇的《茅盾大连黑会抬出来的一尊凶神》，诬蔑茅盾是什么“反共老手”、“反党的祖师爷”，还有什么“老右派”，等等。胡说他在大连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支持策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提出要“砸烂这尊凶神恶煞，让他见鬼去吧！”随后又在《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诬蔑他：“茅盾在会上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口大骂，诬蔑大跃进是‘暴发户心理’。”

五七、妻子亡故

茅盾的夫人孔德沚，本来身体比较健康。虽然有点肥胖，患有糖尿病，但她心情开朗，笑口常开，楼上楼下操持家务，忙个不停。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以后，她日夜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心情忧郁，头上白发增多了，体质日见衰败。除了糖尿病，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加上营养不足，又得不到好医生的诊治，没有对症的好药。本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由茅盾托香港的友人买了寄来，“文化大革命”

后不准再寄。孔德沚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妻子沉疴不起，茅盾内心如焚。但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里，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他能去找谁帮助呢？几十年战斗过来的革命同志、文朋诗友，有的已被投进监狱，有的自身难保。过去给他们看病的王历耕医生，也已被赶出北京医院。其他的医生不熟悉病情，难以对症下药。他每次拖着病躯陪妻子去看病，回来后全身像要瘫了一样。

妻子看他为照料自己，气喘吁吁地楼上楼下忙碌，心疼地说：“德鸿，看把你累的，不要我的病没好，你又给拖垮了。”

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 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

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五八、孤寂岁月

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東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两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病。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

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枕，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蛸餐露非高洁，蜣螂转丸岂贪痴？由来物性难理说，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苻谋空传世，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只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阒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问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

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 he 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五九、两部手稿之谜

驰骋文坛半个多世纪的茅盾，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剧本和评论、学术论著，都是随写随即发表或出版的。几个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报纸副刊连载，然后由书局或出版社印行。例外的情况只有他在解放后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在创作出来后，既未发表，也未出版，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事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

1955年初的一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见到茅盾，要他写一部反映镇压反革命的电影剧本。

罗瑞卿说，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破获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主要残余势力。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希望茅盾能早日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出来，拍成影片，向全国人民进行教育。

“不行呵，我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怎么写呢？”茅盾真诚地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详细的材料。上海破获了许多重大反革命案件，你可以看全部所需要的卷宗，也可以找有关人员谈话。”罗瑞卿表示只要他愿意写，公安部门能够为他提供一切的帮助。

茅盾见公安部长如此热情，大力支持文学创作，便答应试一试。

几天后，他很高兴地到了上海。由周而复接他旅馆住下，很快和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联系上了。开始阅读卷宗，找人谈话，调查、询问，记下了许多材料。

回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还指定赵明为他提供材料。

赵明是他在新疆学院任教时教过的学生，爱好戏剧、文学，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学写作。

在茅盾带领下，编写过话剧《新疆万岁》。茅盾为他主编的新疆学院校刊《新芒》写过《五四运动之检讨》、《新新疆进行曲》等文章、诗歌。1951年，文化部电影局讨论赵明写的电影剧本《斩断魔爪》，茅盾又一次给了他热情的支持，尽心尽力帮助他的“沈老师”。

茅盾日赶夜赶，不久便写出了这个电影剧本，交给文化部电影局。

电影局和剧本创作所的几个负责人读了茅盾的剧本，认为写得好，只是有点小说化，对话多了一些，如果拍摄，需要分上、中、下三集。他们把本子还给茅盾，后来便拖了下去，不了了之。茅盾以后也没有再拿出来过，一直搁在家里。

1958年春天，茅盾开始酝酿、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并且在百忙中见缝插针地写了起来。

这是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从题材来说，和《子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就时代和人物的命运来说，也可说是《子夜》的续篇。据唐回忆，他曾听人说茅盾正在写《子夜》的续篇，书名叫《黎明》，有一天便匆匆去书店询问有没有《黎明》，书店回答他，还没有印出来呢。那么，茅盾此时写的这部新的长篇，书名是不是叫《黎明》？茅盾并没有向人透露，也没有人知道。

1958年秋天，他在和《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中，说起了他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此时，他才写了个开头，有十万多字。

次年2月下旬，茅盾收到一封催稿信，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写

来的。3月2日，他复信道：“说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续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原因是去年秋冬有些事（例如其中一件是出国），同时身体又不好。这样就搁笔了。本来，去秋和你社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所以至多选一点登登，那是希望得到青年读者提意见，以便修改。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十分抱歉。从去年秋季起，我一直闹病。神经衰弱，多用脑即失眠，天气稍有变动就感冒（而且感冒后一定患严重的失眠），等等，使我深以为苦。我现在是在半休状态。何时能续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以上都是我的情况。本来不想告诉外边，但既承你们这样的对我关心，不敢不实告耳。”

从此以后，茅盾再也没有续写下去。

茅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儿媳曾经寻找过这两部未发表的手稿，而且不止一次地寻找过，但是都没有发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被什么人拿走了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

茅盾的学生，曾协助茅盾创作那部电影剧本的赵明在1981年写道：他“迟迟不见这部作品的发表。大约一年以后，一次我去沈老师家，谈到这部作品。孔德沚同志和我说：‘我读了这部原稿，我感到他（指茅盾）对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较为熟悉，写出来逼真；对现代青年他不怎么熟悉，写出来的还和大革命时代的青年差不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沈老师写就的这部作品，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前年我问沈霜同志，他说这部手稿没有找到，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

如果说是茅盾自己烧掉了电影剧本手稿，那么他为什么要烧掉呢？又是在什么时候烧掉的呢？

赵明又写道：“由此可见沈老师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不成熟的东西绝不拿出来。

他和鲁迅一样，拿给读者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茅盾的好友周而复在一篇文章里则说是：“茅公自己不满意这个电影剧本，干脆把原稿撕了，一张张垫在他用的吐痰杯子里，然后倒掉。这个电影剧本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十分可惜，是新文学和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即使不拍电影，要是茅公改写小说，至少我们可以读到另一部《腐蚀》。”

这是又一种说法。但是有没有人亲眼见他撕毁呢？或者竟是没有撕毁，而是失落了呢？

那部已写下十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手稿，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茅盾研究专家、孙中田教授在《漫话 子夜 续篇》中写道：“这部长篇已经开手，而且已得十万字的开头，可见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关于这部巨著的情况，曾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周而复在《永不殒落的巨星 中》中说：‘有一次德止夫人告诉我，茅公写好一部长篇，可是他不愿意出来。’陈白坐在回忆中也说：‘茅公同志解放后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沈师母口中透露过，却从来未将原稿示人过，究竟是被抄去还是被毁掉，或者藏在何处，也无人知道。’那么开头的部分，是否保留下来呢？笔者为此曾请教茅盾的家属，好像直到目前为止，已动手的部分或者构思的纲要，都还未有下落。”

被称为《子夜》续篇的这部作品又成了一个谜。

六十、退还稿酬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和复刊文学杂志。一本一本刊物、一封一封信，不断寄到茅盾手中。请他题词或题写刊名、书名，甚至单位的牌子。

茅盾看到新时期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心里高兴，因而有求必应，即使是地区或县一级的小刊物，他也乐意为之。他故乡的“桐乡文艺”、“乌镇中学”、“屠甸中学”、“乌镇电影院”、“桐乡中学生习作选”等等都是他写的。

他为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题写了“科学馆”。给湖州师专的《教与学》题写了刊名并寄赠《一剪梅》词。给杭州的《东海》、《文化娱乐》，湖州的《南湖》、德清的《莫干山》等杂志题写了刊头。为京、津、沪和其它省、市甚至地、县办的各种刊物题签，多达一百多种。

他为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题写书名并写序文，给白族作家那家伦的散文集《放歌春潮间》题签，为《北方文学》增刊题写《文艺天地》，等等。

作家冯骥才写道：“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所用的是繁体字，而出版社根据一般常规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总编辑韦君宜同志便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有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而我们都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核桃大小的字颇为吃力的。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

白族作家晓雪也曾写道，茅盾甚至为一张县级文化站办的八开小报《洱海》题写刊头，并应约为《洱海》编辑部书赠《题白杨图》一诗的条幅。

收到茅盾题签、题字、作序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如获至宝，裱装珍藏。他们将稿费给茅盾寄来，一张张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茅盾的家里。

然而，茅盾却分文不收。他给儿子、儿媳讲：童年时他常在一旁看祖父给人家写匾额、堂名、对联，都不署名，说是“我之为人写字，聊以自娱，非以求名。”乌镇有一家富商嫁女儿，要写一本嫁妆清册，要求凡嫁妆中一切物品，都要写成四字一句的对联。

祖父为此花了两天工夫。富商送来纹银十两。祖父不受。他说：“我为人撰写什么，聊以自娱，非以求利。”

茅盾嘱咐家里人把汇来的钱，按汇款人的地址一一退回。

他的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理解老人的心情，于是不怕麻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跑邮局，复信、退款。

八十年代第一春。3月7日下午，来自茅盾故乡浙江省的一位编辑，叩开了沈寓的朱红大门。出来迎接客人的是茅盾的儿媳陈小曼。她告诉来客沈老正在休息。来人说，他是《浙江日报》编辑部特地派来北京，请沈老为该报即将开辟的《寄语故乡》专栏题字和撰稿。

陈小曼对他说：“沈老今年已经八十四岁，身体很虚弱，胃口不好，消瘦，体重才九十斤左右。

视力也不了，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零点三的视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因此不能多用眼力，对外约稿一般都辞谢了。”

来客听说，有点失望。又听陈小曼说：“不过，爸爸经常向我们谈论起家乡的事，或许对你们的约稿会答应的。”来客又高兴起来。

那位编辑走后，小曼把《浙江日报》社来人约稿的事给茅盾说了。老人答应给家乡的省报写一篇文章。而他体力实在不支，就口述了这篇文章，叫小曼代笔。这篇作于3月17日的《可爱的故乡》，是一篇蕴含着浓郁乡思的优美散文。

茅盾让陈小曼把这篇散文，连同题写好的“寄语故乡”，挂号邮给《浙江日报》编辑部。

《浙江日报》于1980年5月25日刊出了茅盾的题字和《可爱的故乡》后，给他寄去五十元稿费。

茅盾听小曼说了以后，说道：“他们怎么给这么多稿费呢？稿费标准我是知道的，我们不能收这么多钱。你给他们退回四十元吧！”

小曼写信告诉那位来约稿的编辑说：“稿费五十元收到了。你们给的稿费实在太多了，沈老让我退回四十元，留下十元，免得一点不收你们又再次寄来，这样大家都不安心。

请体谅老人的心情，并转告一下财务部门，免得他们又将四十元退回来。”

这件事使江坪同志很感动。他写道：“按理讲，一位中外闻名的作家，不顾年迈，为报纸写了一篇难得的散文，这五十元稿酬是不多的。但茅公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作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考虑问题又是多么周到啊！”

茅盾向来是如此对待稿酬的。比如195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他在《文艺报》上连载的《夜读偶记》出版了单行本。出版社按规定给他寄来了上千元稿费。照说，收下这笔稿费也是合理的。然而，茅盾却立即致信出版社，说他只收一份稿酬，随即让人将这笔稿费如数退了回去。

他对家里人说：“我的钱是很多，可是第一笔钱都是工作和写作得来的。不是劳动得来的报酬，我绝对不要！一本书，怎么能拿两份稿酬呢？！”

家里人都觉得他说得在理。

韦韬和陈小曼得到老人的言传身教，在茅盾逝世后一直秉承这种教导。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茅盾全集》。这部全集共四十卷，有一千三百多万字。按照规定，韦韬他们能得一笔巨额稿酬。但是，韦韬和陈小曼联名写信给中国作家协会，将他们应得的《茅盾全集》稿费，全部捐赠给中国茅盾研究学会，作为开展学会活动和奖掖学术研究成果之用。

六一、写回忆录

粉碎“四人帮”之后，茅盾复出。被迫搁笔十二年之后，他写作的热情像火山喷涌。

《周总理挽诗二首》、《迅雷十月布昭苏》、《满江红·欢呼十一大胜利召开》、《鲁迅研究浅见》、《老兵的希望》、《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等诗词文章在各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出来。

1977年初，一桩经过一年时间酝酿的大规模写作计划，在茅盾脑海中成熟了。这就是：

写回忆录。从1896年7月4日诞生之日起，茅盾已度过八十个春秋；如果从1916年参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算起，他也已走过了六十年风风雨雨的道路。在回忆录的序里有这样一些话：“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

二则我之一生，虽不足法尚可为戒。”

茅盾的不少朋友如沙汀、艾芜、田苗等人，也希望他早日把回忆录写出来。

然而，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他在致田苗的信里写道：“写我一生经过的事，此事想想不难，哪知一动手，才知道要找许多旧书、报来核实，那就费事了。”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又没有专门的助手。怎么办呢？他不得不写信给予有关的领导同志，请求给予他以帮助。1978年7月19日，茅盾经过再三考虑，给予周而复写信说：“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参与其事的人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我现在都记不真了）。工作量很大，而且我精力日衰，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阅

写都极慢，用脑也不能持久，用脑半小时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帮助搜集材料，笔录我的口授。恐已往的经验，从外找人，都不合适。于是想到我的儿子韦韬（在延安时叫沈霜，也许您认识）；他是我大半生活中以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确良个人了。有些事或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常能提供线索。我觉得要助手，只有他合适。他现名韦韬，在解放军政治学院校刊当编译。我想借调到身边工作一、二年。为此，我已写信给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希望他能同意借调。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希望您从中大力促进。

“最近（本月七日半夜）在卧室中摔了一跤，虽未伤筋骨，至今腰部仍然酸痛，因而更感到家中没有亲人（男的）之不便（白天除我之外，家中没有男人），如能借调他（韦韬）来，既便于我写《回忆录》，也对我的生活起居有便宜。

“至今写字尚手抖，都是本月七日半夜摔了一跤之后果。”

信中所写的“在卧室中摔了一跤”，是指7月7日夜发生的事。他

是习惯于独宿的，那天晚上由于服安眠药过了量，半夜起床小解时，因头晕、脚软而摔倒了。他不愿意深夜叫醒别人，而是自己用双手撑持着身体，一寸一寸地挪到床前，但是却站不起来，挣扎了约摸一个钟头，最后总算抓住床栏，撑起身躯爬上床去。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茅盾还坚持写作。

后来，韦韬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老人有了助手，查找资料的事可以让儿子去做了。

而写作，他仍然亲自握笔，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

有些老朋友来拜访他，他就抓住机会核对记忆中的人名、事件。有一天，阳翰笙来探望他，还没谈上几句，茅盾突然问起 1926 年北伐军打到汉口的事来：“那时是不是有一个人叫陈启修？”阳翰笙答道：“有，是《中央日报》的主编。”他又问：“那人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叫陈豹隐？”对方回答：“是，是同一个人。”阳翰笙告别后想，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后来才明白：“是在思考他的回忆录，是在核对记忆的人和事是否准确。他对工作、对创作这样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实在令人感动。”

又有一天，孔罗荪去盾他。他要孔罗荪替他查一查：黎烈文什么时候接手主编《自由谈》？

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去主持《中流》？孔罗荪便找当年在上海、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的文学史家唐涛，弄清楚了告诉茅盾。

还有一天，葛一虹来拜访茅盾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极其偶然也写点旧诗。”他看到葛一虹带来他们几个在 1946 年游西湖时拍的照片，有茅公和夫人孔德止，还有洪深、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和他自己。看到一张在西泠印社拍的合影，茅盾拿起细细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葛一虹说：“那次相偕上市场习金华火腿，您指给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您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

归途中，您还说怎样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茅盾笑了。送葛一虹走时，看到孙女儿在玩，茅盾好像被什么事触动了，又问葛一虹：“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信住重庆，是不是？”葛一虹说确有此事。那是葛一虹在 1942 年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盾夫妇去看望他，交给他一封给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他务必尽快妥交转去。葛一虹告诉茅盾：“寻信是我面呈总理的，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茅盾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为了查找或核实材料，茅盾还发信到各地，请亲戚、朋友们帮助。如上海的越清阁就接到茅盾的信，要她帮助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几个历史时期，他们同客一地的某些文艺活动情况。赵清阁为此写道：“他记不清了，我也印象模糊，而我被他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而感动，就代他从旁不解，力求准确符实，然后提供他参考。”

楼适夷说，每次与茅公见面，常谈起他在写的回忆录。显然，“他准备以晚年的岁月，全力完成这部最后的力作。为了写作，许多活动他不参加；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游览与休息。但有时也表示，为不少的访问与约请而感到苦恼。”楼适夷劝他到外埠找个幽静的地方去写，或可排除一些干扰。茅盾对他说：“不行，我身边有带不走的大堆大堆的资料，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搜觅补充，去外埠是不方便的。”在交谈中，楼适夷发现，茅盾写回忆录，不是随想随写，也不是口头说说，用录音机录下，让秘书去整理，盾一遍就

完事，而是预订详密的规划，搜足所需的资料，甚至五六十年前的文学资料，也一点不漏下，必须请人天南地北找回来，然后仔细查阅，才一笔不苟地动手去写。“这是他一生中始终一贯的对写作的谨严作风。直到成为一位八十老翁，而仍保持这种强毅的精神。”

长期以来，茅盾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每天清晨醒来，就考虑一天的工作。七点起床，早饭后略事休息，九点开始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工作到十一点结束。如感到疲倦，就躺到床上休息片刻，然后再起来写。下午，则常常从三点写到五点；或者翻看书刊，查找资料。

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但他写作的地方却是卧室。他患有老年性气喘病，一旦发作，上气不接下气，难过得很。在卧室写作，可以免得从卧室走到书房相起气喘。此时，他的一切都服从了写作回忆录。

茅盾睡的是一张单人铁床。床上是简单的被褥、枕头。为了免得花时间寻找，床脚边的铁栏杆上，整整齐齐地挂了一排裤带，大多是中式编织的，有白的、黄的、灰的；有细长的、粗圆的，还有扁平条形的，等等，根据四季穿的不同中式裤子，他顺手就拿到所要的那根裤带。

单人铁床这边是他写作用的书桌。上面放着《鲁迅年谱》和其它参考书，里面夹陆许多灰黄色的小长纸条。桌子前面放着六七支钢笔。晚年他不用毛笔写稿子，改用钢笔。

稿纸上的钢笔字，像毛笔字那样清秀遒劲，写得一笔不苟，仿佛字字千钧。

有一天，周而复来，见茅盾躺在床上喘着气，就阻止他起来。

“老了，身体不行了，走动一下就气喘，写作久了也不行。”他呼吸销均匀些，就对周而复你声地说。

“现在你一天平均能写多少字呢？”周而复问。

“不过几百字。”

“是不是等身体好一些再写？”

“不，趁我现在能写的时候快一点写出来。”

“可是身体健康也要好好注意啊！”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不要紧。”

周而复想起他过去在卧室里摔过跤，便劝他让一位年青的家属在外边书房里陪住，以便早晚有什么事好照顾他。

“我爱安静，看收写作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在身边走动，那会打扰我的思考的。”茅盾微微摇了摇头说。

“白天你看书写作的时候怕人打扰，可以不要人陪，晚上让你孩子睡在外边，有什么事可以照顾你。”

“也不需要。我晚上睡不好，吃了安眠药，只睡到半夜便醒了，起来上厕所，再服一片安眠药，躺下去过一会儿，才可以再睡两三个小时。我的睡眠是分段的，外界一打扰，就睡不好觉了。”

“那你半夜曾经摔过跤，没人照顾你也不好。”周而复提醒他。

“不要紧，有事，我可以揪铃。”

茅盾说，外边书房东边墙上有一个电铃，听到铃声家里人就到后院来看他。床头也有一个电铃，睡觉时有什么事，就揪这个电铃。

“如果摔跤了，你怎么揪铃呢？”

“也有办法，”茅盾笑了笑，指着床脚说：“那儿也装了一个电铃，线很

长，摔在地上就揪那个电铃。”

周而复果然看见一个电铃挂在床脚那儿，不由心里激动起来，他想：“茅公就是这样一个人独立地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他的书桌便是他的战场，也是他的世界。他的书桌是他的亲密战友，倾听沙沙写字的声音，偷听他的思想，分离他写完一篇又一篇伤口的喜悦，也洞悉他撕毁原稿的心情。”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后，茅盾的体质明显下降，在四个月中，因肺部感染边疆住了两次医院。但在医院治疗期间，他也不忘写作《回忆录》写了篇序，其中有：“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面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

六二、最后的日子

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2月20日，茅盾被家属送往北京医院急救。

检查以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比过去更差，便让他往进北京的119病房。

自从1970年1月28日他夫人孔德止不幸病逝以来，茅盾身上的疾病日益增添、加重。

1978年7月7日半夜又在卧室里摔了一跤。他给友人的信中多次写到自己：“上了年纪，百病丛生，”“左目失明，右目仅0.3视力，且有白内障，”“又有慢性气管炎，走路困难，站立不稳妥，双脚发抖，卧床时多。”“精力日衰”，“精神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茅盾住院的第三天，他的老朋友罗荪同志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来看望他。

茅盾躺在病床上，隆起的鼻孔里插了一根淡红色的细细的橡皮管，正在输液。看到罗荪，他从白色的棉被下面伸出骨瘦如柴的右手，指指鼻子，又缶空中按了两下，脸上现出欢迎和歉疚的神情。

过了一会，茅盾的警卫员小严来了，给他揭掉橡皮管，取走橡皮管。他对罗荪说：“还是老年病，肺气肿，经常气喘，缺氧，每隔一刻钟，大夫给我吸氧一次。不过这次发现肾脏有变化，老是低烧，三十七度多点。”

“大夫们正在给予您想办法。您别急，低烧会降下来。”罗荪安慰他。

“等低烧一退，我就可以出院，继续写回忆录了。”

罗荪对他说，先治病要紧。茅盾说：“不写完回忆录，对我精神上是个负担。”

3月上旬，他的病已转重。可是，他身卧病榻，却心系天下。有时，气喘好一些，就让儿媳陈小曼给他读一些文件和《参考消息》。

一天，陈小曼给他读一篇全国政协常委讨论陈云同志最近讲话的反映，她看父亲闭上了眼睛，便没有读下去，心想让他好好休息吧。

茅盾听不到声音，立刻睁开了眼睛，轻声问道：“刚才读到那个常委的发言，还没有完哩，怎么不读下去？”

陈小曼只得继续读下去。

3月14日，茅盾住的119病房来了好几个医生。其中除了替茅盾诊治的北京医院内科刘梓荣和裕东洁大夫外，还有院外专家吴阶平大夫等。他们经过会诊，发现茅盾心肺功能衰竭，肾功能也衰竭，经过X光和超专用波检查，还发现胸腹有积水。

茅盾见到之么多医生来看他，感到情形异常，暗想可能自己的病情严重了。等到儿子韦韬回到病房，他急切地问道：“大夫说些什么？我的病情怎么样？”

“疾病和过去有些不一样。”儿子含含糊糊地回答。

他听了不满意，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的病危险吗？”

韦韬不想把真实病情告诉父亲，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但是这时的茅盾十分敏感，他知道自己病势沉重了，知道《回忆录》怕是写不完了，就向韦韬交代了《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然后就提起他入党和捐款设立文学奖金这蕴世故藏在心里的两件大事。他叫儿子拿来纸和笔，让韦韬笔录他的口述。他先口述给胡耀邦同志暨党中央的一封信。然后口述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另一封信。

两封信都抄写好了，他看了一遍，然后颤颤巍巍地举起钢笔，用全力在前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后一封信上署名“茅盾”。

“等将来再送。”他关照儿子说。

“好的。”

“也许我可以亲自重写……”

韦韬知道父亲的心意：仍盼望恢复健康，继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那几天，在医生办公室里，刘梓荣和吴阶平等医师、专家反复讨论，共同制定出一套医疗方案，和茅盾身上的顽固疾病进行斗争。虽然还有低烧，可是感染得到了控制，胸水和腹水减少了，他的病情稍有好转。

3月20日，他显得有点兴奋，自言自语地讲出一些不连贯的话：“总理的病怎样了？……”

好一些了吧……他身体很好……姐姐，唉……她的手术没搞好……作家……他是谁……

告诉他……我不能见了……”

“那墙上写的什么？……一张张纸上……很多字……”茅盾指着墙问陈小曼。

“墙上什么字也没有写。”儿媳告诉他。

“哦，是我的幻觉。”他恍然大悟。

这时他很清醒。医生和护士怕他疲劳，劝他睡觉休息。

“晚上了吗？是该睡觉的时候了？”茅盾惊异地问。

护士知道外为富有还没黑，为了使他休息，就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晚上，该睡觉了。”

“那么大家睡觉，”茅盾一向关怀体贴别人，他对医生和护士说，“你们都去睡觉，我才睡觉。”

“好的，我们睡觉去。”医生的护士轻轻走出了病房。

茅盾看到警卫员还站在床边，就对他说：“小严，你也去睡觉。”等警卫员走了，他才闭上眼睛休息。

在这以后，他只是吃点衡粥。这是医院用鸡汤、肉末和菜泥等为他特地熬煮的。然而他胃口不好，也常常因气喘而难于下咽。茅盾在医扩床上不断揪被子，要寻找什么东西？

揪来揪去没有揪到什么，显得十分焦急，嘴里嘀咕着：“稿纸……稿纸……”原来他想拿稿纸。

他又不断用两只手朝眼睛上比划。嗒，他是一次又一次要戴上眼镜。他伸出右手，向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什么。起初在口袋边上摸，摸来摸去没有摸到他心里东西；又向口袋里掏，也没有掏出什么。他头上流下晶莹的汗珠，非常着急地自言自语：“笔……钢笔……

笔呢？”他要拿笔写作。

他屈着手指在数数，老是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些简单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陈小曼站在他床边，凝神细听他嘴里反复嘀咕着说：“四月差不多了……可以出院……

又能拿笔了……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九月写完……一定写完……”

陈小曼亲切地安慰他：“爸爸，四月可以出院了，九月写完回忆录，你该到南方休养休养。”

“写完……回忆录……这回一定……到南方……休养……再写……”

原来，八十五岁高龄的茅盾还想写完回忆录之后，转而搞创作：把《霜叶红似二月花》继续写下去，由五四运动一直写到大革命；把《锻炼》续写下去，由上海撤退，一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再把人物撒向全国。古人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正是这样。

彭真同志来看望他了；

胡耀邦同志来看望他了；

周扬同志也来看望他了……

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特地来到这间病房，握着茅盾的手，把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和慰问送到他的心中。茅盾这位病危的老人感动了，眼眶里闪动着莹莹的泪光。

曹禺来看望茅盾了。茅盾用微弱的声音说：“曹禺……谢谢！”

罗荪不知是第几次来看望他了。警卫员小严对他说：“昨天曾以昏迷好一阵，夜里才醒过来。”

茅盾的眼神里却反映出他的精神很兴奋，他让罗荪坐下，说起他 1938 年春天到武汉办《文艺阵地》的情形，还谈起他 1940 年如何从盛世才的魔掌中逃出来……

当罗荪紧握他的手告别时，茅盾轻轻地说了一声：“你走啦！”

3 月 25 日下午，茅盾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后来，又清醒过来。

3 月 26 日上午，赵清阁又一次一看望他。这时，他的病情已恶化，但神智却很清醒。

他招呼赵清阁，地无力讲话。

目睹茅盾如此痛苦的神情，赵清阁不禁眼泪涔涔而下。当她了解到输液风内的药为普通的氨茶硷时，暗暗诧异：“难道我们没有更好的平喘特效药吗？”她的心不禁向医院、大夫呼吁：应该有特效药，救救肺心病患者，救救茅公吧！

“清阁！”茅盾发现她在啜泣，就唤道。

赵清阁急忙拭泪转身，坐在他床前看着他吃饭。她很惊讶，茅盾的食欲比前些天好，护理人员喂他吃了一小碗粥，半碗牛奶鸡蛋羹，还吃了一只香蕉和半个桔子。赵清阁稍感乐观地想：“只想胃纳不坏，他是能够化险为夷的。”

由于茅盾病情不稳定，不时清醒，有时昏睡，医生又一次会诊，想方设法治疗。

茅盾看到那么多穿白大褂的医生围在他床边，不安地说：“怎么惊动你们之么多大夫来看我？”

为了保护治疗，大夫不愿把病情告诉他，而是说：“查房时有时大夫少一些，有时多一些，这是我们的工作。”

茅盾想起确实是有过较多的医生来看过他。他就对医生说：“我没有什
么，不需要这么多的大夫看。你们可以看别的病人去！”

“别的病人我们也要去看的。”

会诊的医生走了，他才放心。

3月26日晚上10点40分，茅盾的病情急遽恶化了。原来他血压不高，这时血压猛地下降到四十，一分钟只有几次呼吸，几乎停止了呼吸。

院长来了，内科主任来了，医生们连夜不断地用阿拉明和多巴胺升压药。但是血压回升不到满意的程度，呼吸更加急促，有时停顿，紫绀，缺氧明显……抢救的紧张气氛使人们有一种窒息感。病房中的医生、护士、茅盾的儿子、儿媳和同志、朋友，都把心里提得高高的，盼望着此刻能妙手回春，战胜死神。

凌晨，茅盾的四肢开始发凉了，抢救终于无效。日历翻到1981年3月27日，时钟指针停在5点50分，中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多小时后，周扬驱车赶到北京医院。他伫立在茅盾遗体前默默哀。

韦韬含着眼泪，忍着悲痛，双手将父亲的两份遗嘱交给周扬，请他转呈党中央和中国作协。

当天下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座谈会上，周扬肃穆地站起来，沉痛地向同志们宣布：

左翼文学巨匠沈雁冰同志逝世了！他以无限悲痛的感情，向同志们宣读沈雁冰写给予中共中央的遗书：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
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宣读了茅盾写给予中国作协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辞世后的第四天，中共中央就根据他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和党党籍。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

的一批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推动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4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约二千人向茅盾遗体告别。

茅盾安卧在松柏与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4月11日下午3时，北京隆重举行茅盾追悼会。人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会场。在巨幅茅盾遗像下，安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四周簇拥着一个个花圈。

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沉痛地宣布：“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

在追悼会举行的同时，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自发地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两侧，面对人民大会堂肃立默哀，直至追悼会结束。

后记

1983年的阳春三月，一封发自雅典的航空信邮到了北京。寄信人是希腊当代著名作家、1982年欧洲文学奖获得者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收信人则是：茅盾。

怎么？他不知道茅盾已在两年前去世了吗？他不了解这个月的27日是茅盾逝世两周年吗？

萨马拉基斯的信里写着：“亲爱的朋友茅盾！此刻我写给你信，自然不会到达你手里。

正如你无从看到我1981年3月26日星期四深夜在雅典给你写下的信一样，因为你竟于次日清晨安详地溘然长逝了。……然而我，亲爱的朋友茅盾看，尽管明知我的信再也到不了你的手里，我还是要给你写，因为此刻，在我的曾蒙你喜爱并推荐翻译出版的小说《漏洞》在中国出版之际，在我即将首次踏上前往你亲爱的祖国的旅程的时刻，我的思绪又飞到了你的身边。……人生中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遇见一个人仅仅只有一次，而且非常短暂，甚至只是短短的几秒钟，然而你却立即感受到和他是那么接近，一种亲如兄弟的感情油然而生，……也有这样的情况：你甚至可以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在心灵上产生兄弟般的感情。你我之间就正是这样的啊！……”

这封信感人至深的异国作家来信，我是在1983年3月26日——茅盾逝世两周年前夕的《人民日报》上读到的。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首届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聆听前辈作家、学者讲话时，我发现他们和萨马拉基斯一样，都有着对茅盾的极其深厚的感情。

与从未和茅盾谋面的萨马拉基斯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毕竟亲睹过茅公的丰采。

那是 1960 年 9 月原一天，茅盾应林淡秋校长之邀，到杭州大学参观，并与我们中文系部分师生座谈。在这之前，我曾读过他的名著《蚀》、《虹》、《子夜》、《春蚕》等。

每读一本，对他的崇拜就增添十分；我还听人谈起他上年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且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心中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仰之情。他身材中等，衣着整齐、朴素，面容慈祥、温和，笑声朗朗，娓娓而谈。聆听这位长者的教诲，使人深感他的思想、常识博大精深，透过他那异常平易近人的外表，仿佛看到了他那巨大的心灵。听他谈论文学和创作，真是一种幸福。

后来我在与茅公故乡乌镇毗邻的南浔镇上的吴兴一中任教。几年间，我多次去乌镇访问茅盾故居，听当地人讲述茅盾的家庭和生平事迹。再后，我又在湖州师专中文系任教，看到茅公为我校《教与学》题写的刊名，惠赠的手书《一剪梅》词，称湖州为故乡，使我对他的生平事迹更感兴趣了。于是开始有计划地调查、考证、研究，撰写了一些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萌发了写作茅盾传记的欲望，而且随着了解、掌握的材料增多，这种欲望日益强烈。然而，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要写一部茅盾全传，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都是力不胜任的。怎么办呢？我转而着手写一个个有关茅盾生平事迹的故事，短的二三千字，长的五六千字。我认为这样也可以写出茅盾在各个时期的动人事迹，反映他那丰富的革命与文学的一生。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厦门大学庄锺庆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肯定与鼓励。

为了写作这本纪实文学作品，我访问和写信请教过茅公的家属、亲友和熟悉他的一些作家。韦韬同志还给予我寄来了珍贵的资料。

谨在此缶所有关心、帮助、支持过作者的茅盾亲属、前辈作家和其他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茅公在 1961 年接见《邓中夏传》作者时曾说：“传记的写作主要是材料问题。首先要注意选择那些可以断定是可信的东西；中夏的文章可以摘录，甚至可以全部放进去；别人的回忆可以作些参考。”本书也大致是按照茅公提出的这个原则去选择和使用材料的。

李广德
1987 年 4 月

